

# 目次

編輯室報告：.....i

## 一般論文

「校園暴力的反擊正義？」:YouTube 特定留言區的爭勝抗爭...林宇玲/1

穿在身上的歷史：解放軍服制演化的政治邏輯.....劉正強/41

偶像養成的場域鬥爭初探：以日本女團為例.....李幸倫/69

## 歷史與現場

從中立到中立台灣的兩岸思考與一個方案.....傅大為/99

## 書評

不只是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一個實踐典範.....羅世宏/121

##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九期  
2024 年 6 月

## 編輯室報告：

本期研究論文總共收錄三篇主題各異，且觀點突出的研究論述。

第一篇論文是林宇玲教授所撰寫的〈「校園暴力的反擊正義？」：YouTube 特定留言區的爭勝抗爭〉。林宇玲取徑 Chantal Mouffe 的「爭勝多元主義」概念，以一則起因於校園霸凌的反擊暴力事件為個案，分析電視新聞台的報導與 YouTube 上的網友留言版，藉以檢視新聞影片與公眾論述之間的動態、複雜關係。Mouffe 的基進民主方案強調，民主社會裡「自由和平等」的倫理政治，不應被視為單一公共空間的實踐，而是必然呈現不同觀點或衝突立場間激烈抗爭的多元公共空間。Mouffe 因此強調以對手間的「爭勝」取代敵人之間的對抗，並將公共空間視為不同的公眾構連形式所展現的爭勝結果。林宇玲依此觀察電視新聞的報導與社群平台上網友的留言討論，發現電視新聞的報導會依網友的輿論方向調整報導走向。透過網路留言板裡網友留言的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林宇玲則發現網路留言區出現的語言傾向直白、口語化，與新聞報導有顯著區別。而在討論這起事件的咎責時，網友各自採取不同的位置和策略去建構其對於暴力與反擊的看法，並試圖將自身的觀點與更廣泛的社會與道德秩序相聯繫。

本期的第二篇論文為劉正強博士所撰寫的〈穿在身上的歷史：解放軍服制演化的政治邏輯〉。劉正強透過中共解放軍的制服自 1920 年代以後、多達十數次的服制改革，討論戎裝的文化脈絡變遷，並藉以檢視其體現的政治邏輯。劉正強在文中的主張，服裝在文化意義上，是皮膚的延伸，也是身體組成的一部分，同時，服裝更是社會控制的中介與工具，透過服裝可以觀察社會規則的身體化。自中共建政以後，戎裝經歷的改裝沿革，反映了黨／國對於制服所灌注的政治思維與社會意涵：早期的軍服沒有統一樣式，表徵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希望消除社會階級的考量。日後隨著國家經濟條件與政治氣候的變遷，軍服的樣式開始依照軍種、軍銜與性別有所區分，軍服成為軍隊現代化與正規化的表徵，也開始趨向大眾化的審美意涵。由於國防軍事議

題事涉敏感，該文的回顧性考察將中共軍服的象徵意義置放於整體政治、社會脈絡的變遷，觀點特殊。

第三篇論文為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的博士生李幸倫的〈偶像養成的場域鬥爭初探：以日本女團為例〉。該文觀察日本偶像團體的養成實踐，討論團體內的個別成員在運營規制下的團內競爭與生存之道。李幸倫透過社會學的場域理論以及媒介社會學關於媒介中介的討論，探討日本偶像團體成員透過媒介中介所透露的資本生成與轉換。一如李幸倫強調：透過媒介中介，偶像團體的養成歷程展現了存在於一個複雜的社會實踐空間的「力場」。個別成員根據其所處的團體角色位置，形成初步的社會資本，並建立內部關係。隨著自我與其他成員的權力支配程度，調整自我的慣習策略和人際關係，增加自我在團體中的談判籌碼。在自身的人設符號、角色位置，以及團體內部的角色扮演等形成的過程中，媒介中介顯然扮演調整團體內部權力關係和外在象徵資本籌碼的關鍵。

反戰聲明於 2023 年 3 月正式提出後，台灣社會輿論的反應多半不脫質疑、謾罵與抹紅。反戰訴求的第三點主張應有智慧的策略與手腕維護台海兩岸安全，以及台灣不應淪為兩強霸權對抗政治下選邊站的跟班，這訴求同時也涉及台灣在國際現勢與兩岸關係上，如何思考自身的定位。在反戰聲明提出一年多後，聲明發起人之一、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榮譽教授傅大為特撰寫專文〈從中立到中立台灣的兩岸思考與一個方案〉。以一個反戰與國際左翼的立場，傅大為提出以「中立台灣」超越既有統獨爭議的框架。文中檢視了包括呂秀蓮的中立台灣言論，以及採歐美自由派立場的學者對於歷史上各中立國不同狀態的討論，並援引學者 *Reginbogin & Lottaz* 關於「主權中立」與「地域中立」的架構，探討「中立台灣」的兩種可能。在延續對話的精神下，本刊特於「歷史與現場」刊出，期能引發後續更多的討論。

本期的書評書介，由羅世宏教授評介馮建三教授近期的大作《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羅世宏在〈不只是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一個實踐典範〉一文中，突顯了馮建三與 *C. Wright Mills* 與 *Noam Chomsky* 等西方深具社會責任感與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識份子相應的學術稟賦與批判實踐。除了對於該書有關公共服務媒介的體制與發展模式、兩岸新

聞傳播的歷史與現況，以及新冷戰格局下的兩岸關係做了精彩的論點摘要，作者也臨文無諱，提點對於書中論點未及之處。

《傳播、文化與政治》自 2015 年首刊發行，很快就要邁向發行期數的二字頭。本刊自發刊後，自許灌溉一個低限度手段，但高社會反饋的思想交流園地，因此不加入任何以「I」字審核門檻的學刊評鑑，在來稿的格式或字數限制上，也力求做到廣納不同形式的論文寫作風格作品，希望回歸到一個開放且多元的思想交流園地。本刊求稿甚殷，也期望八方學術同僚、社會實踐者繼續不吝賜稿。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委員會

2024 年 7 月 10 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九期  
2024 年 6 月

# 「校園暴力的反擊正義？」： YouTube 特定留言區的爭勝抗爭

林宇玲\*

## 本文引用格式

林宇玲（2024）。〈「校園暴力的反擊正義？」：YouTube 特定留言區的爭勝抗爭〉，《傳播、文化與政治》，19:1-40。

---

投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2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3 月 5 日。

\* 林宇玲為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email: ylin@mail.shu.edu.tw

## 《摘要》

本文從爭勝觀點並採用混合方法，檢視台灣 TVBS 有關「美工刀反擊」的新聞影片在 YouTube 留言區的爭勝抗爭，結果有三項發現。首先，新聞報導的確能激發網友對事件的關注和討論，但留言已超出新聞的框架，除了跳脫主流價值和官方觀點外，也關切新聞未觸及的問題面向，呈現出多種語言風格和各種意見。其次，留言區內存在多元的公眾，以留言作為文化實踐，參與爭奪「反擊」的定義權，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公眾和論述被形成，分別是理性公眾的反對反擊論述、憐憫公眾的適當反擊論述，以及義憤公眾的以暴制暴論述，其中尤以後者居多。最後，留言以各自表述為主，但仍有網友嘗試和不同立場者交換意見，形成更鮮明的爭勝抗爭。不過，留言區內也出現「仇恨」言論，可能超出「爭勝」範疇，意圖將異己轉變成仇敵，恐不利於民主社會的發展。

**關鍵詞：**YouTube 留言、公眾、爭勝、校園暴力、論述



## 壹、研究緣起

自從 2011 年新聞媒體大力揭露桃園八德國中的霸凌事件後，「校園暴力」已成為眾所關注之事，不僅促成《國民教育法》的修正，增設防制與輔導機制（孫智辰，2012），同時教育單位、民間團體也積極推動各種反校園暴力／霸凌活動，試圖阻止暴力重演。然而，十年過後，校園仍不時傳出暴力事件，學校的防制與懲戒機制也開始遭受質疑。

隨著新科技的發展，已有不少學生利用手機記錄校內的衝突經過，並將影片上傳至社群平台，姑且不論其拍攝或上傳的動機為何，這些影片至少曝光校園生活的黑暗面，新聞媒體也因此獲得更多有關校園暴力的素材。對以視聽為主的電視新聞來說，這些目擊影片具有「原始性」和「直接性」，能提供「第一手資料」，讓不在場的記者可以用來還原事發當下（Allan, 2014）。同時，影片在社群平台散播時，衍生的「流量」、「讚數」、「網議」也強化其新聞價值（Hänska-Ahy, 2016）。這些由使用者所生產的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簡稱 UGC），從社群平台被引入新聞台，電視記者通過專業守門的要求，將其整合至新聞流程中，包括查證、採訪官方意見、過濾影像、加入標題與字幕等編輯處理，重新賦予素材意義，將其建構成新聞，變成主流的公共論述（Hänska & Bode, 2018）。

新聞台除了透過傳統頻道播放新聞外，現也利用社群平台，尤其是 YouTube 進行線上分享。YouTube 是全球最大的影音分享平台，新聞台為了擴大收視，也紛紛將廣播後的新聞報導，剪輯成單則新聞上傳至 YouTube。不同於傳統媒體的單向傳播，在 YouTube，每支影片頁面都有開放的留言區，允許網友對影片發表看法，或和其他網友進行討論。YouTube 已然成為各種媒體和傳播模式互動的匯流平台，包括「上對下」的新聞傳播、「下對上」的公民傳播、或「橫向」的社群（人際）傳播，而他們所生產的論述也在此匯聚和競爭，<sup>1</sup>成為「爭勝」的公共空間（agonistic public spaces; Carpentier &

---

<sup>1</sup> 論述（discourse），指任何透過語言所生產的書寫或口說文本。對 Foucault, Laclau 和 Mouffe 等人而言，論述不僅涉及語言表現，還包含權力運作，也就是論述作為一種社會實踐，試圖建構一套特定的知識，賦予事實以意義，並藉此發揮權力的

Cammaerts, 2006, p. 968)。Mouffe (2005a, p.158) 指出,「公共空間是不同霸權計畫對峙的戰場」,而 YouTube 的留言區也正成為各種觀點、立場相互較量的場域,以不同的論述方式質疑、對抗主流的霸權論述。

雖然新聞媒體之前也設有民眾發言的管道(如讀者投書或 call-in),但數量有限且需經過編輯之手,被反映出來的民意也較符合特定的文明、理性標準。相較之下,YouTube 的留言區則更自由、開放,不僅空間無限、沒有審核,民眾也能以匿名方式表達真實感受,而出現各種爭議的公眾(contested publics),採用情感甚或更挑釁的方式(如辱罵)回應、反駁及批判主流的觀點(McCosker & Johns, 2014),形成「對抗性論述」(counterdiscourse);這些通常正是主流媒體所忽略或排除的聲音(Toepfl & Piwoni, 2015; Walter, Brüggemann, & Engesser, 2017)。不過,也有學者擔憂 YouTube 的留言可能存在粗鄙和負面性,加上演算法所引發的「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效應,容易激發對立,造成論述的兩極化,反而不利於公共事務的討論(Entman & Usher, 2018; Taiwo, Akinwotu, & Kpolugbo, 2020)。儘管如此,在觀察 YouTube 留言區的內容時,仍然可以發現網友試圖以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而這些「異議」在某程度上也有助於反思現狀。

與其他社群平台相較,YouTube 的匿名機制似乎更能激發網友的回應,而且留言也與影片高度相關(Ng, 2018)。網友雖然未必同時參與討論,但多圍繞著特定主題發表看法;有些網友在點擊新聞前,可能已看過其他相關影片,而提出質疑或比較(Hänksa & Bode, 2018)。因此 Grove (2008) 指出,「YouTube 其實為新聞內容提供了自動焦點團體(an automatic focus group)」。透過留言區的留言,可以瞭解特定新聞內容如何影響網友的接收和反應,也就是網友如何解讀新聞,並形成獨特的討論社群。

雖然 YouTube 的留言無法代表所有公眾的意見,但至少反映出少數、積極網友對此新聞報導的解讀和想法,並透過公開表述的方式,讓意見浮上檯面(Springer, Engelmann & Pfaffinger, 2015; Walter, Brüggemann & Engesser, 2017)。因此,藉由特定新聞影片的留言區,不僅可以用來觀察網友(在日

---

作用(Rasiński, 2011)。過去主流媒體因擁有龐大的資源,其新聞論述成為霸權論述,同時邊緣化其他非主流的論述。隨著社群平台的出現,論述/權力之間的對抗爭鬥,變得更加明顯。新聞媒體的霸權位置因社群媒體和網友的論述逐漸受到挑戰,論述衝突也改變並重新再現了社會現實。

常、自然情境中)對新聞的接收反應,也能作為公共空間,用來檢視公眾論述的形成,以及專業的新聞實踐和公眾參與之間的論述競逐。

目前,有關 YouTube 的留言研究多採用大數據分析(如詞頻或情感分析),或針對熱門影片和留言進行量化的內容分析,因此較難看出網友留言的多樣性和留言區的差異(Bozdag & van den Hoven, 2015; Naab & Küchler, 2023),而且將字詞從(觀看影片和留言)脈絡中抽離出來,也易造成某種偏誤。Entman & Usher (2018)指出,現有的研究還無法說明新聞、公眾及社群媒體之間的關係,究竟社群平台是維持菁英操控輿論、促成言論兩極化,抑或有效激發公民聲音並傳遞給更廣的大眾?他們建議,學界應投入更多的經驗性研究,不要過份依賴統計數據,同時「關注那些不仰賴極化內容的主流媒體消費者」,以便瞭解更多公眾對公共議題的看法。

為此,本文除了內容分析外,更採用論述分析,同時選擇 TVBS 對「美工刀反擊」事件的報導作為研究個案。一方面,TVBS 的新聞收視率在台灣名列前茅,且對此事件的報導較為完整,包含衝突發生與事後道歉;另一方面,TVBS 採用主流的「反暴力」觀點建構事件意義,先後將反擊者、攻擊者定義成問題者。儘管 TVBS 的報導在 YouTube 沒有成為發燒影片,卻引來不少網友留言,正好可以用來檢視新聞影片、公眾論述之間的動態、複雜關係。

「美工刀反擊」事件發生在 2022 年 10 月 6 日的南投某科大校園內,兩名學生(白衣生 VS 黑衣生)因走路發生碰撞;進入教室後,兩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後被老師勸阻。下課後,白衣生心生不滿,找來數名學長進教室理論,在眾人的鼓譟聲中,前來押人的一名學長反被黑衣生以美工刀劃傷臉部;眾人在驚叫聲中逃竄,黑衣生也持刀追出教室。整起衝突的經過,被目擊者以手機拍下並發佈至〈黑色豪門企業〉臉書。此事雖然沒有釀成重大傷害,但因有人掛彩,且影片不斷被瘋傳,不少新聞台也做了新聞報導,並將其剪成短片上傳至 YouTube。於此同時,網友也開始肉搜並灌爆白衣學長們的個人社群,之後他們也被迫發出貼文道歉。

針對這起事件,電視新聞主要報導事發當日的衝突(即「持刀濺血」的反擊後果),也多引用校方或警方的說法,而 TVBS 亦提供了後續報導,而且與其他新聞台相較,更遵守專業規範——不僅黑白模糊化目擊影像,降低畫面的衝擊性,且以慢速描繪反擊者持刀的失控狀態,強調此為「反常行

徑」。這種新聞處理方式也引發網友對「校園暴力」的論辯：究竟面對校園欺凌，該隱忍還是反擊？持刀反擊是剛好，抑或過當？線上道歉是否有用，如何才能制止校園暴力？

這些問題其實也是當前「校園霸凌」的重要課題，由於主流新聞多反映菁英官方的觀點，較少引述一般人的看法，此個案正好提供我們一個機會，從爭勝取向去瞭解公眾如何站在不同的位置，解讀影片中的暴力和反擊意涵，也就是當 TVBS 利用 YouTube 重新廣播新聞時，新聞影片如何激發網友的回應，網友又如何理解和定義「校園暴力」、形成多元的公眾，並和主流觀點進行論述競逐。

## 貳、相關文獻

### 一、爭勝的公共空間

YouTube 作為新式的公共論壇，原本鼓勵使用者抒發己見或和他人交換意見，現卻演變成「有毒環境」(a toxic environment)，充斥著各種極端言說和無聊對話，不但無法進行理性討論，也不利於民主參與；YouTube 的留言研究也從「公眾參與」逐漸轉向「不文明」(incivility)表現 (Murthy & Sharma, 2019)。這些研究主要受到 Habermas 的影響，以為情感和衝突會妨礙公共領域的發展，唯有透過理性辯論，也就是當留言／評論符合真實、真誠、可理解及相互尊重（即正當性）的「理想言說」條件時，才能對公共議題形成共識；而網友習慣在 YouTube 有話直說，自然很難達到「溝通理性」的要求 (McCosker, 2014; van Zoonen, Mihelj, & Vis, 2011)。

儘管 YouTube 無法成為理性審議的公共領域，卻是眾聲喧嘩之地。Mouffe (2005a) 將公共空間定義為戰場 (a battleground)，各種霸權計畫在此交鋒，試圖爭奪論述的主導權。受到 Gramsci 的影響，Mouffe 提出「爭勝多元主義」(agonistic pluralism)，強調社會存在多種的觀點、價值及利益，即便是霸權也無法將其全部涵蓋，總是有被排除或被壓迫之處，導致衝突無法避免，永遠存在對抗 (Mouffe, 1999; 2008)。為了化解社會中的敵對，民主的目的不

是在公共領域建立理性共識，而是將敵意轉化為爭勝，也就是衝突雖然無法消除，但可以加以控制——即以更包容的方式去區別我們／他們，以對手之間的爭勝（agonism）來取代敵人之間的對抗（antagonism; Mouffe, 2005a; 2005b; 2016）。

Mouffe（2016）以為，民主社會的所有人都應該恪守「自由和平等」的倫理政治原則，儘管對手仍是敵人，卻是合法、可敬的敵人，他們有權利為自己認為正確之事而戰，並和我們一同爭奪霸權。公共空間因此成為不同觀點、衝突立場的激烈抗爭之地；信仰和熱情不再被視為「威脅」，反而是爭勝的動力，鼓勵人們參與其中建構論述（Mouffe, 2005a）。Mouffe（2008, p. 10）強調，公共空間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plural），既缺乏統一的原則也無預設的中心點，它們之間存在著構連的多種形式（diverse forms of articulation），而現有的霸權正是藉由多樣空間的「特定」構連，將其定為一尊，因此霸權抗爭（hegemonic struggle）總是試圖在公共空間中創造出一種不同的構連形式（a different form of articulation）。在線上亦復如此，「公共空間也可以是虛擬的，透過網路或其他方式，建立一種討論的爭勝形式（an agonistic form of discussion; Mouffe, 2005a, p. 164）。」人們在虛擬空間（如線上論壇）相遇，展開激烈的對辯並提出新建議，試圖以另類的構連去對抗霸權秩序。

從爭勝的觀點來看，衝突既然無法避免，在公共空間中出現分歧和爭議也是必然，不僅有助於形成多元公眾，也能以論述形式展開抗爭（Johns & McCosker, 2015）。Warner（2002）指出，公眾是透過論述而被自我組織（self-organized）起來，也就是個人經由接收文本而「關注」（attention）某事，並和陌生人建立聯繫，成為公眾。經由不斷關注、對話或爭辯，個人從私人閱讀轉變成積極參與的公眾成員，雖然成員的身份只是暫時，卻讓他／她和陌生人（因特定文本）聚集在一起，透過持續的論述交換，形成某種連結（link），將個人和（想像的）集體聯繫起來。

Warner（2002, p. 63）以為，論述之間的互動關係遠超過對話或討論的範疇，而是包含多類的生活世界（a multigeneric lifeworld），這種關係由說出和反應的軸向（a relational axis of utterance and response）以及無限引用和特徵化的軸向（potentially infinite axes of cit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所組成。這也導致公眾之間存在著差異，某些公眾因為強調理性批判和監督政府而被

視為更具代表性，成為所謂的主導性公眾（*dominant publics*），但他們往往壓制了其他公眾，貶抑其在主題或詩意（*poetic*）形式上的表現（pp. 82-84）。儘管主導性公眾具有形塑主流意識形態的能力，但其他公眾，如對抗性公眾（*counterpublics*），仍試圖採用另類或反對的觀點、表達形式去進行對抗。正如 Mouffe（1999）所說，民主應該包容各種立場和價值觀，不同公眾之間的衝突、爭勝抗爭，也是實現民主的重要部份。

Warner 的「公眾」觀點更強調文化論述層面，抗議未必是來自底層的被壓迫者，反而是由文化上被邊緣化、非主流的反對者所提出（Rocha & Medeiros, 2021）。這有助於本文檢視 YouTube 的公眾參與，也就是個人如何在共同的象徵基礎上（*common symbolic ground*）和新聞媒體、其他網友展開論述抗爭，尤其是那些主張「反擊正義」者，如何透過非理性的論述風格（如嘲諷、挑釁的言詞表達）形成對抗性論述，並藉此激發更多人的參與。

## 二、專業新聞和網友留言的交互作用

主流新聞媒體雖然以「第四權」自居，卻一直佔據「主導性公眾」的位置，被 Mouffe、Warner 等人視為意識形態的工具（Carpentier & Cammaerts, 2006; Warner, 2002）。由於採用專業的守門規範，新聞媒體除了強調新聞價值外，便是標榜超然中立和客觀報導，不論是基於事實的理性敘事、以菁英作為消息來源，或選用主流價值框架事件，都容易讓報導圍繞在當權者的利益和想法上（Goodarzi, Fahimifar, & Shakeri Daryani, 2021）。新聞在產製過程中，記者以特定的構連形式再現外在世界，排除其他的聲音，致使內容「結構性地傾向宰制」（*structured in dominance*），而有利於霸權的運作（Hall, 1980）。

Gitlin（1980, p.7）稱此構連形式為「媒體框架」（*media frames*），「框架是選擇、強調及呈現的原則，由關於什麼存在、發生和重要的小隱性理論（*little tacit theories*）組成。」媒體框架通常不被說出來也不被承認，記者作為符號處理者（*symbol-handlers*）透過框架來組織論述（包括問題定義、因果解釋、責任歸咎及解決建議），建構有關事件的特定意義，從而影響閱聽人對事件的認識和理解（Entman, 1993; Gitlin, 1980）。但媒體框架不單是新聞產製的

手法，也涉及社會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運作。Carragee 與 Roefs (2004) 指出，框架隱藏著「權力印記」(imprint of power)，雖然新聞文本可能包含各方聲明，但官方和菁英總是享有事件／問題的定義權。作為合法的傳播機構，新聞媒體所生產的「公共」論述偏向以制度、安定為主，將執政者、菁英的願景與思維「複製」至各層面和各階層，引導公眾輿論(Güran & Özarslan, 2022)。

不過，隨著社群媒體的出現，新聞媒體在告知和形塑輿論上的優勢，已大不如前(Entman & Usher, 2018)。特別是以社群平台傳遞新聞時，那些原被排擠在外、不被重視的聲音，現也能在留言區和新聞內容互別苗頭，挑戰一直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事。Toepfl 與 Piwoni (2015) 指出，從線上新聞的留言，可以看出不同(子)公共領域的交互作用，其中網友留言有別於新聞的事實陳述，而是偏向情緒發言，甚至挑戰了新聞論述，成為對抗性公眾。他們檢視了德國反歐元政黨(AfD)支持歐洲的相關報導和留言，結果發現主流媒體「系統性地」排除少數觀點，而網友為了對抗媒體的不公正，在留言區大書特書其反對主張(如反民主價值)，從而豐富、補充了現有的公共領域。

Graham 與 Wright (2015) 則針對「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遷峰會」的報導，檢視《衛報》線上留言區的作用，結果(在內容分析部份)發現網友留言以理性批評為主，較少出現貶抑或人身攻擊。不過，許多留言表達出反對立場、質疑固有假設、或提出新觀點，呈現出與新聞框架相反的解釋，顯示網友擁有對抗霸權論述的能力。總的來說，網友留言不同於新聞論述，至少有三種：(1) 提出原始新聞未顧及的問題面向；(2) 提供個人經驗的證詞；(3) 呈現歧異、反對或多種觀點(Graham & Wright, 2015; Lee, 2019)。當然，不容否認留言也可能是胡謔、謾罵或歧視，雖然具有破壞性，卻也是文化表達。

對網友來說，YouTube 讓他們在每日生活中，可以輕鬆在觀看和留言評論之間穿梭；留言區出現的語言自然也傾向直白、口語化(Milliken, Gibson, & O'Donnell, 2008)。有些網友可能不重視自己的公民身份，而以個性化的消費者自居，專注於自得其樂。儘管他們的留言可能出於自戀動機，而未考慮公共和諧或社會價值，但在留言區表達私人意見，還是具有民主意涵——即

將私人聯繫至陌生人所形成的公眾中，促成更多人關注此事（Papacharissi, 2009），或激發線上的參與力量（McCosker, 2014）。

不同於新聞網的留言，YouTube 的留言可能更傾向隨興為之，且受到影片表現的影響。McCosker（2014）從「爭勝」的觀點，檢視 2 支涉及紐西蘭公共議題（地震和快閃族）的影片留言，結果發現影片內容的爭議點，易促發網友的各種挑釁反應，而這些攻訐話語雖然不入流，卻是爭勝的工具，網友利用符號的暴力形式，展開論述對抗、競爭，並圍繞著影片形成分散、動態的公眾。Johns 與 McCosker（2015）也分析 2 支涉及種族偏見的影片留言，結果察覺網友為了表達其反種族歧視的立場，多採用「異端」（aberrant）的線上參與（如攻擊、辱罵等），試圖以爭勝抗爭來引起人們對種族主義的關注和回應。

目前，較少研究針對 YouTube 的新聞影片和留言進行探究。Goode, McCullough 與 O'Hare（2011）指出，YouTube 是混亂吵雜之地，若要檢視新聞影片留言的批判潛力，應同時考量新聞影片的內容、主角（包含影片中暗示的行動者）、特定新聞媒體（或一般主流媒體），以及網友（包含論點、世界觀及語言能力等），才能掌握留言評論在公共領域所發揮的作用。因此，本文也採用其建議，進行個案的相關分析。

### 三、校園暴力的主流論述

Jacobs（2014, p.2）指出，校園暴力（school violence）是「在學校故意使用任何體力、其他勢力或權力去威脅或實際對付自己、他人或團體，而導致或可能造成受傷、死亡、心理傷害、不良發展或剝奪。」顯然，校園暴力包含各種形式的攻擊或脅迫，從毆打、恐嚇、霸凌、操縱、性騷擾、仇視至排擠等，不一而足。而現下常用的「校園霸凌」一詞，則更強調暴力的「重複、持續性」<sup>2</sup>。

---

<sup>2</sup> 根據教育部的《校園霸凌防制準則》，霸凌被定義為「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校園暴力／霸凌深受「反暴力」人道論述的影響，暴力被視為非法且不道德的行為（Krek, 2020），因此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攻擊，包括主動攻擊和反應性攻擊（reactive aggression），無論是使用身體、語言或關係等方式進行（Raine et al., 2006）。而反應性攻擊，又被稱為「反擊」，是個人面對外來威脅時，所做出的攻擊反應，雖然本質上具有防禦性（defensive in nature），但在法治社會，並不鼓勵個人採用這種自衛方式（Anderson & Bushman, 2002）。因為反擊多出於衝動反應（impulsive response），伴隨著個人的激動情緒、焦慮及憤怒，一旦分寸拿捏不當，便可能誤傷他人而觸法（Pechorro et al., 2021）。

反擊成為「不智之舉」。由於學生年輕氣盛，一時怨懟所做出的攻擊反應，不但無法化解衝突，反而可能讓暴力升級，陷入報復的循環中，而影響其日後人際關係和身心的發展，或助長其反社會行為（Pechorro et al., 2021）。因此，在台灣的霸凌論述中，反擊也被列為霸凌類型，反擊者也須接受心理輔導。

主流的「反暴力」論述反對「以暴制暴」，要求個人培養自制力（self-control），學習如何尊重和理解他人；一旦遇到人際衝突，應先保持冷靜，然後尋求以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如溝通、求助或報警。這種主張不僅出現在各種反校園暴力／霸凌的方案中，新聞報導也多如此——譴責暴力和要求懲罰攻擊者。有關校園暴力的新聞報導主要以事件為導向（event-oriented），採用衝突情節及個人責備框架，著重在雙方的爭鬥，並將暴力指向個人的錯誤行為，要求其負起道德責任，而較少關注暴力產生的（結構性）原因和背景（林宇玲，2023; Jacobs, 2014）。

電視新聞建構我們對外在世界／事件的認知，當他們傾向以單一事件、個人行為來解釋校園暴力時，一般大眾能否接受又如何解讀暴力？在廣電時代，電視新聞的接收端是隱晦不明，但現在透過 YouTube，網友觀看和分享是同時發生，閱聽人直接被納入媒體參與的互動循環中，從點閱、按讚、分享至留言，形成「閱聽人框架」（audience frames），尤其是當他們對新聞框架／構連手法有意見時，直接以文字進行反駁或重構，一同加入了定義社會現實的「談判」（bargaining）過程（Güran & Özarslan, 2022）。雖然這些以關注新聞／事件而形成的公眾，壽命極短、社群成員的連結也鬆散，卻能提供

我們瞭解社會上某些公眾（如藉由 YouTube 中介的公眾）對「校園暴力」的立場與主張。為此，本研究選擇 TVBS 在 YouTube 的「美工刀反擊」報導與留言，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問題包括：

（一）留言區的留言特徵為何？新聞影片如何影響網友的留言內容？在留言區裡，網友說了什麼、又是何方式表達？影片內容如何引發網友的回應和討論重點？

（二）留言回覆的特徵為何？在留言區內，哪種留言能引發網友的回覆，促成意見交流？在留言互動中，他們主要是互相支持，還是交換、分享不同的觀點？

（三）網友留言的批判意涵為何？他們在論述／權力關係的網絡中，如何發揮作用？網友站在什麼位置、採取何種策略去構連「反擊／暴力」和「道歉反省」？他們如何發展另類論述，形成多元的公眾，進行論述競逐？

## 參、研究方法

在社群媒體的相關研究中，已有許多質化研究採用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試圖結合量化研究方法（如內容分析），以獲取更多社群平台上的資料，<sup>3</sup>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and 解釋（Snelson, 2016）。由於本文旨在檢視留言區的論述抗爭，因此以論述分析為主。Duchastel 與 Laberge（2019）指出，論述分析是一種跨學科和跨越方法論的研究實踐，已超越了傳統量化和質化研究方法的對立。他們強調，論述分析應以務實的態度，運用量化數據資料（如詞彙分析或內容分析），以便更全面地理解研究對象。有鑑於此，本文

---

<sup>3</sup> 質化研究方法在探索深度和細節方面有其優勢，但在處理社群媒體的海量、多樣化內容（如影片、貼文或留言等）時，單一方法可能完全無法涵蓋資料的複雜性。然而，若借助量化研究方法，如內容分析，則能對大量明顯的內容進行廣泛的調查，提供對整體趨勢或主題分佈的總體描述（Snelson, 2016）。這種結合質化和量化研究的混合方法，有助於在描繪整體趨勢的同時，深入解釋個別案例的情形（Duchastel & Laberge, 2019; White, 2018）。

也採用混合方法，結合論述分析與內容分析，以更全面地掌握留言區的網友留言和深入解釋相關問題。

## 一、論述分析

論述分析作為一種研究實踐，涵蓋多種的質化研究方法，<sup>4</sup>用來檢視語言使用（*language-in-use*）和社會世界之間的權力關係。本文旨在研究留言區的論述抗爭，因此採用了傅柯式的論述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FDA*）。Foucault（1990）指出，論述既是權力的工具，也是其效果，可以用來生產和維護既有的權力關係，但也能阻礙或顛覆霸權的運作。儘管如此，論述世界（*a world of discourse*）不能簡單地二分為宰制／被宰制；相反，它是由「一系列不連續的部份（*a series of discontinuous segments*）」組成，戰術功能既不一致也不穩定（1990, p. 100）。各別元素雖然採取不同的論述策略，卻能影響和牽制對方。因此，論述分析關切由「誰」、「何地」或「何時」，促成或限制「什麼被說出來」（Parker, 1992），藉此進行論述／權力的抗爭。

論述不僅和權力有關，也能生產主體性（*subjectivity*）。論述在建構現實之際，同時提供某種觀看世界和存在（*being*）世界的方式，也就是提供主體位置，讓閱聽人可以從特定位置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從而獲得主觀的感受和經驗，並據此行動（Willig, 2008）。過去，研究多關切媒體再現如何影響閱聽人的主體建構，但社群平台出現後，研究也開始探究網友如何發揮能動性，在線上利用各種論述，建構其存在方式並完成社會實踐（Brunton, et al., 2018; Sam, 2019）。

Foucault 的論述觀點雖然涵蓋知識、權力及主體性，但他並未提出具體的操作方法，<sup>5</sup>而是由後來的學者根據其理論旨趣，發展出 FDA。不同於其

---

<sup>4</sup> 論述分析包含多種異質的質化研究方法，如符號學、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或傅柯式的論述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FDA*）等。每種方法也成為一種研究取向，不僅在理論基礎和方法論上有所不同，研究焦點和分析策略也不同，如 CDA 強調權力、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而 FDA 則受到 Foucault 理論的影響，關注權力、知識及主體形成的議題。此外，每種取向內部也發展出不同的子流派，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根據研究旨趣，採取不同的方法和策略，以應對不同的研究議題和文本類型。

<sup>5</sup> Foucault 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考古學」和「系譜學」，但這兩者多被視為他對知識

他的論述分析取向，FDA 特別受到 Foucault 後期作品（如《性史》）的影響，關心個人如何透過特定的論述實踐或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sup>6</sup>來建構其主體性，同時與微觀權力運作中的「有權力即有抵抗」相互補充（Hanna, 2014; Kahn, & MacEachen, 2021; Willig, 2008）。主體不再只是論述／權力的產物，而是分散在多種論述、發言立場和權力關係中，進而確定「我們是誰」和「我們可以成為誰」（Arribas-Ayllon & Walkerdine, 2017）。雖然個人作為（倫理）主體，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主流論述的制肘，但為了追求某種道德價值，仍然能夠形成另類或對抗性論述。

由於 FDA 關心主體性的建構，現已被廣泛地運用在心理學領域，並發展出各種分析模式，其中 Willig（2008）即提出六步驟分析模式（six-stage analysis model），如下：

（一）論述建構（discursive constructions）：根據研究問題，找出論述對象，並掌握其建構方式；

（二）論述：關注這些建構彼此之間的關係和差異；

（三）行動導向（action orientation）：辨別個別建構所實現的功能（將論述呈現在此的作用）；

（四）定位（positionings）：解釋這些建構繪製了哪些行動的可能性（即，存在哪些主體位置？）；

（五）實踐：在這些主體位置中，可以說出或做些什麼；

（六）主體性：將參與者的觀點（被表達在語言中）和其主體經驗連繫起來，也就是參與者可能從特定位置，選用特定隱喻、情節、概念來表達看法，實現自我。

---

和權力運作的描述框架或方法論的指引，而非具體的研究方法（Arribas-Ayllon & Walkerdine, 2017; Hansen & Triantafillou, 2022）。儘管如此，Foucault 的理論觀點，仍有助於研究者理解知識、權力和主體性之間的關係。

<sup>6</sup> 自我技術是指個人尋求規範和改善其行為的技術。個人透過自我技術，將自己視為遵守某些道德準則的主體，「改造自己以達到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Foucault, 1988, p. 18）。

Willig 的模式偏向關注論述實踐和主體定位，目前也被應用至社群媒體的論述分析中，且步驟被加以簡化（Alharbi, 2017; Hanna, 2014; Jones, 2014; Tekin & Drury, 2022）<sup>7</sup>。前兩個步驟，其實就是確定研究對象的範圍和其論述特徵。在此階段，可以結合量化的內容分析，協助資料的蒐集和編碼，藉此掌握論述世界的特性，以及論述建構的分布與趨勢。論述分析雖然結合了內容分析，但仍採用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主張意義無法和脈絡分離，任何計算都必須承認意義的不穩定（precarious）本質（Hardy, Harley, & Phillips, 2004）。測量只是一種論述資料的處理方式，只能提供整體的局部視野（a partial view of whole），也就是利用數據，引導我們觀察這些指標的建構或增加分析的規模（Duchastel & Laberge, 2019）<sup>8</sup>。實際的分析仍須回到文本中，才能掌握這些建構的意義與關連。

第三步驟則進入論述分析，檢視這些建構在脈絡中的「行動導向」，它們在論述世界中所發揮的作用（如支持或反對其他的論述），這也關係到這些建構所提供的主體位置，因而連結到下階段的「定位」與「實踐」。在論述世界中，個別參與者如何建構主體位置（即採取何種立場），同時定位自身和其他人在論述結構中的關係。一旦確定其位置，便會影響其論述實踐（如留言）。以校園反擊的留言為例，網友若坐入「守法」的公民位置，法律秩序便成為至高法則，自然反對「反擊正義」，其留言也會和支持「以暴制暴」者形成衝突、對立。留言不再只是表面的文字陳述，而是網友所認同的可說或可做之事，並藉由陳述的行動導向，參與留言區的意義抗爭。最後，研究者可以利用這些被表達出來的話語（如特定的用詞、隱喻、情節等），瞭解參與者（所站的位置）對現實的理解，以及他們看待世界和存在的方式。

為了探究網友如何透過留言建構公眾身份，同時參與「反擊正義」的意義協商，本文將 Willig 的步驟簡化成三階段：（一）論述對象與和其論述特徵：在此階段主要採用內容分析法，調查留言區的留言「說了什麼」和「如

---

<sup>7</sup> 簡化是因為社群媒體的留言，多只是網友的一次性表述，不同於傳統論述分析針對特定對象進行深入訪談或民俗誌所做的厚描研究，因此研究者會根據其研究興趣和需求，簡化資料的分析步驟。

<sup>8</sup> 從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任何方法論取向都會面臨資料處理的化約過程，在此過程中也涉及解釋與詮釋的操作，因而允許研究者將對象挪為己用，即針對研究者對它的理解，加以處理（Duchastel & Laberge, 2019）。

何說」。藉由建置相關的類目，一方面，掌握留言區的論述結構、和各別建構之間的關連與差異；另一方面，也試圖說明網友留言和媒體框架之間的關係。(二) 行動導向：辨別特定陳述（個別留言）在整個論述結構（留言區）中，所產生的權力作用，如接受或質疑新聞影片／反暴力的霸權解釋，抑或其他論述進行意義爭鬥；同時，解釋這些留言採取哪些論述策略，以達成其作用？(三) 定位與主體性：藉由陳述的行動導向，進一步解釋網友如何從不同的公眾位置進行留言，實現其公民參與和文化實踐，同時顯示其觀看和存在世界的方式。

## 二、研究步驟

### (一) 確定論述對象與其論述特徵

本文於 2023 年 3 月底在 YouTube 上搜尋有關 TVBS 對「美工刀反擊」事件的相關報導，共取得 4 支影片網址和 789 則留言（見表一）<sup>9</sup>，並以此作為研究對象。為了掌握留言區的整體概況和留言的具體特徵（包含「說什麼」和「如何說」），在此階段採用內容分析法。首先，下載所有留言並進行編碼，經過仔細閱讀後，以開放編碼方式，建構出「主題」、「語言風格」及「留言回覆」三大項目。

1. 「主題」類目：指網友留言所提及的內容面向，包括（1）新聞媒體表現；（2）行動者：白衣方、黑衣方、旁觀者、所有學生、家長或家庭；（3）暴力衝突：霸凌、反擊；（4）學校（如學校形象、處置方式）；（5）警方和法律；（6）社會和地方；（7）道歉反省；（8）肉搜；（9）個人經驗；（10）懲罰；（11）單純回答網友（與反擊事件無關聯）；（12）其他（無明確指涉）。

---

<sup>9</sup> 這 4 支新聞影片中，有 2 支影片內容是重複，但因網頁不同，各有留言區，因此列入分析，編號為 A 至 D。留言區內的留言是變動的，隨著時間的演變，可能有新增或被刪除的留言，本文以 3 月 31 日下載的留言內容為主。同時，考量隱私問題，也將網友的個人資訊部份，以編號代替，或將圖檔中的個資，加以模糊化處理。

表一：TVBS 對「美工刀反擊」事件的新聞影片網址

事件日期	影片標題	留言區網址	留言數
10/6	(A) 走路撞到！五專生互嗆	<a href="https://youtu.be/mEAWwvb_720">https://youtu.be/mEAWwvb_720</a>	89
	(B)	<a href="https://youtu.be/CzGvtnbjgQ">https://youtu.be/CzGvtnbjgQ</a>	60
10/7	(C) 校園霸凌被肉搜	<a href="https://youtu.be/pJMG8Eph7ec">https://youtu.be/pJMG8Eph7ec</a>	596
	(D)	<a href="https://youtu.be/xisJwylYTg4">https://youtu.be/xisJwylYTg4</a>	4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由於留言的長短不一，有些網友關注的層面較廣，因此「主題」類目和細項「行動者」都採用複選，而且「行動者」也加入立場偏向分析。另外，「反擊暴力」和「道歉反省」是新聞的重要面向，也進行細部分析。

- 「反擊暴力」類目：指留言提及反擊、自衛、自保等內容，包括 (1) 反對反擊；(2) 適當反擊；(3) 支持以暴制暴；(4) 其他。
- 「道歉反省」類目：指留言提及道歉或反省內容，包括 (1) 稱讚或接受道歉；(2) 懷疑道歉誠意；(3) 嘲笑或 (4) 拒絕道歉。

2. 「語言風格」類目：指網友留言所採用的語言風格，包括 (1) 讚揚、肯定；(2) 陳述事實；(3) 反對、質疑（含有論據）；(4) 幽默、嘲諷；(5) 人身攻擊、咒罵；(6) 仇恨、敵意；(7) 提問；(8) 沒有文字只有表情符號；(9) 其他。

3. 「留言回覆」類目：以次數為單位，針對網友之間的回覆性質進行調查，包括 (1) 不同立場的理性討論；(2) 不同立場的爭辯；(3) 相同立場的情感分享；(4) 相同立場的論點延伸；(5) 提問或澄清錯誤。

在此階段，本文試圖以內容分析法描繪出留言區的論述世界，包含留言內容的觀點呈現和分布，以說明論述建構彼此之間的關聯，並藉此分析資料協助研究者回答研究問題一和二。不過，承如前述，論述分析為了擴大分析規模，結合了內容分析，但這些計算和測量只是用來描述論述世界的樣態，所有的意義仍須回到文本中。

## (二) 行動導向

藉由論述分析，檢視留言區所強調的各種論點，包括字詞選用、引述、重複、修辭手法（如：隱喻、標籤、情節）等，以瞭解個別留言的「行動導向」<sup>10</sup>，如何和新聞事件、影片、或其他留言論述展開爭勝抗爭。

## (三) 定位與主體性

最後，將留言陳述連結至網友的主體位置和主體性。我們可以從留言的「行動導向」，瞭解留言區提供了哪些公眾的位置，尤其是針對道德爭議的部份，網友又是採取何種立場和價值觀，表明其對反擊事件的看法，並據此展示其看待世界和存在的方式。

# 肆、研究分析

## 一、影片與留言的相互作用

### (一) 新聞影片的框架 / 構連

針對這起事件，TVBS 的新聞素材主要採用線上流傳的 UGC 影片和貼文，並以衝突、情節及個人責備框架來構連事件的意義。在事發當日（10/6），新聞標題為「走路撞到！五專生互嗆 摺學長來 慘被劃傷」，新聞旁白配合 UGC 影片的剪輯畫面，詳細描述黑、白衣生的衝突經過；最後加入一段校方的聲明畫面，指稱學生因碰撞而引發爭執，而黑衣人最近因父親過世，情緒不穩才會持刀反擊，校方「已通知家屬到校和後續協助輔導」。新聞將持刀反擊建構成失控、過當的反常行為，並採用校方的說法，學生的行為偏差是因為突遭巨變，雖然傷人有責任卻情有可原，已安排輔導。

---

<sup>10</sup> 留言陳述表達出網友對事件或事件關係人（如個案中的黑／白衣方、施暴者／受害者）的看法。在表態的同時，留言陳述也發揮作用，在整個留言區的意義網絡中，和其他論述（影片或網友留言）同時進行意義協商，或是彼此互相支持、較勁，從而複製或挑戰主流的霸權論述。



## 「校園暴力的反擊正義？」

第二天（10/7）的報導，新聞有了轉變，從「衝突事件」變成「霸凌事件」，而責任歸咎也從黑衣生變成白衣方和一旁圍觀的鼓譟者。新聞標題為「校園霸凌被肉搜 受傷學長道歉『我在反省了!』」，畫面除了（10/6的）UGC片段外，也將學生在個人社群的貼文翻拍成影像呈現；同時，新聞敘事也改成「這是多人對一人的校園霸凌」，霸凌者已被肉搜出來，且發表了線上道歉。最後加入一段草屯警方的採訪畫面，表示已介入調查但雙方尚未提告；新聞末尾也提及：「不少同學看熱鬧，吆喝吶喊助陣，唯恐天下不亂，校方也會做後續糾正輔導」。

整體來看，事件的後續報導似乎受到網路輿論的影響而有所轉折（即以肉搜、公審後的結果作為新切點），但新聞處理仍未跳脫主流的「反暴力」觀點——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不論是受害者的反擊、攻擊者的拉扯，抑或旁觀者的助陣，將校園暴力／霸凌歸咎於一群「缺乏道德責任」的學生，而未檢討霸凌發生的背景或結構因素（如同儕文化或校安機制等），也未採用其他非官方的觀點。

### （二）有別於影片的留言特徵

從留言區的主題分布來看，影片強調之處的確會激發網友的關注，留言多聚焦於「行動者」（62.4%、35%）、「暴力」（43.6%、28.3%），以及10/7新增的「道歉反省」（27.8%），但網友也注意到新聞未處理的問題面向，包括家庭、學校、法律、社會、懲罰等（見表二），同時，有些網友也分享自身被霸凌或反擊的經驗，讓留言區的反擊聲音變得更加多元。

針對新聞報導部份，可以發現不少留言會提及影片的細節（如「又是草屯欸」、「影片中的在寫錯了，要改成再」、「這霸凌的第一個新聞影片就已經證實『別理他』已經沒用很久了...」）。有些更是直接抨擊「新聞表現」，尤其是針對10/6的報導，網友分別就標題（如「感覺TVBS這標題是在幫霸凌別人的那邊，你們電視台真是墮落了」）、敘事（如「這新聞是在報怎樣的，明明是黑衣服同學被一群人霸凌，結果你們的重點是他拿刀攻擊對方，無言...」）、或消息來源的陳述（如「什麼叫做走廊上的碰撞，引起的糾紛？」）表達不滿，甚至質疑該台的立場（如「這台是親中王雪紅的媒體啊！」）。

留言的論點也多與新聞影片的主張相左，在 10/6 日的「行動者」部份，網友明顯支持黑衣方、反對白衣方並譴責相關人等（見表三），而在「反擊」部份，支持「以暴制暴」的留言也明顯高於其他主張（見表二）。而當 10/7 日新聞披露霸凌者道歉時，網友對白衣方的反對仍有增無減（56.9%），而且對霸凌者的「道歉」，留言也多偏向質疑（7.3%）、嘲笑（10%）或不接受（9.2%）。

這顯示，主流媒體重新包裝 UGC 製成新聞，雖然能擴大觀眾對事件的關注和討論，但就 YouTube 的留言來看，在反擊／暴力的爭議點上，新聞可能無法像過去一樣引導輿論的走向，反而須不時面對網友的監督和質問。

表二：個案留言區的主題分布

主題項目	10/6		10/7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新聞表現	7	4.7	4	0.6
行動者	93	62.4	224	35.0
暴力	65	43.6	181	28.3
反對反擊	3	2.0	12	1.9
適當反擊	16	10.7	18	2.8
以暴制暴	44	29.5	122	19.1
其他	2	1.4	29	4.5
學校	15	10.1	35	5.5
警察	4	2.7	31	4.8
社會	7	4.7	25	3.9
道歉反省	0	0.0	178	27.8
接受			8	1.3
質疑			47	7.3
嘲笑			64	10.0
拒絕			59	9.2
肉搜	10	6.7	20	3.1
個人經驗	0	0.0	42	6.6
懲罰	10	6.7	27	4.2
回覆網友	5	3.4	58	9.1
其他	5	3.4	15	2.3
總合	221	148.3	840	131.3

其次，就留言的「語言風格」，從表四可以發現網友的發言偏向情感表達，通常針對黑衣生，會採用「肯定、讚揚」的語氣（如「黑衣男你很棒」、「為自己站起來👊」、「孩子加油，再苦也要好好活」）；而對白衣生，則除嘲諷外（如「吼笑死也☹霸凌的人還敢報警」、「以後孫子問：阿公為什麼臉上有刀疤？因為我霸凌別人反被砍」），也多採用人身攻擊或咒罵（如「穿個 89 裝就當自己瑪莎」、「一群猴子」）。不過，留言屬於理性推論的「陳述事實」和「反對質疑」，加起來也超過四成，仍有不少網友選擇就事論事（如「想保護自己沒有錯，但拿刀劃傷人自己會比較輸面」、「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除非彈性疲乏，不然遲早反彈」、「但我認為被劃傷男可能會有復仇心，講白一點處理不好還有後續」），而非只是謾罵。

表三：個案留言區的行動者分布與立場偏向

行動者	10/6		10/7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白衣方	53	57.0	127	56.7
支持	1	1.1	0	0.0
反對	52	55.9	127	56.7
黑衣方	20	21.5	63	28.1
支持	16	17.2	52	23.2
不明顯	1	1.1	0	0.0
反對	3	3.2	11	4.9
旁觀者	8	8.6	36	16.0
支持	0	0.0	1	0.4
反對	8	8.6	35	15.6
所有學生	27	29.0	33	14.7
反對	27	29.0	33	14.7
家長／家庭	6	6.5	12	5.4
不明顯	2	2.2	0	0.0
反對	4	4.3	12	5.4
總和	114	122.6	271	120.9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仇恨敵意」部份，這類留言（4-5%）傾向鼓勵反社會行為（如「拿起你們的武器，人民處罰罪犯跟其家人小孩才是正義」、「希望割到脖子，國家不需要廢物」、「對霸凌者不可以慈悲為懷，送他們去見上帝吧！」），有別於幸災樂禍的嘲笑（如「活該被砍」）或憤世嫉俗的憎惡（如「被砍的死鶴」），這類留言鼓吹對他人造成致命傷害，恐加深社會對立。

表四：個案留言區的語言風格分布

語言風格	10/6		10/7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肯定讚揚	15	10.1	49	7.7
陳述事實	33	22.1	191	29.8
反對質疑	28	18.8	150	23.4
幽默嘲諷	34	22.8	85	13.3
攻擊咒罵	31	20.8	114	17.8
仇恨敵意	6	4.0	33	5.2
提問	2	1.3	13	2.0
只有表情符號	0	0.0	2	0.3
其他	0	0.0	3	0.5
總合	149	100.0	640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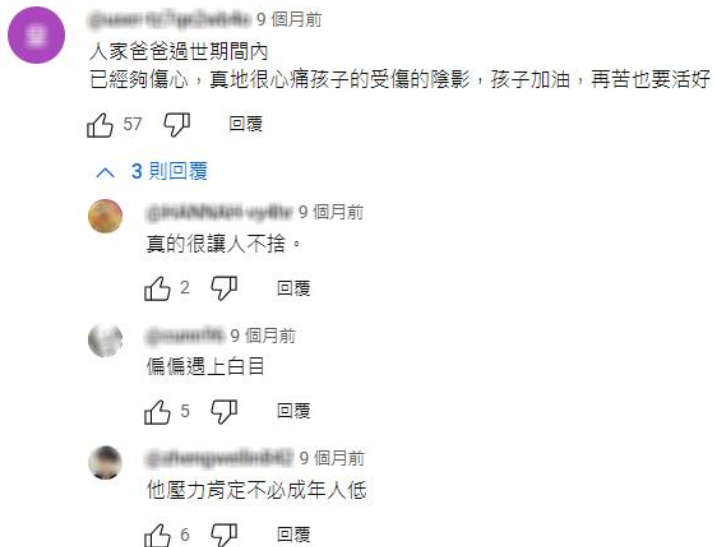
## 二、留言回覆的特徵

就整個留言區的論述世界來看，除了主題分布和語言風格不同於新聞論述外，網友彼此間的留言互動也比較有限。從表五可以發現，留言回覆以相同立場的回應居多（近六成），尤其是情感分享（如圖一），但這類回覆多在3則以下，以應和為主（如同聲譴責霸凌者或聲援受害者）；不過，留言若涉及個人被霸凌的經驗分享，回覆則數則會增加，除安慰外，網友也提供應對之策。

表五：個案留言區的留言回覆特性

留言回覆	10/6	10/7	百分比%	
	次數	次數		
不同立場			15	24.6
理性討論	3	8 (11)		(18.0)
相互爭辯	0	4 (4)		(6.6)
相同立場			36	59.0
觀點延伸	3	9 (12)		(19.7)
情感分享	4	20 (24)		(39.3)
提問或澄清	2	8	10	16.4
總合	12	49	61	100.0

圖一：網友針對「受害者」的留言



資料來源：<https://youtu.be/pJMG8Eph7ec>

與前者相比，雖然不同立場的回應（如圖二）相對少（24.6%），但這類留言多針對暴力／反擊的正當性進行對話，陳述較長（有完整的論據），回覆則數也較多（多在 5 則以上，甚至出現 55 則），顯示網友其實不排斥與不同立場者交換意見。其中，涉及「不同立場的爭辯」，儘管留言的意見分歧（如「我不認同」、「我不同意」），網友也會互相揶揄挖苦（如「你的邏輯也很前衛」、「我看你是頭撞壞了」、「你是個毫無邏輯性的自虐份子」、「你跟在旁邊煽動的人是一個樣子」），但未出現火爆飆罵，仍傾向平和進行。

## 圖二：網友針對「暴力」的辯論

-  @momo5289 9 個月前 (已編輯)  
暴力不能解決問題。那些圍觀助陣的都是幫兇。加深受害者內心的恐懼 加強叫囂者的誇張氣焰，被害者心生恐懼 無奈被迫之下 持械反擊自衛。身心受到嚴重創傷 需要好好關懷輔導，避免萌生反社會人格 霸凌的孩子 往往都是從被霸凌開始。
- 👍 19 🗨️ 回覆
- ^ 8 則回覆
-  @vanlin5485 9 個月前 (已編輯)  
暴力可以解決問題，要不然怎麼會有戰爭。如果你不夠強壯，很容易就變成大家嬉鬧的對象。
- 👍 3 🗨️ 回覆
-  @user-vq2zqkqpbm 9 個月前  
 @vanlin5485 你真的這樣覺得？暴力可以解決問題？對阿你用暴力解決了一個問題，但是產生了額外10個問題，戰爭雖然有，但是問題解決了嗎？二戰就是一戰帶來的，冷戰就是二戰帶來的，這樣惡性循環冤冤相報何時了，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呀，只有法律、道德跟溝通才能解決問題。
- 👍 🗨️ 回覆
-  @vanlin5485 9 個月前 (已編輯)  
 @user-vq2zqkqpbm 那為何學校一直有暴力事件，說真的，其實老師根本無能處理這些事，只好口說道德。暴力給社會的印象是負面的，但如果用在壞人身上，何嘗不是正義。台灣為何要買武器武裝自己，一樣的道理。我們擁有自己的軍隊，武器，彈藥，在對方不能理性溝通下，我們可以有能力反抗。人民在社會上要如何保護自己，對方無法理性溝通之下，為了避免傷害，我們一定要學會保護自己，如果你小孩都快被打死了，你還要堅持所謂的理性溝通嗎？當然是打回去啊！因為第一時間，老師根本不在場，警察也不會在，同學也不會去救你。
- 👍 1 🗨️ 回覆
-  @user-vq2zqkqpbm 9 個月前  
 @vanlin5485 可是，打回去就犯法了不是嗎？刑法傷害罪，如果伸張正義揍壞人是正確的，為什麼還要被處罰呢？刑法不就有漏洞？
- 👍 🗨️ 回覆
-  @vanlin5485 9 個月前  
 @user-vq2zqkqpbm 在法律之前，先保護自己吧，法律是保護給付得起律師的人，法律是保護給懂法律的人。我不覺得那些被打到送進加護病房的人或已經死掉的人，法律能給他們一個人生的未來，如果被打到腦受損，手腳受損，這些都是不可逆的傷，一輩子的。
- 👍 1 🗨️ 回覆
-  @user-vq2zqkqpbm 9 個月前  
其實這個案件類似屬於正當防衛或是防衛過當的議題，這個議題堪稱值得討論的
- 👍 1 🗨️ 回覆
-  @chengyuall042 9 個月前  
老師被毆傷急了，還會反咬貓，更何況是人
- 👍 🗨️ 回覆
-  @user-vq2zqkqpbm 3 個月前  
 @user-vq2zqkqpbm 打回去就犯法了是嗎？正當防衛是什麼都摸不清楚是不是？
- 👍 🗨️ 回覆

資料來源：<https://youtu.be/pJMG8Eph7ec>

另外，「提問或澄清」也佔了 16.4%，顯現有些網友會主動回覆別人的提問（如「哪間學校？」、回：「好像是南投草屯的」）或澄清訊息的錯誤（如「都超過 18 了，依法處理」、回：「都未成年，五專一、二年紀就是高一、二年紀」）。同時，研究亦發現，引發網友回覆的留言文字多偏向感性或簡單陳述，較少出現侮辱或攻擊字眼。這顯示，此留言區的網友雖然願意和他人（不論立場為何）互動，但不會主動和挑釁者交流。

從整體留言回覆的次數來看，網友似乎以自我表述為主，較少使用人際傳播。儘管如此，那些參與互動的網友卻有機會和他人展開對話，讓各種主張公開爭辯、釐清及協商，進行更鮮明的爭勝抗爭。

### 三、留言論述的爭勝抗爭

透過內容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網友對反擊事件的主題關切和表達方式，與新聞報導截然不同。然而，除了語言的表層差異外，留言區還涉及校園暴力的真理建構。當網友積極討論暴力／反擊、霸凌者／受害者時，他們各自採取不同的位置和策略去建構其觀點的正當性，特別是在持刀爭議部份，網友也表達出道德立場，形塑其主體性，並將自己連結至整個道德秩序中。從論述分析的結果來看，至少有三種立場在留言區內被強調、重複、應和，網友站在各自的公眾位置，採用不同的論述策略，讓其主張和論述變得可見。

#### （一）反對反擊的理性論述

這類留言站在「理性」的公眾位置，支持主流或新聞的「反暴力」主張，反對以暴制暴，強調「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在論述風格上，主要採用理性策略，不論是點出黑衣生的「踰矩」行為（如「影片中被霸凌者一開始是自保而動手，但拿著刀追出去是享受被人怕的快感，還是單純為了嚇對方就很難說了...」、「這孩子的處理方式不太妥當，但值得同情」）、此次反擊的僥倖（「劃到脖子就笑不出來」）、暴力的嚴重後果（如「美國之前幾例被霸凌的人直接拿槍去學校掃，那些在旁邊圍觀看戲都不知道嚴重性」、「暴力的種植

對國家發展是退步的」)，或是從法律觀點討論反擊的違法問題（如「打回去就犯法了不是嗎？」、「依照新聞內容感覺是告訴乃論罪」、「其實這個案件類似屬於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的議題，蠻值得討論的」），都試圖說明反擊不是明智之舉，只會對個人和社會帶來傷害。

這類論述也傾向接受霸凌者的道歉（如「個人覺得 80 應該會反省，還好有命可以反省，要是這一刀劃在動脈，可能人生就下課了」、「知道反省就好」），覺得學校的管理和輔導是必要的，雖然校園暴力的問題依舊存在，也缺乏妥善的解決方式，但反擊只會讓問題變得更棘手。

A40，「個人不贊成暴力，雖然是霸凌者自找的，但不會鼓勵拿刀的行為，校園不該是危險的地方（包含槍支），也希望霸凌者能受到應有的懲罰，被霸凌者能受到應有的保護與輔導。」

整體來說，理性公眾講理論法，其所生產的論述有助於複製主流的「反暴力」觀點，強調理智和以和為貴，也就是個人一旦遇到無理之人，不要與其纏鬥；倘若選擇反擊（暴力攻擊形式），甚至使用傷人工具，即便逞一時之快，也可能因此觸法，並危及他人或社會安全。網友站在人道、法治的立場，追求社會和諧，不僅透過留言呼籲個人不要因一時的錯誤選擇，而讓社會蒙受其害，也期望犯錯者有機會悔過，共同維護善良社會。

在留言區中，這類論述相對少數，但這類網友多會主動表明立場（如「不贊成暴力」），並積極回應他人的留言，以理性論據展開辯論（如圖二）。在不同意見的理性對話中，雖然沒有得出共識結論，但理性公眾也因此被看見。

## （二）適當反擊的同情論述

這類論述也常使用法律字眼，但有別於反暴力者，留言偏向站在受害者的立場，以同理心支持反擊，同時擔心反擊會對其造成負面影響，不論是心理陰影、觸法代價（如退學、賠錢或坐牢）或遭受報復等。



「校園暴力的反擊正義？」

A62, 「說穿了，他真的被那一群人帶出去了，會只是好好談事情嗎？沒被打到住院都算是運氣好了吧，或許拿美工刀可以說是過當防衛，但又有誰在那當下有更好的方法去保護自己呢？」

B16, 「我贊成反擊，這種不反擊基本上會一直欺負下去，不過拿刀有點危險，再往下面一點就是脖子了，不是同情霸凌者，而是真死人了會進少管所，為了人渣賠上人生不划算。」

C508, 「如果霸凌者剛好被劃到頸動脈死了，的確是可以大快人心，但那是對於我們這些旁觀者而言，被霸凌的那一位要背上過失殺人的罪名，賠上自己的未來，不太值得，會建議反擊但不要危及生命，比如說灌鼻樑或是攻擊下體，讓對方感受到疼痛，頂多互告傷害，但是我們都不是當事者，他的心情跟處境無人能體會。」

這類論述的網友對事件的黑衣生給予特別的關注，將其視為「受害者」，並認為他們有道德義務去關心他，為其發聲。除了擔憂黑衣生可能因反擊而觸法外，也關心其個人處境（如「人家爸爸過世期間內已經夠傷心，真地很心痛孩子的受傷陰影」、「他可能已經被弄很久了，才會帶刀反擊」、「要慶幸他有一顆善良的心，只是要正當防衛」、「毀了一位只想好好讀書孩子..逼得他放棄自己」）。黑衣生被形容為「喪父之子」、「新生」、「無辜者」、「孩子」，他是一個弱勢者，卻在眾目睽睽下，慘遭多人欺侮而被迫持刀反擊。反擊被定義為迫不得已的防衛行為。

在這類論述中，網友坐入「憐憫」的公眾位置，關心受害者，贊成其為了保護自身而反擊。在論述風格上，多採用「肯定」和「同情」的策略，一面稱讚受害者的臨危不亂（如「弟弟是自衛行為，旁邊同學也沒勸架，書都白讀了」、「他做了我絕對不敢做的事，只敢幻想而已，我看得很療癒」、「反擊的漂亮」）；一面則關切其權益（如「一大群人打一個，說要輔導單打獨鬥的同學，該輔導進警察局是這一大群人吧！」、「如果被霸凌同學事後遭到對方家長刁難，記得 po 網求助，因為我們也不知道處理進度到哪，放心大家都會站出來幫忙的！」、「還給被霸凌的學生一個公道」）。

由於擔憂受害者會遭到報復，這類論述也傾向懷疑霸凌者的道歉誠意（如「一邊限時道歉，一邊在想等風頭過去要怎麼報復」、「他不是還發一篇另外找時間找他算帳的文」、「他的兄弟還在想怎麼報仇」）或質疑道歉的意義（如「霸凌者被發現後，都會說我在反省了，我知道錯了」、「有些霸凌是一輩子的陰影，不是你道歉就能解決」、「上了新聞才來道歉，沒曝光不就繼續霸凌別人」）。

在留言區中，這類論述，尤其是涉及「同情」，也能激發觀看者的共鳴和網友的回覆（如圖一）。這類留言呈現出一群富有同理心的公眾，站在保護弱勢者的道德高度，從受害者的立場出發，不僅關懷弱勢／被壓迫者的遭遇，也提出「適當反擊」的主張。不過，這類論述仍是在現行司法體制下，進行個人權益的考量和維護。

### （三）支持以暴制暴的譴責論述

這類論述站在「義憤」的公眾位置，在留言區中佔大宗，為了合理化「以暴制暴」的主張，網友常引用諺語、俗話（如狗急跳牆、物極必反、欺善怕惡、人善被人欺、弱肉強食、有仇報仇等）來解釋反擊的必然性與正常性。此外，在論述風格上，留言偏向採用「挑釁」策略（包括嘲諷、攻擊、辱罵等），並發展出各種譴責論述來支持反擊的正當性，主要譴責的對象有五：

1. 霸凌者：留言將白衣生和學長們定義為「仗勢欺人」的霸凌者，嘲笑其「靠人多就好像變大尾」、「喊輸贏，結果以多欺少還落跑」、「沒種一對一單挑」、「看到血就會叫，好弱」，並以各種負面標籤（如一群猴子、小鱉三、廢物、垃圾、爛咖、俗辣、敗類等）來稱呼他們，將其霸凌行為建構成可恥、可恨、可惡，「不值得原諒」、「被劃傷是罪有應得」。

2. 旁觀者：有些網友注意到一旁起鬨和冷漠的圍觀者，責怪其為幫凶，縱容校園霸凌的發生（如「霸凌者、吶喊圍觀者，不就像一群外面的汪汪嗎？帶頭的撕咬，其他的在吠」、「不勸架就算了，非要血流成河」、「冷霸凌跟直接參與霸凌一樣可惡...擊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不是來自霸凌者的暴戾，而是冷眼旁觀的第三者」）。不論是助威或漠視的旁觀者，都被視為「霸凌的催化劑」，既加深受害者的恐懼，也強化霸凌者的囂張，不該放任不管（如「那

個叫囂、跟拍的、霸凌的通通打包送去柬埔寨」、「那群叫囂和掌鏡的猴子，能不能特別教育一下」、「周圍的人也應被人搜」)。

3. 學校：許多留言也對發生霸凌事件的學校，大加撻伐，除了公布和攻擊學校外，也指責教師未在第一時間阻止事態擴大(如「上課上到一半那個老師跟學長都很有問題，學校也責無旁貸！」、「老師為什麼第一時間不制止，到他們打不停才出面，而且也要跟上面說，把人帶離現場、通知家長」)和學校的後續處置方式(如「請問原先白色衣服同學呢，沒有處份？」、「只有輔導不用開除？」、「糾正輔導更爽，不用上課，同年紀的會覺得這些人更大尾」)。此外，有些留言也以親身經歷指控，學校習慣冷處理(如「校方也只是口頭告誡，罰寫打人學生，但是後續能幹嘛」、「告訴師長也沒用，因為霸凌者永遠是一整群」、「老師面前道歉，下一節下課我又被找去校園角落打...更不敢報告老師，怕被報復」、「校方就算知道幾乎都選擇隱瞞，怕影響未來招生」，由於老師沒有能力處理或校方的不作為，導致霸凌一再發生，「可想而知反霸凌的宣傳沒用」)。

4. 霸凌者家庭：學生的惡霸行徑，也讓網友質疑其家庭教育，並要求父母應負起教養責任(如「看自己孩子在影片中表演餘興節目，感到丟臉就好了」、「家長請把各自的小孩再塞回去，都白生的啦」、「我不信霸凌者父母本身沒有一點問題，有些是有模仿效應出現」、「怎麼養成這種會霸凌別人的社會敗類」)。

5. 大環境：有少數留言則埋怨，整個社會既不重視道德，刑責又太輕，導致霸凌事件層出不窮(如「現在教育已經失敗了，教會了知識，學不會道德倫理」、「執政執法幫兇，還在不停培育霸凌者」、「法律只會讓台灣人失望，霸凌者會有什麼處分？」)。

透過嚴厲譴責這些對象，加上不少網友分享自己的反擊經驗(如「讓他知道『林北不是好欺負的』，從此只有我能霸凌人」、「經過這次失控，從此大家都不敢對我怎麼樣」、「比起忍氣吞聲，反擊真的比較有用」)，「反擊正義」也被正當化：當保護環節失靈後，個人處在不公不義的情況下，反擊是為了避免傷害；反擊者不應被當成施暴者／加害人。這些留言揭示了校園現實的殘酷和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唯有反擊才能終止暴行。「反暴力」不再被

視為不變的真理，反而變成一種偽善的口號，便於行政體系漠視學生所面對的真實處境。

不同於適當反擊者的主張，這類網友更強調反擊的效果——個人如何不顧一切地反擊，反轉其劣勢。也因此，一些極端的仇恨言說也乘機而入，內容不再是教訓惡人，取代的是鼓吹殺害；這些留言不管是一時玩笑或激憤，都易將「反擊正義」原有的爭勝力道（如攻擊批判）轉變為仇敵對決，從而削弱論述的合法性。

此外，以暴制暴的論述一開始便認定「這是霸凌事件」，由於體制偏袒霸凌者，因此支持以「肉搜」找出他們（如「受害者就不用肉搜，其他霸凌者都應被肉搜」、「還好這世上還有無形正義保護被霸凌者」），同時拒絕其道歉（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又變成乖小孩，現在敗類都會轉職嗎？」），甚至嘲笑其貼文使用簡體字（如「用殘體字反省是哪招？」、「道歉還寫簡體字，是被抖音洗腦洗到不會中文嗎？」）和語文程度（如「再、在不分的社會底層」、「連道歉都不會寫，回去念幼稚園」）。

在留言區中，這類論述呈現出生氣、憤怒的公眾，他們從見證者的角度，怒罵霸凌者、旁觀者和其父母、學校，甚至整個社會，提出「反擊正義」的對抗論述，一面指責反暴力者的道德口號；一面抗議制度無法保護受害者，要求反擊無罪，並試圖警告其他的霸凌者：我們正在監看並主持公道，如同 C177 所說：「看到這新聞的霸凌者，小心點啊，不然下場可能是這樣」。影片中的黑衣人不再是隻身反抗，他的身後多了一群網友，隔著螢幕，透過留言的「行動導向」，在留言區怒斥霸凌者，同時也挑戰主流的法治和人道觀點。

總的來說，留言區呈現出多元、異質的「反擊」論述。網友們佔據不同的公眾位置，並以不同的道德立場，建構其對暴力／反擊的看法。除了展現其主體性外，他們也參與意義的抗爭，試圖將自身觀點與更廣泛的社會和道德秩序相聯繫。例如，有些以「理性公眾」的身份，追求社會共善；有些則以「憐憫公眾」，致力於保護社會的弱勢者；而「義憤公眾」，則強烈批判霸凌者和行政機制的不作為。在整個留言區內，這些位置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留言／討論過程中被不斷創造、接受或排斥。透過網友們不斷地定位和發聲，形成一個動態、不穩定的意義網絡，他們的觀點彼此並置，可能互相呼

應、交錯影響，甚或產生衝突，留言各自陳述網友所認知的暴力真相、擁護其所認可的正義價值，並與「反暴力」的霸權論述展開意義協商和對抗。

## 伍、結論

### 一、討論

本文以混合方法，檢視 TVBS 在 YouTube 上，有關「美工刀反擊」新聞留言區的爭勝抗爭，結果有三項發現。首先，TVBS 的報導受到 UGC（影片、流量及網議）的影響，雖然採用專業、主流觀點去框架事件，但新聞播出後，在輿論的形塑上顯然不如廣電時代，不僅報導的角度須不斷調整，當影片上傳至 YouTube，仍須再次面對網友的監督與批評，而留言區也提供我們瞭解（積極）網友如何解讀新聞和事件。整體來看，新聞報導的確能激發網友對事件的關注和討論，但留言已超出新聞的框架，除了跳脫校方、警方的觀點外，也關心新聞未觸及的問題面向、讓一般人分享經驗，同時呈現出多種語言風格和歧見。這顯示，閱聽人也嘗試對「反擊」提出不同的構連／框架，發展出有別於主流的另類、對抗論述，並在留言區內，爭取更多陌生人對其主張的認同。

其次，這些論述也意味留言區內存在多元的公眾，各自坐入不同的主體位置，以留言作為文化實踐，參與爭奪「反擊」的定義權。由於網友來自不同的生活世界，對反暴力的霸權論述各有不同看法，導致他們對新聞事件的解讀，也發展出順從式（不應反擊，恐引發更大衝突）、協商式（應適度反擊，但須付出代價）至反對式（應該反擊，霸凌有罪、反擊無罪）的留言構連。在留言區內，透過不斷強調、引用、重複及附和，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公眾和論述被形成，分別是理性公眾的反對反擊論述、憐憫公眾的適當反擊論述，以及義憤公眾的以暴制暴論述，其中尤以後者居多。

過去，反擊的另類構連很少被公開談論或承認，但在留言區內卻被喊得震天價響。表面上來看，以暴制暴的主張，唯恐天下不亂，加上採用挑釁語言，更顯得無理，似乎只是一群酸民在發洩情緒。但，從爭勝的觀點，他們

是合法的對手，正透過挑釁的留言和霸權展開對抗。留言不再只是文字陳述或個人表態，還具有批判意涵和權力作用，可以發揮反對的意識形態效果。藉由「反擊正義」，義憤的公眾表達對霸權論述的不滿，只要求個人隱忍顧全大局，滿口道德卻無法從體制去保障個人的安全，因此他們贊成反擊。

儘管如此，他們其實也是「反暴力」，反對從結果去看待霸凌問題，而必須從源頭去制止暴力，所以大聲疾呼「霸凌者有罪」和譴責所有相關對象，試圖透過支持肉搜和聲討白衣方的結黨、仗勢、欺侮，去恫嚇更多潛在的霸凌者。不過，不得不承認，校園暴力／霸凌並非單一事件，也不是個人問題，採用「殺雞儆猴」的方式——放大檢視事件的當事人，似乎也只讓問題停留在道德譴責和個人懲罰上（即回到主流的作法），而未對霸權結構造成太大衝擊。

第三，從個案顯示，留言雖然如 Papacharissi (2009) 所言，以各自表述為主，但仍有網友嘗試和不同立場者交換意見，且以合乎文明的方式進行，讓多元公眾和多種論述得以相遇、爭辯和拓展，從而形成更鮮明的爭勝抗爭。這和 McCosker (2014)、Johns & McCosker (2015) 等人的研究結果不盡相同，可能是因為本文挑選的不是發燒影片，加上 TVBS 的表現手法可能較易吸引知識型觀眾，所以，留言區不論是在語言風格或留言回覆，並未出現全面攻訐的情形。這也說明，就算是相同平台，不同影片風格可能吸引不同的網友，而形成不同的公眾和討論社群。

不過，留言區內仍有少數「仇恨」言論，鼓勵對霸凌者進行致命回擊，這可能已超出「爭勝」範疇，意圖將異己轉變成仇敵，不死不休，恐不利於民主社會的發展。Goode 等人 (2011) 指出，Mouffe 雖然強調對手有權利為其立場而戰，但仇恨言論是否仍屬於霸權爭勝的行為，還是有意壓制對手的敵意舉動？爭勝取向並未對此做出說明，但也值得我們反思：當論述具有批判潛力時，我們是希望留言朝向相互包容、社會改革的方向走，還是殲滅所有不同於我們的人？

根據以上發現，有三方面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

#### (一) 新聞表現

從個案來看，新聞影片會激發網友對事件的關注，但單一面向或觀點的報導卻易引發是非之爭。新聞一開始採用校方的「碰撞衝突」之說，後來又配合網路輿論風向，將其改為「霸凌事件」，同時公開道歉貼文。表面上看，社群平台的出現，似乎讓新聞媒體關注到其他聲音，而不是一味「傾向宰制」，但若進一步深究，就會發現報導仍採用單一事件、衝突情節、個人責備及官方聲明的新聞框架，還是讓暴力／霸凌變成隨機、偶發的個人問題，眾人的爭執導向「誰」的犯行更重、更該負責，而未注意到結構、體制的問題，霸權秩序也未因此鬆動，反而助長另一波勢力去迫使個人屈從。

Krek (2020) 指出，暴力雖然清楚可見，但我們對它的認識其實相當有限。儘管暴力發生在人際關係中，產生的原因卻極為複雜，我們不應專注於行為後果，還必須進一步瞭解暴力產生的結構因素（如學校文化、同儕競爭、社會階層等）對個人的影響，才能更有效地防止暴力。這也說明，這類新聞不應從表象衝突或輿論風向去斷定誰是誰非，反而應提供更多的線索。承如 Mouffe 的建議，媒體不太可能對事件做出正確的解釋，但可以盡可能提供事件的不同面向、多種觀點，讓人們看清事情的複雜性並能自行思考 (Carpentier & Cammaerts, 2006)。如此，新聞才能引導民眾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 （二）反擊論述的批判性

網路留言常被視為酸民文化，而未正視留言區內的爭勝論述，也就是那些被邊緣化、被忽略的人如何藉由論述抗爭，讓其聲音被聽見。Marres (2005) 也說，公眾的特殊性，在於它能對官僚處理失敗的事件產生影響。換言之，透過網路留言所形成的多元公眾和論述，有助於我們反思現狀、進行體制改革。

以個案來說，留言多是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對時事的自然、真實反應，雖然有不少偏見、挑釁言說，但也存在對現狀的批評和反思，有利於當局重新思考校園暴力／霸凌問題，包括現場教師的應變能力、學校的通報與處理機制、讓學生勇於說「不」、相關法律和政策的修訂等，各級單位也應對此盡快提出改革之策。

## （三）網路公眾

隨著時事討論而形成的（網路）公眾，不容否認在本質上的確是臨時、異質、鬆散且短暫，而他們所形成的反對論述，經常只是眾多分佈式網絡論述中的一角，其對抗霸權的實力，也備受質疑。雖然爭勝取向著重在點出衝突聲音的互相競爭，而非最終的輿論結果，但本文也認為，反對論述不該是曇花一現，尤其是在對抗校園暴力上，網路公眾若能跨越各平台、甚至走出線上，集結形成「強公眾」，從立法制度著手，將更能發揮改革力量。

## 二、限制與建議

本文關切公眾如何解讀校園暴力事件，採用 YouTube 特定新聞影片的留言區作為個案，研究有其侷限性，無法推論至所有平台或代表所有公眾，只能用來解釋一些來自不同生活世界的積極網友，如何透過觀看特定影片而發展出不同論述，且這些多元公眾又如何藉由論述進行抗爭。不過，如 Naab 與 Küchler（2023, p.445）所說，過去研究多關注熱門影片和留言，主張觀看的人數越多，影響力越大，而忽略了其他非熱門的留言部份，可能產生不同的論述架構、讀者及留言型態。而本文正嘗試這方面的探究，從個案可以發現，網友留言有別於新聞影片的關注，而且他們也願意和不同立場者交換意見，而非只是和志同道合者往來，呈現出獨特的討論社群。

然而，這裡也必須承認，儘管 Grove（2008）認為，YouTube 可以作為新聞影片的自動焦點團體，用來瞭解網友對於影片的解讀和反應，但不容否認，有些網友在留言時未必看過影片，甚至有些留言可能是由 AI 生成。留言之所以超出新聞框架，可能是因為網友同時參照自身經驗、其他相關的資訊或當時的輿論風向等，導致他們關切的主題逸出影片所談論的議題，擴展到其他面向。因此，影片框架和留言內容之間的關係，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說明，畢竟網路留言是複雜且多變的，不能以單一解釋來涵蓋。同時，本文也未考慮留言發佈的時間，主要是反擊事件在兩天內便落幕，但留言區是開放的，不同時期加入者也可能反映出特定時期對校園反擊的不同看法與主張，也是值得探究。

最後，本文在進行論述分析時，發現留言來自網友的日常經驗（如「霸凌的 7414」），他們的語彙、風格及關注，深受其年齡、階級、性別等身份經



驗的影響，加上語言的多義性，研究者在解析時，難免陷入主觀判定。未來研究可以配合訪談法，深入調查網友的身份經驗如何影響其留言，包含動機、使用和意義創造，以及平台的留言機制、新聞影片及廣泛的網路言論是否、又如何左右個人的留言意向和內容，這些將有助於掌握網路公眾的論述實踐。

## 參考書目

- 林宇玲(2023年4月)〈電視新聞挪用業餘素材與專業表現之個案研究〉,「第11屆新聞的政治、文化與科技研討會」論文,台北。
- 孫智辰(2012)〈學校社工人員在防制校園霸凌教育培訓之探討——和平教育觀點〉。《社區發展季刊》,139:180-192。
- Alharbi, R. S. (2017). ADHD in 140 characters or less: an analysis of Twitter commentary on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Saudi Arabia Rabab. *Univers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12), 2186-2195
- Allan, S. (2014). Witnessing in crisis: photo-reportage of terror attacks in Boston and London. *Media, War and Conflict*, 7 (2), 133-151.
- Anderson, C. A., & Bushman, B. (2002). Human agg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1), 27-51.
- Arribas-Ayllon, M., & Walkerdine, V. (2017). 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In C. Willig & W. Stainton-Rogers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pp. 110-123). SAGE.
- Bozdag E, van den Hoven J (2015) Breaking the filter bubble: democracy and design. *Ethics of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17(4), 249-265.
- Brunton, G. C., Todorova, I., Petrova, D., Carnegie, E., & Whittaker, A. (2018). Using 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to analyze young women's constructions of the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e. *Sage research methods cases*. <https://doi.org/10.4135/9781526440235>
- Carpentier, N. & Cammaerts, B. (2006). Hegemony, democracy, agonism and journalism: an interview with Chantal Mouffe. *Journalism studies*, 7 (6), 964-975.
- Carragee, K. M., & Roefs, W. (2004). The neglect of power in recent framing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2), 214-233.
- Duchastel, J., & Laberge, D. (2019). Beyond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leavage: Confluence of research operations in discourse analysis. In *Quantifying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for social scientists* (pp. 23-47).

-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 Entman, R.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51-58.
- Entman, R. M. & Usher, N. (2018). Framing in a fractured democracy: Impa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ideology, power and cascading network activ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2), 298-308. DOI: 10.1093/ct/jqx019
- Foucault, M.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L.H. Martin, H. Gutman, & P.H. Hutton (Eds),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London: Tavistock.
- Foucault, M.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London: Penguin Books.
- Goodarzi, M., Fahimifar, A. A., & Shakeri Daryani, E. (2021). New media and ideology: A cr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yberspace Studies*, 5(2), 137-162.
- Goode, L., McCullough, A. & O'Hare, G. (2011). Unruly publics and the fourth estate on YouTube. *Journal of Audience & Reception Studies*, 8 (2), 594-615.
- Grove, S. (2008). YouTube: The flattening of politics. *Neiman Reports*, 62(2), 28-29.
- Güran, M. S. & Özarslan, H. (2022). Framing theor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Selçuk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Enstitüsü Dergisi*, 48, 446-457. DOI: 10.52642/susbed.1142562
- Hänkska, M. & Bode, M. (2018). How the ubiquity of eyewitness media changes the mediation and visibility of protests in the news. In Robertson, A. (Ed.), *Screening protest: Visual narratives of dissent across time, space and genre* (pp. 98-119), Routledge.
- Hänkska-Ahy, M. (2016). Network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Arab Spring: linking broadcast and social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 18 (1), 99-116.
- Hall, S. (1980). 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In UNESCO (Ed.),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p.305-345), Paris: UNESCO.
- Hanna, P. (2014). 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in psychology: Reflecting on a hybrid reading of Foucault when researching “ethical subject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11, 142-159.
- Hansen, M.P., & Triantafillou, P. (2022).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Foucauldian analyses: Adopting the pointers of curiosity, nominalism, conceptual grounding and exempla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5(4), 559-577.
- Hardy, C., Harley, B., Phillips, N. (2004).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Two solitudes? *Qualitative Methods*, 2(1), 19-22.
- Jacobs, L. (2014). Framing of school violence in the South African printed media-(mis)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34(1), 1-16.
- Johns, A. & McCosker, A. (2015). Social media conflict: Platforms for racial

- vilification, or acts of provocation and citizenship? *Communication, Politics & Culture*, 47(3), 44-54.
- Jones, S. (2014). "Think before you tweet": A 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s of female alcohol consumption on Twitter. Retrieved from <https://e-space.mmu.ac.uk/576586/1/Saskia%20JONES.pdf>
- Kahn, T. H. & MacEachen, E. (2021). 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Moving beyond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nalyt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0, 1-9.
- Krek, J. (2020). Structural reasons for school violence and education strategies. *Center for Educational Policy Studies Journal*, 10(2), 145-173.
- Lee, C. S. (2019). Web series, YouTube, and politics: Affective and emotional dimensions of WIGS Lauren's user comments. *Social Media+Society*, 5(1), 1-12.
- Marres, N. (2005). Issues spark a public into being: A key but often forgotten point of the Lippmann-Dewey debate. In B. Latour and P. Weibel (Eds.), *Making things public* (pp. 248-26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cCosker, A. (2014). Trolling as provocation: YouTube's agonistic publics. *Convergence*, 20(2), 201-217.
- McCosker, A. & Johns, A. (2014). Contested publics: Racist rants, bystander action and social media acts of citizenship.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51(1), 66-72.
- Milliken, M. C., Gibson, K., & O'Donnell, S. (2008). User-generated video and the online public sphere: Will YouTube facilitate digit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Atlantic Canada? *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 10 (3).
- Mouffe, C. (1999).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r agonistic pluralism? *Social Research*, 66 (3), 745-758.
- Mouffe, C. (2005a). Which public space for critical artistic practices? In T. Joyce (Ed.) *Cork Caucus: On art, possibility & democracy* (pp.149-171). Berlin: Revolver Publishing.
- Mouffe, C. (2005b). For an agonistic public sphere. In L. Tonder & L. Thomassen (Eds.), *Radical democracy: Politics between abundance and lack* (pp. 191-205).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 Mouffe, C. (2008). Art and democracy: Art as an agonistic intervention in public space. *Open*, 14, 6-15.
- Mouffe, C. (2016).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conflict: An agonistic approach. *Política Común*, 9, 1-8, <https://doi.org/10.3998/pc>.
- Murthy, D., & Sharma, S. (2019). Visualizing YouTube's comment space: Online hostility as a networked phenomena. *New media & society*, 21 (1), 191-213.
- Naab, T.K., & Küchler, C. (2023). Content analysi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online user comments. In Oehmer-Pedrazzi, F., Kessler, S.H., Humprecht, E., Sommer, K., Castro, L. (Eds). *Standardisierte Inhaltsanalyse in der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 Standardized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pringer VS, Wiesbaden.

- [https://doi.org/10.1007/978-3-658-36179-2\\_37](https://doi.org/10.1007/978-3-658-36179-2_37)
- Ng, C.W. (2018). Critical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es of news discourse on Facebook and YouTube. *Journal of Asia TEFL*, 15, 1174-1185.
- Papacharissi, Z. (2009). The virtual sphere 2.0: The Internet, the public sphere, and beyond. In Andrew Chadwick and Philip N. Howard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et politics* (pp. 230-245),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arker, I. (1992). *Discourse dynamics: Critical analysis for social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 London, UK: Routledge.
- Pechorro, P., Marsee, M., DeLisi, M., & Maroco, J. (2021). Self-control and aggression versatility: moderating effects in the prediction of delinquency and conduct disorder among youth. *J. Forensic Psychiatry Psychol*, 32, 949-966.
- Raine, A., Dodge, K., Loeber, R., Gatzke-Kopp, L., Lynam, D., Reynolds, C., & Liu, J. (2006). 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boys. *Aggressive Behavior*, 32, 159-171.
- Rocha, C. & Medeiros, J. (2021). Jair Bolsonaro and the dominant counterpublicity. *Brazi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 (3), 1-20.
- Sam C. H. (2019). Shaping discourse through social media: Using 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s that influence educational polic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3(3), 333-350.
- Snelson, C. L. (2016). 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social media research: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15(1), 1-15.
- Springer, N., Engelmann, I., & Pfaffinger, C. (2015). User comments: Motives and inhibitors to write and rea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7), 798-815.
- Taiwo, R., Akinwotu, A., & Kpolugbo, S. (2020). Linguistic impoliteness and Interpersonal Positioning in Nigeria Online Political Forum. *Linguistik Online*, 109(4), 113-132. <https://doi.org/10.13092/lo.109.8028>
- Tekin, S. & Drury, J. (2022). A critical discursive psycholog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ow disaster victims are delegitimized by hostile Twitter posts: Racism, victim-blaming, and forms of attack following the Grenfell Tower fire.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2(5), 908-922.
- Toepfl, F., & Piwoni, E. (2015). Public spheres in interaction: Comment sections of news websites as counterpublic spac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5(3), 465-488.
- van Zoonen, L., Mihelj, S. & Vis, F. (2011). YouTube interactions between agonism, antagonism and dialogue: Video responses to the anti-Islam film Fitna. *New Media and Society*, 13(8), 1283-1300.
- Walter, S., Brüggemann, M. & Engesser, S. (2017). Echo chambers of denial:

- Explaining user comments on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12(1),1-14.
- Warner, M. (2002).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Public Culture*, 14(1), 49-90.
- White, L. (2018).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emiotics, structuralism and content Analysis. In R. Nunkoo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 pp 373-383.). Surrey: Edward Elgar.
- Willig, C. (2008). *Introduc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Adventures in theory and method* (2<sup>nd</sup> ed.). Maidenhead, UK: McGraw-Hill.

## “Is Reactive Aggression in School Violence Justice?”- Agonistic Struggles in Specific YouTube Comment Sections

Yuling Lin

### ABSTRACT

Using the agonistic approach,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gonistic struggles within the YouTube comment section of Taiwan's TVBS news videos on 'Fight back with the Box Knife' through mixed methods. The study reveals three significant findings. Firstly, news videos have the ability to arouse netizens'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s on events. However, these comments went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news, not only deviating from mainstream values and official views but also presenting various language styles and multiple viewpoints on aspects not covered by the news. Second, the public in the comment section is diverse, participating in cultural practices and engaging in debates over the definition of "reactive aggression" through their comments.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s and discourses have emerged: rational publics opposing reactive aggression, sympathetic publics advocating for appropriate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angry publics endorsing a tit-for-tat response, with the latter being the most prevalent. Lastly, the comments are mainly personal expressions, but there are still netizens attempting to exchange views with those holding different positions, leading to more distinct agonistic struggles. Lastly, the comments are mainly personal expressions, but there are still netizens attempting to exchange views with those holding different positions, resulting in more distinct agonistic struggl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hate' speeches in the comment area, which may go beyond the scope of 'agonistic struggle,' aiming to turn dissidents into enemie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Keywords:** agonism, discourse, publics, school violence, YouTube comments

---

\* Lin Yul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ylin@mail.shu.edu.tw

# 穿在身上的歷史： 解放軍服制演化的政治邏輯

劉正強\*

## 本文引用格式

劉正強（2024）。〈穿在身上的歷史：解放軍服制演化的政治邏輯〉，《傳播、文化與政治》，19:41-68

---

投稿日期：2023 年 11 月 17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4 月 15 日。

\* 劉正強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e-mail: lzq@sass.org.cn

## 《摘要》

作為最早出現的制服，軍服是軍人身份最為鮮明與直接的標誌，體現了實用、審美、政治諸種價值，成為國威、軍威與民族精神的象徵。軍服的符號內涵、大眾感知乃至媒介詮釋構成了戎裝文化的主要內容。在解放軍的發展歷程中，從創始與鬥爭的年代，到革命與建設的年代，再到改革與開放的年代，曾有大大小小十數次的服制改革，其變遷的脈絡透視和體現了黨指揮槍的政治邏輯，浸潤著英雄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情懷，形成了基於人民軍服的政治秩序：一方面，堅守軍服的革命本質和政治本色，以體現其肅軍容、壯軍威的象徵意義與觀瞻功效，尤其是保持對軍人身體從而靈魂的革命化馴服；另一方面，又適應現代化與正規化的要求，不斷完善軍服禦寒暑、利征戰等實用功能，形成了具有大陸特色的現代軍服體系，其所內含的「變」與「常」的演化邏輯折射了解放軍政治建軍的發展規律。

**關鍵詞：**戎裝文化、軍服、革命化、演化邏輯



軍服滲透到流行文化中的方式遵循的是這樣一個過程，從必需品，到反抗的象徵，再到表達敬意的方式（Fussell,2002／馬俊傑、陳召強譯，2023，頁 180）。

「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軍隊是執行特殊任務的武裝集團，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暴力機器，因而，軍隊也是最早統一著裝的職業群體。作為最早出現的制服，軍服構成了軍人身份最鮮明、最直接的標誌，從禦寒暑、利征戰等實用價值到肅軍容、壯軍威等觀瞻功效，軍服包含了識別、象徵、防護等諸多功能。由中共締造的這支軍隊，從創始與鬥爭的年代，到革命與建設的年代，再到改革與開放的年代，曾進行過十幾次換裝，其服制從粗陋到精緻、從單一到系列，形成了具有大陸特色的現代軍服體系。解放軍服制的變遷所內含的政治邏輯折射了中共政治建軍的發展規律，亦構成強化國家認同、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本文致力梳理解放軍「穿在身上的歷史」，以期對此形成更深刻的解讀。

## 壹、穿出來的歷史：回望解放軍的服制變遷

軍服是一國軍隊的獨特象徵，是國威、軍威的具體展現，構成軍隊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軍服不僅是軍人生活的必需品及重要的戰備物資，更是區分軍人等級、顯示軍人身份的標識，承載著國家賦予軍人的榮譽，展示著軍人的儀表，體現著軍人的相互關係和精神風貌。軍服亦稱軍裝，軍裝是一種「武」裝，更是一種「文」化，包含了人們對國家、軍事與戰爭的理解。中國人民解放軍（及其前身）是由中共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在其發展歷程中，其服制也歷經更迭，經歷了一個從無有到、從有到全、從全到優的滄桑巨變。尤其是中共建政以來，軍服制式改革就達 15 次之多，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實施軍銜制的 55 式、具有政治平等色彩的 65 式、恢復軍銜制的 87 式及沿用至今的 07 式，由品種性能單一走向品種系列化、功能綜合性。換裝，對普通百姓來說司空見慣，對軍人來說卻意義非凡，軍服變遷體現了中共軍隊的發展歷程及其不斷追求威嚴、文明、完美的道路。

## 一、從無到有：創始與戰爭的年代

在中共建政前，戰爭年代異常艱苦，中共軍隊一直面對著強大的敵人，需要做長期卓絕的鬥爭。囿於戰時環境與條件的限制，彼時軍隊對於「穿衣戴帽」無暇顧及，只能因陋就簡、將就應付，故而無法形成完整的軍服體系，只能拿來主義，甚至一度穿過對手國民黨軍隊的服裝。1927 年，在後來被確定為中共建軍節的南昌起義中，「紅軍」從國民革命軍的營壘中脫胎而出，只能著對方的軍服，僅加系紅領巾以示區別。在同年的秋收起義中，參加者或著便服或著原國民革命軍軍服，仍系紅布袖章以示區別。井岡山鬥爭時期，紅軍的服裝沒有統一的樣式，主要依賴自帶、自製、打土豪及戰場繳獲，全國各地紅軍的軍服五花八門。1928 年，紅軍在江西寧岡縣建立起第一個被服廠——桃寮被服廠，並開始設計生產軍服。在款式上，參照當時蘇聯紅軍軍服和列寧戴過的八角帽式樣，形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基本款式，從此紅軍有了自己的制式服裝：灰粗布中山裝加綴平行四邊形紅領章、八角帽加綴布質紅五星帽徽，打綁腳。中共軍隊從一開始就把象徵著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神聖使命的紅色元素印在了自己的行裝上，老紅軍楊光明回憶了參軍時老同志的教導：「帽子上的紅五星表示五大洲，我們不但要打倒中國的反動派，使全中國的窮苦人民有飯吃、有衣穿，還要實行世界大同」（楊光明，2006 年 10 月 23 日）。但總體上紅軍的供給十分困難，只夠配備少數部隊，絕大部分部隊只能自己動手、土法上馬。中共軍隊著裝的改善始於抗日戰爭時期，為一致對外、抗擊日軍，國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中共及其軍隊審時度勢，紅軍主力和遊擊隊分別改編為

圖一：戴八角帽的毛澤東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aqxk3l>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和新編第四軍，服裝則由被紅軍視為對頭的「蔣委員長」配給，在樣式上基本上與國民革命軍其它部隊相同，八路軍服裝是土黃色，新四軍服裝則為灰色，左臂佩戴長方形「八路」、「新四軍」字樣的臂章。1940年後，國共之間不斷發生摩擦，被服斷供時有發生，各部隊便想方設法自行生產或採購一部分，用以補充。內戰初期，中共軍隊的服裝樣式與抗日戰爭時期相同，1947年3月，中共領導的軍隊正式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取消「八路」、「新四軍」臂章，各部隊分別佩戴標有番號的臂章或胸章。內戰後期，隨著一批國民黨軍隊軍需工廠的接管，解放軍初步具備了統一生產和供應服裝的條件。1949年1月，中共軍委後勤部規定了全軍統一的服裝樣式：軍服為草綠色棉平布中山裝，胸前佩戴長方形布胸章，印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軍帽為圓形短簷帽（後來被稱為「解放帽」），佩有「八一」字樣的紅五角星。1949年10月參加開國典禮閱兵式的部隊穿的就是這種軍服。由於戰爭尚未結束，此時，解放軍仍然沒有實現全軍統一服裝。

## 二、從有到全：革命與建設的年代

中共建政後，解放軍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由單一軍種發展為陸海空三大軍種。根據軍隊正規化建設的要求，在全軍範圍內統一軍服樣式的條件具備、時機成熟。在革命與建設時期，中共軍隊數易其服，其變遷既為國家經濟條件制約，亦受民族傳統文化尤其是政治氣候影響。1950年1月，中央軍委批准實行新的軍服樣式，簡稱50式軍服，這是解放軍最早統一的全軍服制。新軍服的突出特點是按顏色與樣式區分陸、海、空三軍，陸軍服裝顏色為淺黃綠色；海軍常服為藍色；空軍上裝為淺黃綠色，下裝為藍色；官兵、男女的服裝亦有區別。關於佩飾，官兵均佩戴「八一」五角星圓形帽徽，三軍幹部上衣佩戴「中國人民解放軍」布胸章（韓戰出兵時，一度佩戴「中國人民志願軍」布胸章）。實行軍銜制是各國軍隊的標配，早在1953年，中央軍委就開始籌備與研製軍銜服裝。於1955年10月1日起實行的55式軍服參照了蘇聯和東歐國家軍服樣式，結合了自己服裝的特點，樸實大方、莊重美觀，特別是第一次形成了常服、禮服兩大類別。其後十年間也不斷改進、

日臻完善，邁出了軍服體系化、系列化的重要一步。但中共首領毛澤東對體現了鮮明等級色彩的軍銜制一直持保留態度。1964 年夏，他在聽取賀龍、羅瑞卿關於軍隊幹部的減薪方案，當賀龍請示要不要把軍銜制一起取消時說，「取消，這個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之前，毛澤東不止一次表現出對軍銜制的不屑：「我看到那個牌牌就不舒服，過去沒有牌牌打勝仗，現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敗仗了」（徐平、楊廷欣，2009，頁 148）。

確實，55 式軍銜軍服與消除階級差異的社會氣候形成了內在的衝突，軍銜服裝的等級表面化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助長了個人名利思想和等級觀念，不符合軍隊優良傳統，不利於革命化建設，不利於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和軍民之間的團結。毛澤東還說，「過去搞什麼將、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興趣的。」「我贊成走回頭路，恢復到老紅軍的樣子，只要一顆紅星、一面紅旗，其他的統統都吹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3，頁 1392）。1965 年，完全顛覆 55 式軍服設計思想、備受矚目又廣受爭議的 65 式軍服進入人們的視野。65 式軍服取消了象徵等級制度的軍銜制，全軍官兵一律戴解放帽、佩戴全紅五角星帽徽和全紅領章。海軍軍服樣式改為與陸、空軍相同，顏色為深灰色。全軍幹部和戰士，男、女軍人軍服衣料、式樣基本相同，人們只能從上衣口袋區分幹部和戰士，以領子區分男女服裝。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解放軍剛剛換裝一年，紅五星、紅領章走紅，引領了社會時尚，曾為社會大眾所喜愛。65 式及其改進型 71 式、74 式、78 式從 1965 年至 1985 年整整實行了 20 年，被普遍認為是最具大陸特色、裝備時間最長、發放量最大的軍服。這期間中共兵員也最多，在 20 世紀 70 年代中後期曾超過 600 萬人，平均每年都有上百萬名新兵入伍，累計有數千萬人穿過這套軍服。

### 三、從全到優：改革與開放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的重心逐步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兩大主題這一判斷的確立，中共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戰略性轉變，即由準備「大打、早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軍隊的建設與發展從片面突出政

治、「政治掛帥」的僵化思維中解脫出來，開始步入現代化、正規化的軌道，再度在全軍實行軍銜制就體現了這一要求。1985年裝備部隊的85式軍服，主要沿用55式軍服樣式，幹部、戰士增發制式襯衣，增發大簷帽，解放帽作為工作帽予以保留；圓形「八一」徽和軍種肩章、領章取代了全紅五角星帽徽和全紅領章。85式軍服在用料、服飾方式雖有改善，但仍顯單一。此後，軍委確定實行禮服、常服、作訓服分類的原則。為配合實行軍銜制，1987年確定的87式軍服功能齊全、樣式美觀、用料講究，徹底改變了此前軍服長期單一的落後狀況，標誌著解放軍軍服進入一個系列化的新階段。但條件所限，士官、士兵服面料仍較落後，軍官禮服等沒有普遍裝備。隨著大陸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研製面向21世紀的與國際先進軍服接軌的新一代軍服已是箭在弦上。1997年7月1日，駐港部隊著作為新一代軍服雛形的97式軍服亮相。之後，99式服裝作為預先裝備部隊的新一代軍服的一部分，自2000年5月1日起也陸續下發。2007年，07式軍服作為歷次服改的集大成者，以其系列化、人性化、國際化的嶄新姿態推出，真正實現了中共軍服的跨越式發展。新式軍服吸取了世界其他國家軍服的長處，在結構、用料、顏色、服飾及配套方面均有較大改善，樣式、顏色更加美觀大方，形成了陸軍以棕綠色為主色調、海軍以白色和藏青色為主色調、空軍以蔚藍色為主色調的三軍軍服顏色系列。新式軍服理順了軍服體系，採用國際流行軍服的分類，按功能分禮服、常服、作訓服和工作服四大系列。此外，與國際理念相銜接，增加了胸標、領花、姓名牌和級別資歷章等佩飾，增強了識別功能，強化了服裝美感。07式軍服是中共軍隊有史以來改革動作最大、品種最全、改動最多、投資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也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統、最順利的一次軍服改革。

綜上，中共與軍隊特殊的關係不能不使軍隊服制變遷帶有深深的政治印痕。中共用「槍桿子裡出政權」這一話語非常直白地刻畫了軍隊在「打天下」中的極端重要性，「得天下」後又強調「坐天下」，以「黨指揮槍」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原則將軍隊嚴格置入黨的控制之下。戰爭年代，中共軍隊的著裝五花八門、雜亂無章，卻以「無產階級」軍隊自居，通過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建構起新型軍隊的形象。中共建政後，與蘇聯關係進入了一個「蜜月期」，致使在軍隊服制上也全盤蘇化，比較超前地引

入了軍銜制，配備了大簷帽、船形帽等時髦裝備；進而，當中蘇關係交惡、破裂時，尤其是在當時平均主義的政治氛圍下，55 制式被徹底拋棄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取而代之的 65 式軍服則非常契合那個政治癡狂的年代，彼時軍人是全民中的鮮亮角色，軍裝更是暗灰色調中的一抹濃彩，這種綠軍裝、紅帽徽與紅領章見證了大陸軍人的「高光」時期，時至今日，65 式軍服的變種仍然見諸一些國家的軍隊。無疑，鄧小平時代是一個去政治化或政治隱性化的務實時代，在軍隊「三化」（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目標中，革命化成為了一個修飾語，而藉由中越邊境實戰的檢驗、改革開放的倒逼，尤其是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改革開放時代的 87 式軍服以實用見長，一如軍人在大陸政治生活中的祛魅與回歸理性。嚴格地講，到了世紀之交，中共軍隊服制才完成了從突出政治、到講究實用，再到強調美觀的轉變。首先配發駐港澳部隊的 97 式軍服在 10 年後定型為 07 式服制全軍配發，此時的軍服其樣式、用料尤其是配飾已與發達國家軍隊的服飾難分伯仲，甚至有過之無不及，甚至其華麗、花哨程度與人們對中共軍隊的傳統認知形成了某種斷裂。

## 貳、身體的革命化：基於軍服的政治秩序

從文化意義上說，服裝是皮膚的延伸，是身體的組成部分。而身體作為政治權力、價值觀念與文化習慣所規制與調控的客體，有賴於服裝充當這種社會控制的仲介與工具，使社會規則身體化，從而建構起秩序化的身體。但身體並不是被動的社會意義接收者，他們為形塑特定的身體意象而對服裝或迎或拒。中共非常重視身體的革命，在其政治話語中，中國解放軍（及其前身）是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對於作為其成員的軍人，「無論思想再造還是行為重塑，中共革命中的新人塑造都內含強烈的身體指向」（滿永，2016）。軍服之於軍人魂魄與精神的塑造、使命與擔當的錘煉充分體現了軍人身體革命化的實踐，這種規訓不但重塑著軍人的身體政治，而且生產與再生產著基於軍服的政治秩序。

## 一、馴服身體：政治的具象與在場

身體政治 (body politics) 是一個圍繞著身體、政治、文化為主題的具有後現代主義傾向的話題，涉及實踐和策略，即社會中的各種權力把人類身體當作實踐物件來干預、管理、控制、規訓乃至征服，而

圖二：65 式軍服中的帽徽與領章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IQYDpA>

個體及其身體對社會控制亦可做出反抗。宗教中的禁欲主義對信徒的身體約束、監獄對犯人人身密不透風的管控固然強烈，但遠沒政治權力來得那麼淋漓盡致。「身體政治」不同於「肉體政治」(carnal politics)，它並不限於肉體的物質層面，還擴展並延伸至社會性身體的領域。韋伯 (M. Weber) 等人有關身體政治的

話語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都把身體與宏大的社會背景聯繫在一起，探討與身體有關的政治權力與現代理性。福柯 (Foucault) 的論述則向人們展示了通過對身體隨心所欲的規劃、擺弄，各種組織與制度如何圍繞著身體展開的爭鬥。在這種情況下，當生物性的實體漸漸退去，微觀權力早已潛移默化地滲透至身體的每一個毛細血管，身體被置於一個機構控制的被動境地，籠罩在一個知識教化和權力干預的區域內，並作為某些權力與制度的實踐物件加以對待。通過知識規訓對身體的滲透，微觀的權力不動聲色地透過身體呈現出來，將社會中各種組織和制度的意圖身體化 (Foucault, 1977 / 劉北成、楊遠纓譯，2007，頁 52)。

中共革命的歷程伴隨了中共對民眾尤其是軍人的身體動員。黃金麟 (2005，頁 323) 通過對身體的國家化、法權化、時空化來解讀身體在近代中國發生的變化，認為中共非常嫻熟地掌握了身體動員的技藝，將革命的身體變成了中國身體的模樣。「這個源自蘇維埃時期的經驗產物一直支配著中

國，直至共產黨人決定以『現代化』來取代『革命』的旗幟為止……」。在中國傳統的文化結構中，身體是柔弱與感性的，因而是需要被精心呵護的，保持身體的私人性與家族性一度被賦予了深刻的倫理意義，如《孝經》中指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充分體現出傳統文化對於身體的重視。中共的意識形態則重新定義了身體，「翻身」就是以身體理解國家與個人命運的顛覆性變化。中共革命「新人」目標追求的前提，是使「身體的意義和價值完全被嶄新的政黨倫理所賦予。由此，人的自然身體與政治身體發生了分離」（應星，2009，頁 147）。這集中表現在中共軍隊對其成員的錘煉上——誠如毛澤東（1990，頁 70）所言，「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軍人的身體實踐正是軍服與操練相互結合的動態過程，「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只有在肉體既具有生產能力又被馴服時，它才能變成一種有用的力量」（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纓譯，2007，頁 27）。正是因為如此，解放軍在軍服設計與穿戴要求諸方面形成了精細的控制技術，通過著裝再造軍人革命、健康、力量、集體的身體。在早期，中共軍隊脫胎於「舊式軍隊」，消沉情緒、軍閥習氣、投降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部隊中瀰漫，毛澤東等共產黨人通過三灣改編、古田會議等逐步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雛形。儘管當時軍服本身相對粗陋，甚至長期著國民黨部隊的服裝，但中共軍隊的精氣神俱在，通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型塑了革命化的軍人，軍人行為與軍人形象互為表裡。

進入熱兵器時代後，尤其是隨著現代戰爭的來臨，軍服本身已難以具有傳統「鎧甲」般的防護作用，其形式與象徵意義則進一步凸顯。作為一種身體符號，軍服不斷呈現與再生產著具象的政治，在不同時期展現出英雄主義、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精神氣質。回望過去，如果說軍服在戰爭年代是革命英雄主義的象徵，那麼在政治年代與和平環境中，軍服一度成為具有革命浪漫主義的裝束，承載和延續著軍隊「革命化」的內在精神：1965 年，毛澤東下決心取消了象徵等級差異的 55 軍銜式軍服，當時《關於取消軍銜制度的意見》曾指出：「過去沒有這種制度，也一樣打勝仗。實踐證明，這種制度不符合我軍的優良傳統，它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等級表面化，助長了個人名利思想和等級觀念。不利於我軍革命化建設，不利於同志之間、上下



級之間和軍民之間的團結」(舒雲, 2018, 頁 63)。65 式軍服僅用上衣口袋個數來區分幹部和戰士, 僅用領子樣式來區分男軍服和女軍服, 最大限度降低了官兵之間、性別之間、軍種之間、軍民之間的差異性, 紅帽徽、紅領章三點裝點的綠軍裝風靡大陸甚至海外, 承載了毛澤東改造國家體制、超越官僚主義所做的真誠努力, 塑造了一批最革命化的軍人, 大陸軍人形象在大眾中的地位達到高峰, 此前此後無出其右。具有極「左」色彩的 65 式軍服也引領了全民的政治時尚, 成為社會公眾認同感最高的一款軍服。不管是在政治時代的「文革」還是中越之戰持續期間, 這種國防綠以其簡潔、樸素、實用深得人們喜愛, 大陸民航、公安、鐵路、郵政等系統的制服無不以 65 式為模版。軍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新時代最可愛的人」的宣傳, 使民間仿製無數, 尤其是文革期間大陸一片綠, 軍服就是最漂亮的時裝, 成為過去那個年代青春和理想的代名詞。一旦認識到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主題, 尤其是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中共對軍隊的角色就有了新的定位, 這影響了對軍人身體與形象的重新構建。隨著承平日久, 軍事力量的威懾作用日益突出, 軍隊著裝需要顯示出武裝力量正規化的一面; 同時隨著社會的理性和道德相對主義的退潮, 人們更加認同軍事的職業化。1988 年, 久違了的軍銜軍服又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軍人的身體被佩綴有等級標識的軍服所包裹, 具有革命現實主義的色彩。中共馴服軍人身體的方式變得柔性: 西式開領解放了「風紀扣」——曾幾何時, 扣在上衣最高處的風紀是否處於閉扣狀態(而不管是否舒適、氣溫高低)是檢驗身體規訓程度的重要標誌; 不著軍服的軍人——文職人員開始出現, 對軍人履職的身體化要求有了分化<sup>1</sup>; 而對軍人非因公外出時著裝要求(必須、不得、可以等情形)的變化體現了國家對軍人身體管理的不同態度。<sup>2</sup>基於軍服的多元化, 軍人身體的多元與複雜性也得以呈現: 從僅有常服這一通用款式到作訓服的配發再到禮服的出現, 開始以多種方式要求和管理軍人身體。07 式軍服是迄今功能最為齊全的制式, 具有禮

---

1 部隊編制不著軍服的文職人員是國際慣例。1988 年在部分軍人改任文職時, 按相應軍官被裝供應標準發放服裝費用於自購服裝。但許多人感情上難以接受不穿軍服, 1992 年起全軍文職幹部統一配發軍官制式服裝。

2 解放軍不同時期的《內務條令》對軍人(尤其是士兵)非因公外出的著裝有不同的規定, 如 2002 年之前一般須著軍服, 2002 至 2018 年間的規定是必須著便裝, 2018 年之後則軍、便裝皆可。

服、常服、作訓服三個系列，共 644 個品種，而服飾更是多達 18 大類 389 件，實現了對軍人身體管理從粗放到精准的飛躍。

## 二、識別身體：使命的承載與可視

身體政治亦即治理與統治的藝術，它與國家的治理聯繫在一起，往往體現了被治理者的行動反應。在福柯（Foucault, 2004／錢翰、陳曉徑譯，2010，頁 91）那裡，治理術是「由制度、程式、分析、反思、計算和策略所構成的總體，使得這種特殊然而複雜的權力形式得以實施。」身體管理與社會治理之間具有內在的統一性，甚至是一個互為基礎的同構過程，即特定的社會秩序總是在呼籲著與其相對應、相協調、相匹配的身體規範。而如何在社會空間中對身體進行表徵是通往身體與社會關係認知的重要方式，在這個過程中，身體的自然性和私密性受到限制並被推向公共領域，呈現為身體的社會化表徵（劉濤，2017）。服飾最直觀的作用是對人體身份的展示，從而標定自己的社會屬性；統一的制服則批量地框定出某個群體，從而極大地簡化社會識別，促成社會的「有機團結」。軍服是制服的極致狀態，表徵著身體秩序的符號化，意味著其角色要求更可以藉此暢通無阻地施加於軍人身體。

中共極其重視政治建軍。早在 1929 年，古田會議決議就指明中共軍隊的前身——中國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而在長期的戰爭中，中共始終極其鮮明地反對單純軍事、雇傭的觀點，強調中共軍隊的政治定位。根據這支軍隊的架構，除擔負打仗的任務外，還擔負做群眾工作和生產的任務，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軍人既是戰士，更是人民的子弟兵、勤務員，是道德的楷模與社會的榜樣。對於一名合格的戰士來說，他所面臨

圖三：著 55 式軍服的雷鋒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Aj3A0Z>

的敵人並不限於戰場上的對手，還包括各種落後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因此，軍服具有很強的革命性質，必須表裡如一地展示人民軍隊的形象。入伍參軍就包含了對軍人身體的挑選：誰可以穿上軍服？建政之前，由於尚未取得執政地位，中共軍隊實行的是被稱為「絕對自願制」的志願兵役制，「即加入人民軍隊者皆出於自願，不計報酬，不確定服役期限，是最徹底的自願兵役制」（肖季文、朱鵬新，2009）。這種自願制是以廣泛的社會動員為基礎的，在中共的動員和號召下，參軍也意味著「參加革命」的政治宣示和政治實踐。中共建政後，大陸逐步建立起義務兵役制，但由於人口眾多、兵源雄厚，每年僅需極小比例的適齡適役青年入伍；同時，依照憲法「依法服兵役」是公民的「光榮義務」——這是憲法條款關於公民義務的規定中唯一一個「光榮義務」<sup>3</sup>。因此，參軍入伍往往通過個人自願與軍隊選拔相結合的方式實現，兵員徵募工作仍然延續了戰時政治動員的機制，成為一名軍人是出於報國的熱忱而不單純是法律的強制。這種政治化篩選機制背後的邏輯是，只有作為國家主人的人民才有資格保衛祖國<sup>4</sup>，「從思想上入伍」——兵員遴選更多地受制於體能、技能、智慧之外的因素，如政治觀點、言論表達、宗教信仰、家庭關係等，甚至包括照顧臺灣省籍、歸僑、歸眷青年、革命烈士和革命傷殘軍人子女、兄弟姐妹、軍隊幹部子女等特殊人群的規定。「政審」環節固然重要，而生理的身體甚至相貌亦受到嚴苛的審視——根據《應徵公民體格檢查標準》（全國徵兵網，2021），口吃、腋臭甚至女性公民之過於肥胖或瘦弱，超過規定面積的紋身、癍痕、白癜風、胎痣以及男青年紮耳眼等情形在體檢中可能被認為不符合兵役條件。

按照官方的話語，進入部隊、穿上軍服，只是完成了從一名老百姓到普通軍人的轉變，這是僅僅依賴新兵連幾個月的定型訓練就可以實現的角色轉換；更重要的是第二步，實現從一名普通軍人到「革命軍人」的轉變，將政治化與道德化的自我規訓烙在身體上。一旦規矩內化於身心，則會「從心所

---

3 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55條。

4 1955年的《兵役法》曾規定：「反革命分子和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和其他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都不得服兵役。」現行《兵役法》雖然去除了上述大部分內容，但仍保留了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不得服兵役的規定。

欲不逾矩」，這類似於一個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過程。解放軍服制幾經演變，對軍人的政治定義一以貫之又各有特色，如 65 式軍服與 07 式軍服的識別功能就有鮮明的差異。在長期政治年代裡集體主義思維定勢下，65 式軍服的紅綠基調是當時政治生態的縮影，表徵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浪漫與革命理想，它使軍人的使命可視、可知、可感。因而，建政初期 55 式軍銜服制的廢止，意味著軍隊的正規化讓位於革命化，符合歷史的邏輯。然而，軍隊首先是一個戰鬥隊、永遠是一個戰鬥隊，打仗和準備打仗是軍人的天職，革命化固然不可或缺，現代化與正規化更為緊迫。經過 85 式、87 式、97 式等的醞釀，全面體現軍隊職能、吸收國際元素的集大成者 07 制式軍服面世，軍銜、佩飾等由隱而顯，基於等級化、專業化、技術化的秩序更加清晰，是對軍人身體的一次全新打造與定義。特別是姓名牌、級別資歷章等佩飾的採納與國際接軌，顯示了中共軍隊的開放取向。其中，表明軍人身份的姓名牌是濃縮了多項資訊的「黑匣子」，是培育戰鬥精神、強化戰鬥意志的特殊載體，給人一種時刻準備出征的心理暗示。在軍官胸前的級別資歷章中，色條和五星的模組組合，共同體現出軍官的服役年齡和級別，既利實戰更予人以榮譽感，實現了政治與軍事的平衡。

### 三、昇華身體：形象的提煉與展演

冷、熱兵器時代戰爭形態的轉換顛覆了軍服的防護功能。現代武器的殺傷力與致命性極大地減損了軍服的防護性，坦克與裝甲車等兵器則承載了這種功能，是鎧甲與盔甲的擴展。雖然科技的進步不斷助力軍服功能的改進，但減少傷亡最根本的途徑是減少與遏制戰爭與衝突，軍服符號與象徵等形式化功能的凸顯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軍服不僅僅是戰服，它更體現了國家與民族的無處不在。從 1905 年西式軍服開始引入中國迄今，它就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密切關聯，成為革命內涵的形式外化和革命理念的承載介質，「軍服的象徵性功能就超過了它的物質性功能從而化身為意識形態的服飾樣本」（孫月，2009）。中共軍隊非常重視軍人形象的鍛造，把它作為體現人民軍隊性質、取得人民信任和保持與人民血肉聯繫的途徑。作為中共軍隊歷史與傳統的傳承，軍服是軍人的儀表載體，是軍隊的形象符號，展示了軍人特有

的陽剛之美。這突出表現在對軍人的形象建構上，英勇威武、品德高尚的軍人藝術形象一度活躍於大陸文壇、影壇的中心，長期成為大眾審美的「範本」。

軍人身體是革命化的身體、軍事化的身體，更是審美化的身體。軍服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昇華了軍人的體魄，塑造了健康陽剛的青春形象。軍服將軍人身體從倫理領域推向了公共視域，軍人身體不再是那個純粹的生理意義上的身體，而是作為一種攜帶意義的修辭符號進入到大眾審美中，成為可以承受公共目光審視的觀看對象。作為政治文本和表達媒介，身體「成為一個可見的存在物，它便承受著其他話語的微妙改造和意義入侵。通過身體的構造、特徵和變化，我們能夠窺視到一個時代的權力系統及其語言法則」（劉濤，2017）。中共開國之初，解放軍不僅是以一支武裝力量的身份，而且是以一種新道德的彰顯者、一種新文明的承載者、一種新制度的體現者進入國家的政治序列的，這使中共軍人先天性地承載著累累的榮譽和厚厚的期望。為展示中共軍隊威武之師、文明之師、勝利之師的良好形象，解放軍對軍人著裝、軍容與風紀有著嚴格、苛刻的規定，如 2018 版《內務條令》對軍人著裝與舉止的有關規定：「軍人服役期間不得文身。著軍服時，不得化濃妝，不得留長指甲和染指甲；不得圍非制式圍巾，不得戴非制式手套，不得在外露的腰帶上系掛鑰匙和飾物等，不得戴耳環、項鍊、領飾、戒指、手鐲（鏈、串）、裝飾性頭飾等首飾；不得在非雨雪天打傘，打傘時應當使用黑色雨傘，通常左手持傘；除工作需要和眼疾外，不得戴有色眼鏡。」「軍人必須舉止端正，談吐文明，軍語標準，精神振作，姿態良好。不得袖手、背手和將手插入衣袋，不得邊走邊吸煙、吃東西、扇扇子，不得搭肩挽臂。」幾十年來，解放軍服制日益走向精緻、美觀，除了大陸經濟實力的增強與接軌世界一流軍隊標準外，軍人身體的主體性回歸是更為深層的原因。而體型精幹、體魄強健、體能過硬的軍人形象，歷來都符合人們對軍人內在氣質和外在形象的最好期待。在長期和平的環境中，解放軍亦注重從美學上「建設」軍人身體，如新的軍事體育訓練大綱引入了體脂率（BMI）概念，以從體型上控制胖瘦。曾幾何時，軍服以寬肥為特色，簡單「粗暴」，直筒式、大褲檔、肥褲腿，追求一種過於整齊、統一的風格，身體服從於軍服。07 式軍服制式以人為本，突出了人性化、個性化、時尚化、審美化、國際化，強調「合身」，軍服要迎合、服務於身體的美。現在，官兵從入伍開始每個人就擁有屬於自己的服

裝檔案，對軍官禮服則單量單裁，這是史無前例的。佩飾增多並不斷完善，如級別資歷章（勳表）、姓名牌的裝配，賦魅於軍服，彰顯了個性和榮譽。佩戴姓名牌符合國際公約的規定和國際紅十字會的要求，這有利於軍人身份的識別和救護。戰爭攸關生死，傷亡不可避免，姓名牌可以少一些無名英雄和無名烈士，這是對生命的尊重。07 式軍服承續 55 式軍服的未竟使命，打造出威武華麗、典雅莊重的禮服，集中體現了軍服的觀瞻功能，是對軍人、軍隊形象的亮麗展示。純粹審美化的禮服為軍人身體注入了審美的意涵，為社會提供了注視的介面，是美感與詩意的結合。

綜上，中共軍隊的服制經歷了從穿得上到穿得好再到穿得美的一個歷史跨越過程；進而，軍服對於軍人身體塑造與管理的方式也走向文明與開化。在戰爭年代，中共軍人穿的是百家衣，而在建政後，在窘迫的經濟條件下，軍裝的供應曾長期發新收舊。然而，這些粗陋的軍裝往往散發著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它本身甚至連上面的補丁都是具有魔力的符號，使軍人本能、衝動的身體受制於一種超肉體的秩序。中共軍隊最新款的 07 服式，則是從容、主動而為的產物，並且合於官方關於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意識形態敘事，軍服在一定意義上配合了身體的審美，折射出中共軍隊秩序建構的文明與人性向度。不過，這款軍服也有過度審美化傾向，如官兵增加了星標、臂章，士兵增加了國防服役章，短袖夏常服、領尖部分分別增加了領花和星標等，有人為填「空」之嫌，而最有價值的功勳榮譽標識卻沒有包含在內，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 參、戎裝文化及其社會效應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著極為濃厚的兵文化傳統，從軍報國向來是有志之士的遠大抱負：班超投筆從戎、木蘭替父從軍、馬援馬革裹屍、韓信背水一戰——從官方到民間的征戰故事俯拾即是。中共建政後，大陸周邊環境並不太平，邊境衝突時有發生，甚至一度處於一種「大打、早打、打核戰爭」的臨戰氛圍裡，這使得軍隊的價值持續凸顯，軍事原則以一種巨大的慣性力量向和平社會延伸，幾乎滲透於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硝煙和鮮血中走來的中共

解放軍享有特殊的身份、擁有特殊的價值，革命軍人成為全社會效法和謳歌的對象，在社會生活乃至文壇、影壇中長期處於中心位置。改革開放後，特別是隨著中蘇關係的正常化，軍隊從臨戰狀態轉入和平建設時期，步入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軌道，軍服所象徵的那種鮮明政治氣息不斷淡化和隱退，軍人的身份得以重構，大眾的記憶得以刷新。

## 一、身份衍變：在便裝與戎裝之間

中共建政後，帶有戰爭年代色彩的軍人形象，以各種方式被渲染、推崇和鞏固著，作為整個社會效仿的榜樣，起到了振奮民族精神的作用。而臨戰氛圍、全民皆兵所形成的舉國迎敵態勢，不斷強化著軍人的英雄形象與犧牲精神，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掛帥的社會環境中達到極致。軍服是軍人形象、地位、作用的名片，見證了這一時期的政治審美與浪漫。這突出表現為軍人的全角色化。角色作為戲劇、電影中的一個專用名詞，後被著名社

圖四：著 55 式禮服的十大元帥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70Vkbd>

會學家米德（Mead）引入社會科學領域並賦予其社會學的意義。所謂角色指個人在社會中以一定的社會地位、身份和職業，去進行社會活動時所遵循的行為規範及模式。人們往往因為負有若干種權利與責任而擔當著若干著角色，如家長、顧客、職員等。但個人不是各種社會角色的簡單相加，在擔當各種社會角色並按相應的要求行事外，人們還保有一個同各種角色無關的豐富自我，如性格特徵、處事方式、秉性愛好等，這些都無礙於人們履行各種社會角色，對此的認可可稱為非角色意識。作為國家利益的

會學家米德（Mead）引入社會科學領域並賦予其社會學的意義。所謂角色指個人在社會中以一定的社會地位、身份和職業，去進行社會活動時所遵循的行為規範及模式。人們往往因為負有若干種權利與責任而擔當著若干著角色，如家長、顧客、職員等。但個人不是各種社會角色的簡單相加，在擔當各種社會角色並按相應的要求行事外，人們還保有一個同各種角色無關的豐富自我，如性格特徵、處事方式、秉性愛好等，這些都無礙於人們履行各種社會角色，對此的認可可稱為非角色意識。作為國家利益的



直接捍衛者決定了軍人必須具有強烈的角色意識——凡是統一著裝的行業如公檢法、海關、稅務等部門一般都具有這種職業要求。但軍人的全角色化不但表現為他們對自己作為軍人身份的壓倒性認同，也體現了社會與大眾的過度道德化期望——他們的形象是高大全式的，是全社會的道德典範，是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和永不疲憊的活雷鋒，政治化與道德化的軍人角色壓倒與遮蔽了其他角色，如作為子女的兒女親情、作為顧客的享受服務等受到抑制。同時，按照中共政治建軍的要求，要摒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情調，導致軍人缺乏非角色意識，造成了千人一面的臉譜化場景，尤其是文藝作品中的軍人形象一度是雷同化的，無論是語言方式還是行為方式，甚至連死亡方式也是程式化的、相似的。這影響了軍人著裝的傳統和要求：長期以來，按照解放軍《內務條令》的要求，軍人非因公外出時須著軍服，這不僅僅是一道風景線，更是軍人崇高道德形象的在場與可視。軍服的規訓與大眾的注目，見證了軍人助人為樂、見義勇為、尊老愛幼的道德實踐，軍裝成為連接社會與軍營的符號與媒介。

然而，這不但常常導致軍人的疲憊不堪，而且使他們陷入道德綁架的尷尬境地——見義勇為固然值得宣導，但隨著大陸警務力量的壯大和完善，人們逐漸習慣於由員警按照專業分工來處理社會治安與公共安全事件；另一方面，助人為樂、先人後己的要求常常使他們在公共場合無所適從，如乘公車時有座不敢坐，面對「軍人優先」的窗口猶豫不決等。

改革開放以來，新一代軍人有了更多的獨立意識、法治理念甚至懷疑精神，對他們來說，軍服是工作服的一種，主要在工作 and 執行任務時穿著，不分場合地穿著給人以招搖之感。作為對這種情況的因應，1990 年

圖五：1984 年閱兵時著 85 式軍服的女兵方隊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gGYDGz>



的《內務條令》規定軍官、士官和學員非因公外出<sup>5</sup>應著便服，但普通戰士僅探家期間可著便服。2002年《內務條令》則一概規定軍人非因公外出須著便服。當時軍方人士給出的解釋是，如此規定是為了減少著軍服人員在社會公共場所的流動量，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個人某些不當行為給部隊帶來整體的負面影響，有利於維護軍隊形象（央視網，2002年5月18日）。此後，解放軍的服制改革繼續推進，繼04、05制式小規模配發後，2007年軍服集大成者07制式裝備部隊。這一段時間，隨著大陸國力的提升和社會分工的完善，人們對於軍事職業和軍人價值的認識也更加理性、更少苛刻。然而在公開場合軍人難覓——著裝的規定使他們不得不處於隱身的狀態。固然，軍人外出著軍服可能因個別人軍容不整、形象不端甚至違法亂紀影響整個軍隊的形象；然而，如果軍人外出著便裝，承載軍人認同的軍服被「雪藏」的話，又如何展示軍隊的形象？16年後的2018年，新的《內務條令》對此採取了務實與折衷的辦法，規定非因公外出時的著裝由軍人自行確定，即：可以著軍服，也可以著便服，這是非常符合人性的規定。

## 二、價值流變：在奉獻與尊崇之間

多年以前，大陸作家魏巍的一紙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曾引發廣泛關注，軍人作為「人民子弟兵」成為全體人民學習的榜樣，其光輝形象映照了數代人。軍服是這支軍隊形象的載體，而人們對軍服的模仿體現了他們對軍人價值與地位的追隨。尤其是65式軍服這一「軍事共產主義」色彩的服裝亦是革命文化的組成部分，包含著青年人對英雄的崇拜和革除社會弊端的革命精神（谷贊，2007）。尤其是在文革時期，隨著「奇裝異服」的被橫掃，軍裝與軍便服的流行與大眾日常的政治化相映成趣，在革命的名義下強化了人們思想的統一。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後，在歷史的慣性下，尤其是在集體主義的思維定勢下，人們仍從政治意義上看待軍隊、理解軍人，並不把從軍當作一種純粹的職業來對待，穿上了軍裝就意味著選擇了犧牲、奉獻、付出——人們對於穿軍服的子弟兵的親切並不是偶然的。隨著大陸周邊軍事

---

5 另外，不同版本的《內務條令》一般規定「軍人懷孕期間和給養員外出採購時」應著或可以著便服。

摩擦的消弭，戰爭似乎變得更加遙遠。社會逐步改變了對軍事職業的認知，「開始重新審視軍人的勞動價值和勞動特殊性，逐步認識到軍人同物質生產的勞動者和服務行業的勞動者一樣，也創造價值，這個價值是‘國家安全’；軍人勞動是社會分工協作發展的結果，是社會總體勞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物質生產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同樣也要兼顧效益和公平」（陳以民，2014）。和平之維繫須以強大的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為後盾，所謂的歲月靜好，「只不過是他們在負重前行」；解放軍進入了從容進行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時期，軍銜制開始恢復，職業化開始探索。軍人的奉獻與犧牲固然值得提倡，但他們的付出理應得到相應的回報，這是社會倫理的起碼要求。

軍服是榮譽的象徵。從 87 式到 07 式，軍服系列不斷豐富、完善，對應於軍人的不同身份，實現了常服、作訓服和禮服等的分化。其中禮服是軍

人受到禮遇與尊崇

圖六：電影《芳華》劇照（主人公著 65 式軍服）

的鮮明、直觀標誌，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GjNApp>

有助於重塑社會對於軍人的理解和感知。曾幾何時，社會價值取向日益多樣，「最可愛的人」光環慢慢褪色，大陸軍人社會地位、價值認同有所弱化，而新式軍服則是對軍人尊崇感的一種擦亮和刷新。新軍服的亮點之一

是服飾多達 18 大類、389 件之多，其點睛之處在於國際軍界通行的級別資歷章設計，實現了軍人尊崇的視覺化。軍人以「執干戈以衛社稷」為業，隨時面臨生死考驗。新式軍服的姓名牌設計包含了對軍人生命的尊重，目的在於軍人萬一遭遇不幸時，可以迅速確定身份，便於識別和救護。姓名牌是日內瓦議定書和國際紅十字會規定的內容，更是許多國家的實踐（許澤，2007

年 8 月 14 日)。在歷史上，士兵的生命往往如螻蟻般卑微，得不到尊重，「一將功成萬骨枯」，那些戰死的士兵常常橫屍荒野，無從知曉。中共軍隊在戰爭時期，由於條件限制，對於軍人身份牌無暇顧及，導致許多無名烈士難以確定身份。這次的設計彌補了這一缺憾。軍服還承載了退役軍人的記憶，對他們來說，一日從軍、終身為兵，他們的歷史與記憶需要借助軍服來刷新與盤活。2019 年，大陸組建之久的退役軍人事務部等部門發佈退役軍人參加大型活動時著舊軍裝的辦法，包括佩戴服役期間獲得的各種勳章、紀念章或綬帶等。這種規定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是對軍服所體現的榮譽的延展。

### 三、形象嬗變：在世俗與神聖之間

軍服宣示與詮釋了軍隊的形象，是社會大眾洞悉這個特殊群體的平台與視窗。大陸軍人的著裝往往有著新聞與傳播的意蘊，不但反映了不同時期的政治徵候，也引領著特色迥異的大眾時尚。因而，每每整齊劃一的大規模換裝，都會刷新人們關於軍服的記憶與情感，從而對軍人角色、軍人價值形成新的期待。在曾經的突出政治的年代裡，服飾審美「一元化」標準使 65 式軍裝及其仿製品處於眾星捧般的地位，軍人處於政治的核心，社會上下、男女老少也一律以國防綠的軍便服裝束為時髦。高度統一的全民軍裝化，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的情懷，這種「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的景象體現了毛澤東「全民皆兵」的人民戰爭政治理想。65 式軍服以其鮮明的「紅配綠」色調突出了紅領章和紅五星，「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其所以耐看，可用色彩學的補色原理來說明——補色是指在色譜中一原色和與其相對應的間色間所形成的互為補色的關係，色彩中的補色並列會拉開距離感並引起強烈對比的色覺，表現出特殊的視覺對比與平衡效果。由於紅與綠互為補色的關係，綠軍服配「三點紅」會使紅的更紅、綠的更綠，導致人們在視覺上比較舒服。簡單、鮮明、直觀的「紅配綠」軍服型塑了同樣立場堅定、愛恨分明、精神飽滿的革命軍人。隨著政治時代的終結，意識形態裡的「左傾」思想獲得了糾正，社會生活進入常態化、理性化、世俗化的狀態，軍隊與軍人亦逐漸回歸職業與專業的定位，而體現這種變化的軍服改革也呼之欲出。

87 式、07 式等軍服改革接力完成了大陸軍人形象的嬗變。一方面，軍服的款式從單一到專業，實現了功能的分化。除了常服，作訓服、禮服等體現了對軍人角色及身體規訓的不同要求，在大眾與軍人之間設置了更為豐富的介面。另一方面，軍服作為一種戰鬥裝備，從根本上要適應各種戰爭環境的需要，除了具備各種防護性能，還必須使協同與指揮視覺化。軍服的佩飾從簡單到複雜，使軍服的識別功能更加豐富，姓名牌、軍種胸標、臂章等實現了識別的精准化。另外，07 式軍服的禮服、常服色彩以低明度、低純度的冷色調為主，搭配風格溫和、協調。07 式軍服實現了與國際軍界通行標準的接軌，體現了中共軍隊的自信、開放與包容。這種變化也令一些具有懷舊情結的軍迷悵然若失，畢竟那代表了革命浪漫主義的老式軍服的影響太深遠了。然而，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軍隊畢竟是一個戰鬥隊，軍人的本分就是務軍、天職就是打仗，愛國主義、犧牲精神、政治原則更要體現在軍人的職業要求上。進入 21 世紀後，從軍作為一種職業不斷回歸常識與理性，解放軍進一步邁向正規化、現代化特別是國際化，頻繁參與國際反恐、維和、救援、護航等行動，甚至同昔日與今日的「假想敵」聯合軍演，這給人以時空穿越之感。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審美與情感。解放軍服制的發展、演化與完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或許從世界範圍來看，軍服的越發完善與美觀意味著戰爭也將不再那麼野蠻，這何嘗不是人類的福祉呢。

## 肆、小結與討論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必要的「惡」和不得不的存在。在文明的歷史進程中，雖然人類的理性尚不足以對戰爭形成根本性的遏止，卻使這一極端的政治形態愈發「文明」與「審美」。戰爭及其衍生的價值、情懷、榮譽、使命，從來都是刷新人類精神高度的利器，似乎只有戰爭才能以最徹底的方式把最美與最醜撕裂，衍生出人們不得不面對的暴力美學。除了血腥和殺戮受到人道理念的制約，軍隊也一直作為審美的客體存在，不斷打磨著作為自身軟實力的形象。因而，本文得以相對純粹與獨立地通過解放軍服制變遷來討論軍隊與軍人形象，以揭示中共軍隊軍服繼替中

所隱含的政治邏輯、大眾審美與中國特色。

從某種意義上說，服飾是社會秩序的具象化，即便在今天這樣一個尊重個性與宣導自主的時代裡，在人們看似自由選擇的穿著背後，常常是文化、習俗甚至禁忌這些無形之手在實際上操控著人們的選擇。現代社會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社會分工則促成了不同職業的劃分，是否統一著裝（制服）則是體現不同職業特點的重要標誌。由於執行特殊的任務，軍隊成為最早著制服的群體，軍服「勾勒出來的形體，是理想的戰鬥人員的形體：健壯、服從、極強的自我控制力、高度專注，沒有任何懈怠，也不會呈現一種安逸狀態」（Fussell, 2002／馬俊傑、陳召強譯，2023，頁 18），同時軍人必須具有強烈的角色意識、風紀形象、言行舉止，因而也有著最嚴格的著裝要求。

作為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武裝集團，解放軍被認為有著最堅定的政治信仰、最嚴密的組織紀律和最莊嚴的軍隊形象，軍服則是這支軍隊特色與內涵的體現者、見證者。從建政前沒有統一裝束、「穿百家衣」到現在的完整、配套堪與發達國家軍隊媲美，解放軍服制的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全、從全到優的漫長過程。就解放軍軍人而言，軍服不但是一種包裝和遮蔽，更是一種規訓與潤色，通過其特有的方式定義了軍人的身體，把每一名軍人編織進

圖七：著 07 式軍服的軍人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9vn46j>

中共軍隊這一龐大的組織系統中，形成了基於中共服制的政治秩序。而軍服演變中的「變」與「常」所折射出的政治的、歷史的乃至大眾的邏輯又深深嵌入到軍人穿衣戴帽這一再平常不過的行為中。中共軍隊堅持政治建軍的原則，它申明自己並不是獨立於政治的「國防軍」，其政治使命即「人民的軍隊」、「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保家衛國」這三者的統一始終不變，即使

在著國民黨軍隊軍服時，其肅軍容、壯軍威的象徵意義與觀瞻功效亦絲毫不變，中共軍隊的革命本質和政治本色得以強調。同時，解放軍又不斷適應現代化與正規化的要求，按照面向世界與面向未來的願景，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形成了具有大陸特色的現代軍服體系。改革開放以來的軍服，不斷發展與完善，在功能、識別、形象諸方面皆有重大的突破，不但更加適應現代作戰的要求，而且也順應了國際軍服改革的潮流，彰顯了中共軍隊的形象、自信與底氣。

當然，由於大陸經濟社會的發展歷經曲折，尤其是在建政後長期處於臨戰、備戰狀態，加之政治建軍的原則被不適當地抬高，解放軍服制的發展也帶有時代的印痕，突出表現在受國內與國際政治與形勢的影響，一度或一邊倒、拿來主義，或自立門戶、搞絕對平均的軍事共產主義，致使服制穩定性差、變來變去。如 55 式軍服照搬蘇聯模式，儘管比較超前，但經過之後的不斷調整——如去除不符合中國人審美標準的船形帽，趨於完善，十大元帥的戎裝照就代表了共產黨將領的最佳形象。而對 55 式的廢除，原因很多，至少與中蘇交惡不無關係。65 式是對 55 式的一個逆反，去除了 55 式的繁文縟節，但卻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十分吻合，尤其是在色彩搭配方面樹立了一個典範，其他制式無一能企及。不過，65 式軍服為單一制式的「一服多用」，官兵不論作戰、訓練、平時和禮儀場合都穿著同一套服裝，其作為特殊時代的政治價值與大眾流行難掩其瑕。改革開放後，大陸軍服終於回歸軍銜制，從 87 式到 07 式，變化之大、之快，給人以目不暇接之感。目前裝備部隊的 07 式服裝，是歷次改革的集大成者，具有禮服、常服、作訓服三個系列，共 644 個品種，而服飾更是多達 18 大類 389 件，具有較好的審美和視覺效果。尤其是強調國際元素，引入了胸標、領花、姓名牌等複雜的佩飾，實現了與國際接軌。但公允地講，07 服制也有一些值得詬病的方面：一是在功能方面，軍隊是一個戰鬥隊，從實用目的來說，軍服穿著要從根本上適應各種戰爭環境的需要，有利於軍人從事各種形式的作戰，即具備各種防護（防彈、防火阻燃、托浮防水、隱身、防偵視、防輻射、防毒、防化學污染、防細菌侵害、防靜電、防油污等）功能，而肅軍容、壯軍威的觀瞻功效只是其從屬的功能。07 式軍服固然系列完整、品種配套、服飾豐富，但事實上，花哨的禮服不太符合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而且穿著時機少，製作成本高。而在現代戰爭環境

中，指揮協調主要依賴於扁平化的資訊系統，作戰人員須著簡潔、隱蔽的迷彩作訓服。事實上，新式軍服在單兵防護方面尚有很大的差距，智慧軍服建設尚是一個願景，連野戰睡具都還是奢侈品。二是在審美方面，毋庸置疑，由於最大程度地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軍隊的服飾，07 式軍服具有較好的審美和視覺效果。但這是放棄簡潔、明快的傳統特色為代價的，以陸軍為例，65 式軍服的草綠色即國防綠最為經典，85 式改用棕綠色，07 式又改為松枝綠色且加入了灰色調，使得這種顏色的「綠」遠不如草綠色純粹，與大眾的審美形成了斷裂。而眼花繚亂的配飾則容易造成審美的疲勞與無奈，使人們過於關注軍人外在的穿著而忽視了其內在的精氣神。三是在認同方面，07 式軍服強調國際元素、對外交流、與國際接軌，引入了胸標、領花、姓名牌等複雜的佩飾，特別是級別資歷章源自勳表設計，但只包含軍官級別和軍齡資訊，論資排輩、論職排序，沒有體現征戰經歷，勳表功能不完整，太多的標誌，不是軍人或者軍迷根本分不清，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識別混亂和認同流失，百姓常常感覺這套軍服像是國民黨或美國軍隊的，與中共軍隊的經典形象與歷史記憶有一定的差距，遠遠沒有形成像 65 式那種廣泛的社會認同。

本文對中共軍隊軍服繼替及其規律的刻畫，乃至對其內在政治邏輯、大眾審美與中國特色的揭示，儘管尚顯淺陋、幾近粗疏，但卻具有某種開創意義：由於執政黨、國家與軍隊之間水乳交融般的親緣關係，軍隊一直是中共視同己出的嫡系與直系領域，從而倍加呵護與控制，這使得軍隊在保衛「國家」的同時，也是「形象」、「榮譽」等意義上的被保護者。因而，軍隊與軍人往往是研究者難以染指與涉足的領域。與此情形相聯繫，中共軍隊系統仍然處於隱秘與封閉運作的狀態，保密制度泛化兼禁忌意識無所不在，即便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也仍然保持著一種神秘的色彩，資料獲取不易，訪談更是奢望。本文的優勢在於，一是迄今尚無關於中共軍隊軍服繼替的相對系統的研究，本文算是一個初步的嘗試。畢竟軍服是外界認識與感知軍人與軍事領域的主要介面，既呈現著又遮蔽著政治、文化與歷史的種種。二是本文跨學科的視野也是筆者稍稍得意的所在。由服裝而制服而軍服，由軍人而軍隊而國家，由裝束而審美而政治，能夠見微知著、由小及大，軍服變遷研究可謂洞察軍隊進而中共政治運作的一個優良端口。然而，本文的研究尚面臨諸多不足——「淺嘗」近乎「輒止」，最重要的是時空跨越不夠，缺乏歷史與

比較的視野，既沒有涉及古代與近代軍人著裝，更無與域外軍人著裝的比較，因此就減損了本文的穿透力與對話深度。唯此，本話題不但值得筆者的深耕，也期待同仁的加入。

## 參考文獻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3）。《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毛澤東（1990）。《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央視網（2002年5月18日）。〈軍人非公外出著便服 道德要求不會變〉。  
取自 <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20518/169.html>
- 全國徵兵網（2000）。〈應徵公民體檢標準摘要〉。取自  
<https://www.gfbzb.gov.cn/zbbm/zcfg/byfg/tjbz.shtml>
- 肖季文、朱鵬新（2009）。〈新中國 60 年兵役制度的調整改革與發展趨勢〉，《軍事歷史》，4: 6-10。
- 谷贛（2007）。《65 式軍裝的政治含義與大眾模仿的關係》。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 孫月（2009）。《我們與敵人：大眾傳播視角下的革命制服圖像的形名衍化》。廣州：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徐平、楊廷欣（2009）。《軍服史話》。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馬俊傑、陳召強譯（2023）。《制服——你穿什麼決定你是誰》。中信出版集團。（原書 Fussell, P. [2002]. *Uniforms: why we are what we wear*. Mariner Books.）
- 許澤（2007年8月14日）。〈從姓名牌說到身份牌〉，《解放軍報》。
- 陳以民（2014）。〈強化志願兵役制度夯實強兵興軍基礎〉，《國防》，12：23-25。
- 舒雲（2018）。〈解放軍 65 式軍服的來龍去脈〉，《黨史博覽》，11：62-64。
- 黃金麟（2005）。《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聯經。
- 楊光明（2006年10月23日）。〈紅星在我心中〉，《解放軍報》。
- 滿永（2016）。〈革命歷史與身體政治——邁向實踐的中共歷史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1：4-14。
- 劉北成、楊遠纓譯（2007）。《規訓與懲罰》。三聯書店。（原書：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Pantheon Books.）



- 劉濤（2017）。〈身體抗爭：表演式抗爭的劇場政治與身體敘事〉，《現代傳播》，1: 62-67。
- 錢翰、陳曉徑譯（2010）。《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Foucault, M. [2004]. *Security, territory and population*. St Martin's Press.
- 應星（2009）。《村莊審判史中的道德與政治：1951—1976年》。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 History on the Body :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LA Uniform System

Zheng-qiang Liu

### ABSTRACT

As the earliest uniform, military uniform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and direct symbol of military status. It embodies practical, aesthetic, and political values, and has become a symbol of national prestige, military prowess, and national spirit. The symbolic connotation, public perception and media interpretation of military uniform constitute the main content of military culture. In the course of the PLA's development,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ten uniform reforms from the era of founding and struggle, to the era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n to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vein of its change has seen and embodied the political logic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filtrated with the feelings of heroism, romanticism and realism. This has formed a political order based on military uniforms: on the one hand, the revolutionary and political nature of military uniforms has been maintained to reflect their symbolic significance and visual effect of purifying the military appearance and 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prestige, especially to maintain the revolutionary taming of the body, especially the soul, of the soldiers; on the other hand, adapt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ization and regularization, the practical functions of military uniforms such as protecting against cold and heat and facilitating the battle are continuously improved, forming the modern military uniform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olitical logic of change and constant contained in the PLA uniforms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law of the PLA.

**Keywords:** evolutionary logic, military uniform, revolutionize, uniform culture

---

\* Liu Zheng-qiang, Associate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Email: lzq@sass.org.cn

# 偶像養成的場域鬥爭初探： 以日本女團為例

李幸倫\*

## 本文引用格式

李幸倫 (2024)。〈偶像養成的場域鬥爭初探：以日本女團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19: 69-97。

---

投稿日期：2023 年 12 月 14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4 月 15 日。

\* 李幸倫為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生，e-mail: rachellee34@gmail.com。

## 《摘要》

近年來，偶像流行文化席捲全球流行娛樂產業，正當大眾對「偶像」的想法總是抱持著一群漂亮、帥氣、可愛的人們在幕前載歌載舞的刻板印象時，卻忽略了他們在幕後現實殘酷下的養成內涵，究竟舞台之外的偶像們經歷過什麼？他們又是如何在運營規制下的團內競爭中求得生存？本研究欲運用場域論、劇場理論和媒介中介的概念，以日本偶像女團的成員個體做為行動者主體的分析視角，描繪偶像養成過程中的能動突破。從個體成員參加徵選、角色定位、選拔組與Center之爭等的社會實踐過程中，發現偶像個體成員會將團體規制內化與自我慣習融合調整，並根據所處的團體角色位置，形成初步的社會資本，據此建立內部關係；之後隨著自我對運營管理控制和對其他成員的支配權力程度，再逐步調整自身的慣習和人際關係，以增加自我在團體中的談判籌碼。此外，在團體場域的角力競爭上，個體則充分運用媒介中介化特質，將自我角色設定透過媒介力場與外部建構出形象資本的社會關係，並以此強化自我在團體內部的權力關係和不可取代性象徵籌碼，而這偶像發展的實踐迴路也隨之生成偶像個體發掘自我的養成人生。

**關鍵詞：**日本女團、鬥爭、偶像養成、場域

## 壹、前言

你知道偶像是什麼嗎？是靠謊言這種魔法，讓自己閃閃發亮的生物...以謊言堆積謊言，無論有多麼痛苦難過，只要一站上舞台，就能幸福地歌唱，這是一份多麼開心的工作啊！（赤坂明、橫槍萌果，2023）

2023 年 4 月 12 日日本動畫《推しの子（我推的孩子）》片頭曲〈アイドル（IDOL）〉MV 於 YouTube 正式公開，MV 不僅在 36 天突破一億次觀看次數（楊智仁，2023 年 5 月 18 日），刷新 J-POP 史上 MV 最快破億紀錄；〈アイドル〉還登上美國 Billboard 全球排行榜 Top 10。順著這股浪潮，其原創動畫《推しの子》在 Netflix 的播送下，亦讓劇中的核心元素「偶像文化」成為全球流行娛樂界的熱門話題。

有別於一般大眾對「偶像」就是漂亮、可愛的女孩們在載歌載舞的刻板印象，〈アイドル〉所闡述的歌詞直指日本偶像團體在流行娛樂產業的幕前光鮮亮麗與幕後現實殘酷下之雙面隱藏內涵（UtaTen，2023 年 4 月 27 日），試圖揭露笑容的背後，偶像這一職業所不為人知的真實。當大眾皆以「追逐夢想」來形容這群花樣少女之際，似乎都忽略了偶像養成的背後曾面對的殘酷與真實，究竟舞台之外的偶像們經歷過什麼？她們又是如何在運營規制下的團內競爭中求得生存？

2023 年 9 月 7 日，日本男子偶像夢工廠〈ジャニーズ事務所（Johnny & Associates 傑尼斯事務所）〉召開記者會，承認已逝創辦人ジャニー 喜多川（強尼喜多川）長年性侵旗下青少年偶像成員（梅衍儂，2023 年 9 月 7 日），此一事實甫一證實後，其旗下偶像所代言品牌或形象的廣告企業主們也紛紛表態將解除契約或討論是否解除合作，根據東京商工調查公司表示，和傑尼斯事務所有交易的合作企業近 80 家，合作金額逾 100 億日元，約新臺幣 21.7 億元（共同社，2023 年 9 月 15 日）。

2019 年 1 月 8 日，位於日本新瀉的 AKB48 Group 姐妹團 NGT48 成員山口真帆在 SHOWROOM 個人帳號進行直播時，無預警地公開自己曾在 2018 年 12 月公演之後，於租屋處玄關被兩名陌生男子襲擊；隨後她又在個人社

群平台 Twitter 上詳述事件發生經過，並暗示團內成員可能參與其中（NHK NEWS WEB，2019 年 1 月 9 日）。此突發的公告舉動引發大眾譁然，對此，山口真帆雖然在日後的公演劇場向粉絲道歉，其落淚鞠躬的身影仍在輿論推測的「運營竟然逼迫受害者道歉」聲浪中更加擴大，導致後續團內成員聲譽與運營經營危機（中央通訊社，2019 年 1 月 15 日），事件雖在山口真帆畢業後告一段落，但 NGT48 從此一蹶不振，更牽連至 AKB48 Group 日本其他姐妹團的形象（Magda Szymanska，2022, March 10）。

近年來，K-POP 席捲全球流行音樂界，引領了偶像流行娛樂風潮，也吸引了各國學界探究，然在流行音樂偶像相關的學術研究中，幾乎多以「企業經營模式」、「政治經濟批判」和「迷文化」三者為主軸的研究論述。除此之外，也有以專業概念視角，探討藝人與經紀人或唱片公司的勞動關係與行為，如林富美（2004）〈藝人與經紀人派遣勞動關係初探〉和吳宇軒（2011）〈我一直都在：歌手情感勞動行為研究〉；以勞動契約為切入方向，探究歌手與唱片公司的勞動條件如陳坤賢（2006）〈蠶食勞動—從契約關係析論流行音樂歌手之勞動條件〉；以及從歌唱選秀節目的視域角度，觀察素人參賽者與節目製作單位工作人員在各自不同動機需求下，如何說服自我成為娛樂產業組織權力關係底下的志願勞動者的簡妙如（2015）〈甘願勞動：歌唱選秀節目的遊戲、順從與業餘明星夢〉等，甚少純粹以偶像本體為主體的角度來探究其內涵。

由於臺灣的流行音樂娛樂公司大都以培養個人歌手為主要的營運方式，甚少以經營偶像團體為主的演藝公司，換句話說，若欲以在地偶像團體為研究對象的探究實屬不易，只能轉向偶像當道的韓國或日本偶像所引發之經濟文化現象做為主題探討，形成普遍且一致性的論述。此亦是本研究欲突破的挑戰，以偶像的本體關懷為根本，探究偶像養成過程中，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動態關係，讓偶像這份工作的實際面貌得以呈現。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將以日本養成系偶像女團的經驗研究調查，主要針對 AKB48、坂道系列團體乃木坂 46、櫻坂 46（前身為櫛坂 46）和日向坂 46 為主要代表性偶像，除了蒐集相關報導與日常幕後跟拍所製作而成的紀錄片電影資料外，也將以 2022 年二月至 2023 年六月為期一年五個月的參與式觀

察女子偶像團體實際工作場域經驗，作為「結構同型」<sup>1</sup>式的偶像女團實證對應分析。

此外，本文欲運用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論、高夫曼的劇場理論和媒介中介概念，針對「偶像」此一行動者主體進行主要分析視角，試圖描繪偶像養成過程中的能動突破，據此本研究將提出三大問題，偶像成員是如何看待「偶像」這個稱呼？為何想成為偶像？成為偶像，如何在團體中調整自我並建構自己的角色位置？偶像如何運用媒介中介化達成自我實踐的形象資本形塑？

最後根據上述的分析，檢視偶像在養成實踐過程中，個體的慣習調適、媒介運用中的資本變化、團體場域內的偶像主體形塑，以及偶像個體之間的能動與權力互動關係。

## 貳、行動者們的養成實踐

在以「人」為對象主體的社會科學領域百家爭鳴諸多探討中，法國社會學者布赫迪厄整合了客觀主義物理學和建構主義現象學，主張一種並非透過嚴格限定的理論，而是以系統式發展的社會學研究方法「生成結構主義」（genetic structuralism）。此外，為了超越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結構必然性和個體能動性的二元對立，布赫迪厄也提出了「社會實踐理論」（social praxelogy），其乃綜合了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兩種研究路徑。首先，先建構各種客觀結構（即各種位置的空間），也就是社會有效資源的分配狀況；其次，再將行動者的直接體驗引入，以揭示從內部構建其行動的各種知覺與評價。此外，他亦強調「結構主義的建構論」與「建構主義的結構論」的相互辯證性，並排除各種先入之見（preconception），因行動者的思維會隨其所處

---

<sup>1</sup> 結構同型：布赫迪厄認為場域之間具有階級同構特性，即使每個場域都有其遊戲規則和自足獨立性，但不同的場域之間仍可能存在可相互對照、依存的有機聯繫關係，也就是所謂的「結構同型」（Bourdieu, 1989；徐賁，2002，頁 76）；此處指的是研究者曾針對同類型經營機制的女團所進行之參與式觀察工作經歷。

之位置不同而發生變化 (Bourdieu, 1984, 1989; Wacquant, 1992/李猛、李康譯, 2016, 頁 39-41)。

## 一、資本鬥爭的競技場域

「場域」是由不同位置間的客觀歷史關係所形成的網絡 (network) 或構型 (configuration) 空間, 這些位置是由權力 (資源、資本) 分配結構所決定的 (Bourdieu & Wacquant, 1992/李猛、李康譯, 2016, 頁 158)。場域也是個衝突和競爭的空間, 如同一個遊戲空間競技場, 參與者彼此較勁以確立能在此空間中所擁有的資本和權力壟斷性, 同時也握有掌握階級分配的主導權 (Wacquant, 1992/李猛、李康譯, 2016, 頁 49); 而所有行動者們會根據自身所處之位置進行爭奪或防禦, 以求改變或穩固其在空間的範圍或形式 (Bourdieu & Wacquant, 1992/李猛、李康譯, 2016, 頁 160)。

場域的結構是由建立此場域的特定資本形式所決定, 若能區辨這特定的資本形式, 就能分辨出該場域內的行動者差異, 且所有行動者們都擁有自身的歷史軌跡和資本, 也憑此確認自身在場域中所能佔據的位置和資源 (Bourdieu & Wacquant, 1992/李猛、李康譯, 2016, 頁 173)。從關係角度分析, 場域內含支配、屈從對應關係所構成的空間, 是個由特定權力關係支配和影響下的資本生產、流動、再製的過程 (徐賁, 2002, 頁 75), 擁有此特定權力者可制定遊戲規則機制, 以控制場域內的階級狀態; 若特定權力者被替代, 所有機制勢必也跟著連動調整。

場域也是人們可合法地爭奪有價值的場所, 所謂的價值指的是不同形式的資本, 也因為資本是無法自由交換, 僅能透過行動者們相互爭奪爭取或累積而來, 所以場域也是一個無窮無盡的力量關係場所 (徐賁, 2002, 頁 76)。換句話說, 場域就是一種「力場」(a field of forces), 為了維持這力場的活絡性, 就需要營造吸引行動者追求的特殊資本, 而參與者的目的就是能夠透過此空間累積到擁有主導力的資本; 這也是場域中行動者們共同的信仰目標, 如此才能讓行動者們卯足全力投入競爭, 這遊戲才能持續下去 (洪瑞璇、潘慧玲, 2021, 頁 58)。至於競爭使用的手段, 則是轉換或利用手中的資本權力以爭取更好的社會位置 (social position), 就如同養成系偶像女團成員為了



增加「握手會」的人數，會運用自身的資源進行衣裝投票遊戲以刺激粉絲的遐想慾望。

在布赫迪厄的場域邏輯之下，「資本」是個體的勢力依據，也是鬥爭的主要標的，具有可轉換性與不可完全取代性。資本可區分為許多不同形式，分別為可轉換為金錢或財產權形式的「經濟資本」、以身心長期秉性價值或文化貨物與教育資歷形式的「文化資本」、掌握社會長久關係網絡的「社會資本」，以及對社會世界有著指稱與界定認知能力如權威、地位或衣著、舞蹈等展現自我的「象徵資本」。其中經濟資本是所有類型資本的根基，布赫迪厄認為資本最重要的功力在於可轉換性，從各類資本的轉換過程中，隱藏著場域的動力之所在，也就是鬥爭的暗流指向（Bourdieu, 1983；邱天助，1998，頁 128-130）。

在所有類型資本幾乎皆可轉換為經濟資本的前提下，象徵資本為偶像們追逐的主要目標，為了透過媒介中介轉譯出更具凸顯的象徵資本與累積更多的文化資本，產業內部關係網絡的社會資本就至為關鍵，畢竟千里馬也需伯樂們的青睞方能名揚八方。

此外，每個場域都有其自身的價值觀與控制原則，以此界定在社會關係中的空間建構。布赫迪厄認為，場域之間具有階級同構特性，每個場域都有其相對於其他場域的遊戲規則和自足獨立性，但相異的場域之間仍可能存在著可以相互對照、相互依存的有機聯繫關係（Bourdieu, 1989；徐賁，2002，頁 76），例如同為養成系偶像女團 AKB48 和乃木坂 46 就運營機制雖不完全相同，但有高度重疊性，因此她們存在著「結構同型」關係；更進一步，若 AKB48 新歌的 Center 和乃木坂 46 新歌的 Center 即有著「同型對應」關係，這兩者之間符合對稱位置一致性邏輯。

「慣習」指的是由個體自身一系列歷史經驗的關係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身心圖式，也是生成策略的原則，這原則能使行動者應付各種突如其來的變化情境，從而完成複雜多樣的任務並隨之強化，既持久又可隨著經驗變更的性情傾向系統（Wacquant, 1992／李猛、李康譯，2016，頁 47-50）。換句話說，慣習指的不是個體技能上的熟練習慣；而是持久的集體性規則行為生成機制，也是從外部條件結構轉變為自我期許的社會化結果。不同場域的同型關係可用「慣習（habitus）」看出，因為慣習可以讓不

同場域中的行動者表現出相似的稟性 (disposition)，勾勒出跨場域的「結構同型性」和「轉換關係」，它是不同領域間活動的統一原則 (Bourdieu, 1977；徐賁，2002，頁 76)。行動者在不同場域轉換之間，再製累積了其所擁有的資本種類和數量，也再製了行動者的階級地位，慣習也因透過行動者而不斷地被型塑，可說是一種「結構化結構」(Bourdieu, 1984；洪瑞璇、潘慧玲，2021，頁 55)。

場域的被實踐需要行動者為之。在布赫迪厄的論述中，客觀結構的規則需要在個體的能動性、差異性和主體性行動時才能稱為規則，換句話說，規則是在個體的行動中，不斷詮釋和流動的狀態，是動態性的。且實踐的能動性、策略性主要來自於被支配行動者依其慣習而行之，因支配者較容易被客觀規則給約制，但這不表示支配者就不會有能動性，端視當下真實情境的狀態。也就是說，行動者會根據當下什麼是對其最有利的，才會對應出適切的行動，此並不代表客觀規則就不存在，而是圍繞在其準則的可調性範圍內之因應。

## 二、競技實踐的能力劇場

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曾提及，任何特定屬性的人，其外在行為都須符應該社會群體給予大眾的期待與印象，而非只有表徵上的條件符合而已。高夫曼運用戲劇表演的概念來解釋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互動，在任何特定場所展現的各種形式行為，都會對其他參與者產生影響；無論何時何地，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戴著「面具」在扮演一種角色，而大家也都從各自的角色中認識自我、相互了解，這面具就逐漸地成為我們的自我概念，以及代表著我們所希望達成的理想自我，而這自我角色便成為我們人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Goffman, 1959；黃小芳，2015，頁 53)。

高夫曼以「多元自我觀」取代 I、me 的自我原型觀點 (Goffman, 1959)，認為個體表達自我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個體「給」大家的表現，目的在於傳遞訊息；另一種則是個體「顯露」出的樣子，是種個人特色的展現；而人們所接受的個體自我，並非完全來自於其自發性的原生，而是透過其發生行為的場域，它有可能是被促動的、被觀眾所賦予的產物，就如同被人們圍觀的

鬥雞，鬥雞本身並無意識到在表演，是在場的觀眾賦予了牠表演、比賽等意義（黃小芳，2015，頁 53）。

當個體出現在其他人面前時，為了營造對自我有利的印象，個體會以「印象整飭」(impression management) 的方式來調整或修正自我的行為，也就是試圖操控他人對其的想法，藉此獲得他人的信任與尊重，達到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的社會期待（黃小芳，2015，頁 59）。此外，高夫曼將社會比擬成舞台場域，在此空間區分出三塊區域，分別如下：

（一）前台區 (front regions):

由舞台上的硬體設備和裝飾道具的「外部裝置」(setting) 和個體表演者的衣裝外表、表情舉止等之「個人門面」(personal front) 所組成，為個體在社會情境中人際互動上演技傳遞的區域。這也是一個集體群聚的表演場所，個體可利用印象策略來對觀眾散發其魅力資本以達預期效果（Goffman, 1959；蔡孟學，2022，頁 94）。

（二）後台區 (back stage):

相較於前台區，後台區實屬輕鬆，表演者無須在眾目睽睽之下被鏡頭放大，也不用為了博得觀眾好感而不斷調整自我外表。後台區是一個可供隱藏且不會被外人看到的區域，也就是所謂的「鏡頭之外的活動」(off-camera activities)，此區也因觀眾看不到，所以只能用想像的揣測去異想（Goffman, 1959；蔡孟學，2022，頁 95），但實際上，後台區是為了特定演出所劃分出的準備和休息區域，表演者能夠放下演出角色該有的設定框架，還原成原本的自己。

（三）局外區 (the outside):

在前台區與後台區之外的區域就是局外區，也就是所謂的剩餘區域 (residual regions)，在這塊區域的人就是「局外人」(Goffman, 1959；蔡孟學，2022，頁 95)。

除了空間上的劃分，高夫曼也進一步提出從時間切分的觀點，他將前台演出時間與後台準備演出時間之外的場景轉換時間稱為「局外時間」，在此

局外時間中，表演者更有別於前台與後台，在行為和態度上的轉變，而這轉變多少都可能影響下一場域的演出狀況（Goffman, 1959；黃小芳，2015，頁 58）。

惟為了體現本研究行動者主體的實踐空間，則將一般演出舞台的設定轉譯至偶像們的舞台表演為前台區、訓練與運營控管之日常局外時間相關過程為後台區，依此為劇場論之場域探究。

### 參、資本權力的中介轉換

有別於過往媒介理論以直線式的探究機構傳播訊息如何影響閱聽人的效果，以及閱聽人對文本的符號內容的詮釋意義和反饋，以媒介科技為取徑的傳播研究則將媒介的物質性放到關鍵的位置，凸顯其不只是「工具」，還包括了環境脈絡，易言之，媒介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傳遞了什麼訊息，而是促成了什麼？也就是人們日常生活的社會實踐，是如何在科技發展的相互滲透交疊過程中調適自我。

根據唐士哲對中介化的脈絡爬梳論文，Marvin（1988）認為，媒介作為社會權力交會的力場，應當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媒介本身，而是在其存在的脈絡中與媒介有所互動的其他社會機構和行動上（唐士哲，2014，頁 9），依此顯示出在傳播或溝通的過程中，促使任何主體與其他主體或環境發生關係的刻意行動之「中介」意涵。

對於「中介」一詞的解釋，Williams（1976）提出三層意涵，包括：介人居間調和、傳輸的手段、切割對方。一般而言，中介常對比於「直接」（immediate），也就是介於真實與蒙蔽之間，如同透過新聞媒體的中介，真實已被蒙蔽，閱聽人無法直接體認到事實真相（唐士哲，2014，頁 10-11）。至於中介的定義，Silverstone（2007）則主張中介是一個辯證的過程，是檢視傳播媒介所涉及的符號在社會生活中流通的過程；他認為這過程不可能忽略「人」在其中扮演的因素。無論是個人或群體，作為傳播或溝通的參與者對科技的使用方式等，是造成科技中介的社會性格風貌展現的關鍵因素；中

介概念就是試圖解釋，傳播的過程是如何改變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個體與機構的參與者之間的關係（Silverstone, 2005；引自唐士哲，2014，頁 16）。

接續 Silverstone 對中介概念的闡述，Couldry（2006）則借用了布赫迪厄的「場域」和「慣習」的社會實踐概念，他認為中介所彰顯的是媒介的「能動性」（agency），是否因為媒介而在特定的行動場域（fields of action）展開或關閉？因此，我們不該只是將媒介當作特定的文本或機構，更該將其視為存在於一個複雜的社會實踐空間之「力場」。此外，特定媒介的機構化實踐，具有影響社會實踐的能力，就如同由歷史建構成為天性般的慣習，在媒介與日常生活交疊甚鉅的時代，媒介幾已介入了社會慣習的脈絡中，成為一種「媒介實踐」（唐士哲，2014，頁 17）。

Couldry（2008）認為中介探究的是組織化的媒介及其符號生產、流通和再製的過程，如何影響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使得一些不大可能聯想在一起的組織、機構或制度，因為中介而產生了關聯，此乃跳脫了往常傳播研究的單一直線式思考邏輯，而是強調中介所試圖掌控的日常生活形塑過程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唐士哲，2014，頁 17-18）。

在數位媒介已和日常生活相互交疊的今日，文化工業的文本生產已不盡然純粹透過組織或媒介機構的流通方可為之，社群與直播平台是現代流行娛樂產業所依賴的傳播與溝通媒介。在運營許可與規制之下，偶像團體的個別成員泰半都有自己專屬的官方社群平台和直播帳號空間，讓偶像們可藉由平台拉攏迷群對偶像們的忠誠與黏著度，在在顯示媒介中介之於運營、偶像和迷群的關鍵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以布赫迪厄的場域論為研究本體，運用高夫曼的劇場理論和媒介中介化概念，勾勒偶像團體的日常實踐場域中，個體慣習的調適與能動性的累積，以及支配者面臨的權力挑戰與個體互動下的資本動態關係。

## 肆、偶像的養成實踐

「偶像」(Idol) 在過去從具有宗教性意涵的對神明崇拜，到現在一看到此一詞彙就聯想到身著亮麗表演服的唱跳藝人。從仰望神靈象徵到模仿崇拜的對象，偶像的演變隨著媒介科技發展與消費主義興盛，讓偶像轉向與商業利益關係，無論是真實或虛擬的生物和物質，都能成為大眾投射的喜愛對象（李世暉、林芙白、蔡彥亭，2017，頁 26-27）。

偶像依性質不同可區分為「生產型偶像」和「消費型偶像」。生產型偶像主要是為人類社會創造出物質與精神財富而受人尊敬崇拜的傑出人物，如政治、商業、藝文與科學界等領域名人；消費型偶像則以商業機制所創造、借替之符號概念形象的流行消費性文化產物。Baty（1995）認為偶像是指在文化層面上會讓人感到共鳴並傳遞令人熟悉的意義與影象給大眾的人物或事物。換句話說，偶像既可重複組合和拼貼；也是社會現象的一種投射（李世暉、林芙白、蔡彥亭，2017，頁 27-28）。

本研究探討的日本偶像女團即為消費型偶像，運營雖以創造營業利潤為目的，然其經營模式卻與一般所認知的 K-POP 偶像團體不同，最大的差異在於偶像的培訓與工作實行是同步進行。換句話說，當 K-POP 的練習生還在培訓等待出道的機會時，日本偶像女團成員則在簽下合約後就確定會出道，且所有新成員僅經過短暫的特訓後即正式公開亮相，自此展開偶像生涯。大眾可透過「番組（團體綜藝節目）」媒介或展演舞台看著這群女孩們從不完美的笨拙走向近完美，就像是共同參與她們的成長般，因如同孵化孕育的過程而被喻為「養成系」偶像團體。

養成系偶像團體有著「畢業」制度，也就是團體不會解散，但成員會改變。此外，偶像成員人數眾多也是一大特徵，以本研究針對的 AKB48 和坂道系列團體為例，每一組團體成員都超過 30 位以上，如此龐大的團體伴隨著經營模式也異於一般偶像團體，以下僅就本研究所欲探究的相關機制與幾項指標性角色作一說明：

（一）選拔組：能夠參與每支主打單曲的成員，一般以 16-18 位人數為主，所有成員都須經過內部評比之後，再由運營挑選並公告能參與的成員有哪些人，此為成員們爭取團體媒介資源的最基本目標，唯有選拔組成員才能參加新歌的宣傳曝光機會。

(二) 隊長：人選由運營所決定，一般都以最年長、反應靈敏、口條優且應對得體的成員為首選，負責協調成員間的日常相處，以及成員們與運營間的意見溝通；也是團體對外發言的主要角色，故隊長除了有話語權與支配權外，也必定會進入選拔組，是大眾最優先認知的成員代表之一。

(三) Center：歌曲表演的中心站位成員，是每首歌曲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舞蹈編排的重點和媒體聚光燈的焦點，為打歌宣傳時必被安排媒體訪談的核心成員，Center 的名字與團名、歌名常同時存在於媒體內容中，雖背負著歌曲成敗與否的重責大任，卻是多數成員嚮往的主要目標，除了 AKB48 曾舉辦過的「單曲選拔總選舉」為粉絲投票決定外，Center 人選均由運營依策略性或參考其對團體與組織的貢獻度如握手會、周邊商品、粉絲平台訂閱人數等所決定。

在日本偶像女團的成員養成過程，從個體進入團體後就被運營先行針對每位成員的個性、特徵、背景，進行角色定位，至於成員在團體內的位置和資源，除了已被選定為隊長和進團先後順序與特殊才能佔有優勢外，剩下的即是個體成員隨著歷練時間的增長而在團體場域的生成變化，故本研究試圖從客觀的組織結構中偶像行動者的加入與場域角色、定位建構切入；據此再探究偶像的慣習策略與媒介中介建構下的資本轉換與權力關係結構，將偶像養成過程區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徵選」、「角色定位」、「選拔組與 Center」論述之。

此外，資料蒐集部分除了曾實際發生於活動現場的偶像言論外，在廣告與紀錄片部分，雖有製作人和導演的主觀思維框架與角度，然就資料的敘事源頭，廣告內容皆與當事者曾揭露過的自身歷程相似，再經由廣告形式透過腳本形式濃縮呈現；紀錄片則是隨行工作人員日常慣性跟拍所留下的幕後實踐紀錄，再經由導演剪輯並訪談部分成員的呈現形式。就時間性因素考量，上述資料仍可透過媒介框架的中介下，再現出偶像們過往的初始動機和日常實踐真實，故本研究乃依此為主要資料來源分析。

## 一、徵選競技場：我想成為偶像

想加入偶像團體的行列，也得找得到門路。為了尋找新進偶像成員，一般偶像娛樂經紀公司都以自家數位網站為主要平台公開招募，並輔以各類徵選廣告來號召夢想成為偶像的少女們，日本偶像娛樂經紀公司則多以境內定期公開徵選為主，如櫻坂 46 三期生成員招募廣告的主題設定中，直指偶像自覺的偶像究竟是什麼？作為偶像現身說法的實際訴求，透過各式媒介平台的傳播中介，召喚時下心懷偶像夢想的女孩們，櫻坂二期生成員田村保乃曾說：

小時候遇到了偶像，看著她們閃耀著努力的身影，只覺得非常厲害！一直身受她們的鼓舞。正因如此，我也想給別人的生活帶來活力，就像過去的我一樣，偶像是…造就如今的我的存在！（Seed & Flower 合同會社, 2022 年 6 月 13 日）

大眾常以「實踐夢想」視為年輕男女懷抱著成為偶像的加入動機，除了可以穿上漂亮的衣服、享受舞台唱跳風光，未來還可依此作為進入演藝界專業領域的跳板，確實有非常多的少男少女對心中喜愛的偶像充滿憧憬，夢想著希望有朝一日能和他們一樣加入偶像行列，但這「夢想」似乎說得過於籠統。田村保乃則用實際的經歷感受將夢想化作一種可理解的理由，但大多數青少年們在報名參加徵選前，並未認真看待偶像此一「職業」，而是以眼見到偶像在幕前所展現的光鮮亮麗作為憧憬的想像工作，除非真的加入並實踐著偶像工作，才能實際體會到偶像這一職業究竟是什麼？針對此，櫻坂二期生成員山崎天與藤吉夏鈴亦分別說道：

偶像是什麼？從未考慮過！它能讓人百變不限於一面，自由，卻也不自由！即使如此，只要下定決心，世界便會為你呈現不同的精彩！偶像是…自由的地方！（Seed & Flower 合同會社, 2022 年 6 月 13 日）

曾經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但是，開始表演之後，知道了製作一件事物的樂趣，變得積極向前了，雖然常有人說「因為你是偶像」，偶像是…我到現在也還不清楚！現在只是一昧地沉迷其中！（Seed &



Flower 合同會社, 2022 年 6 月 20 日)

成為偶像前，13 歲的山崎天只是一個喜歡著櫻坂 46 的初一中學生，為了想改變自己無法適應被他人看待的眼光，她選擇報名參加徵選；而 16 歲的藤吉夏鈴純粹只是一位對任何事物都毫無興趣、卻因學校的一紙未來志願表不知能填寫什麼時，無意間看到電視徵選廣告，只好在父母的焦慮關切中姑且一試的偶然。然在經歷了偶像此一職業四年之後，如今這兩位偶像不僅已成為團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王牌；她們看待偶像這一意識形態，也有著各自的成長心態，回顧當初報名參加徵選時，偶像這一工作對山崎天和藤吉夏鈴而言，也許只是逃避過往當下狀態的另一種可能機會，實際上與夢想並無相關。

通過書審進階到徵選面試時，參加者必須在這黃金 5 分鐘內展現出能成為偶像的潛能，所以當線上偶像回顧自己參加徵選時的狀況，幾乎都以「緊張到不知道說什麼」居多，才藝表現部分更以慘不忍睹的「黑歷史」作為總結，如藤吉夏鈴在特殊才藝的部分，選擇以體操座的靜態方式表現幽默，卻得到評審一致的漠然，沒想到竟能入選。

在甄選的場域之中，就甄選參加者的角色來看，處於被選擇的弱勢位置，此被支配型的角色會認為唯有完美地表現才是入選的唯一機會；但就選擇入選者的支配型評審角色想法，可塑性的未來是主要的觀察重點，個人特質才是魅力的未來可能性。所謂的個人特質表現在徵選者的心思反應與表情態度中，難以言喻，卻是千里馬的共同特質，模糊且具吸引力，不可諱言，此也是一種個人觀感的主觀感受，仍具風險的賭性成分，至於具體的致勝關鍵則在後續加入團體後的偶像養成過程。

如同高夫曼的劇場理論中，為了營造對自我有利的印象，個體在其他人面前會以「印象整飭」的方式來調整或修正自我的行為，試圖掌控他人對其的想法 (Goffman, 1959)，但此僅能就雙方尚在陌生階段方能達致初步 (短期) 效果，若隨時間增長與接觸程度再進一步後，印象可能產生變化。在徵選場域的前台區，評審觀看的是已整飭後的參選者表徵印象，多少都帶著是否為真的懷疑？因此想確認台前和台後的一致性程度，只能從新進成員候選者 (研修生) 的短暫謀合期觀察與調查，方能做出最後的決斷，畢竟進了團

體後，個體面對的將不只是運營的組織管理；於已相同的其他成員和自屬團體就將是另一場不同的場域規範和角色位置。

## 二、道貌岸然：華麗衣裳下的資本角力

在偶像團體中，每位成員幾乎都有著隸屬於自身的人設符號，此人設的由來大多以成員本身的背景、個性和相較於其他成員的個人特色為主要依據。個體成員的原生家庭背景是最先讓其他成員關注的標籤，家庭經濟富裕的成員往往會被賦予貴族階級符號的人設，如：大小姐、會長、社長等，相對地，在團體場域中，此類成員本身就具備較強的經濟資本和氣質教養慣習；來自知名學府的成員，多被冠上會念書、成績好的標籤人設，如：慶應生、小綠綠等，呼應金頭腦般的文化資本；成員進團前的經歷或父母的職業披露也會連動到成員給人的觀感標籤，如：點鈔姬（銀行櫃檯員）、廚師的女兒、律師之女、星二代等，間接形成成員的社會資本，成員所擁有的各種資本都可能被運營甚或其他成員們視為團體中的個別隱形權力。

當運營需要在團體中選擇一位成員成為隊長時，除了考量年齡、表達能力與口條外，個別成員的無形資本亦會是成員之間相對位置中的關鍵主導因素，畢竟年長且資本顯著的成員較具權威說服性，適合帶領團體，如：櫻坂 46 的第一任隊長菅井友香，除了年齡最長、個性溫和外，也因出身望族而被眾人稱呼為大小姐（お嬢様），她常帶著昂貴物品或食物餽贈其他成員，也會邀請部分成員至她家中作客。此外，她的興趣是馬術運動，不僅活躍於馬術相關活動；其自創的躍馬招牌動作，也成為成員們順從模仿她的標誌，形塑成她特有的象徵資本。

隊長是負責銜接運營或 STAFF 們與成員訊息傳遞和消融團隊氛圍的重要橋梁關鍵角色，換言之，在團體活動的場域中，隊長有著半官方色彩影子，她的話語權與支配權也都是成員之最，成員們也視隊長為團體的內部指標。在「選拔組」的名單上，隊長是立於不敗之姿的存在，其他成員只能望其項背，角逐剩餘的名額，同樣地，隊長也隱約明白運營不會將最重要的 Center 一角賦予隊長，為的是平衡並拔擢其他潛力成員。AKB48 第一任總監督（總隊長）高橋南與一期生成員峯岸南曾說：

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就能讓我興起更加努力的決心！（Masaaki Katabami, 2012／雍小狼譯，2014）

我很清楚高橋南的孤獨，以及走在最前面、沒有人可以追隨的感受！請不要覺得自己孤獨，我們隨時都在妳背後，拼命的奔馳著。（Masaaki Katabami, 2012／雍小狼譯，2014）

團體中皆有個性相近或興趣相投而成為好友的小群體，隊長也不免俗地身旁有自己的好友小團體，身為 AKB48 開山始祖的一期生兼第一任總監督高橋南，因曾經歷成團初期的慘澹經驗，故在成員不斷汰舊換新之際，身高 148 公分的她毅然而然地承擔著帶領團隊繼續向前進的監督角色，其總隊長的威嚴權力總讓後輩對她有所敬畏，但與其相當的一期生如：峯岸南、小嶋陽菜，就成為團體場域中隊長的側翼，協力幫助高橋南共同看護後輩們，運營也將此三位組成一子團 no3b，發行單曲。前輩的榮景到後輩陸續被提拔成為 Center 一角時，這些後起新秀們的周圍亦開始聚集著一塊又一塊的其他小圈圈，讓團體內部生成鮮明的派別樣態，形成意識各異的微妙競爭位置，而團體內的派別更迭往往會在小團體中的主要關鍵成員畢業後逐漸淡化。

高橋南的領導風格，除了善於觀察每位成員在團隊裡的個人性格與幕後角色位置外，她在團體行動時，也會一視同仁地嚴厲督促指揮所有成員。在 AKB48 紀錄片電影《DOCUMENTARY of AKB48 No flower without rain 少女たちは涙の後に何を見る?（笑淚交織）》中，對於 AKB48 終於實現能在東京巨蛋舉辦演唱會的夢想時，彩排的那幾天，高橋南因感受到成員們練習時的散漫和慵懶，她即忍不住拿起麥克風無奈又生氣地對所有成員說：「這樣不行！乾脆回家好了！大家明白嗎？總之，努力練習的孩子是可愛的，不明白卻仍努力練習的孩子也是可愛的，但如果想睡覺的話，乾脆就回家睡吧！妳們到底在幹嘛！」事後高橋南補充說：「從早到晚彩排練習，很累、很困我知道，但是想睡覺什麼時候睡都可以，唯獨東京巨蛋這幾天，若不拚上性命是不行的！」（高橋米樹，2013）

但並非每一個團體的隊長都能擁有如高橋南在團體中的果決威嚴態勢，以櫻坂 46 的前身櫛坂 46 的隊長菅井友香為例，在名為《僕たちの嘘と真実（我們的謊言與真實）》的櫛坂 46 紀錄片電影中，當她被問及隊中的絕對 Center 平手友梨奈決定休息不參加櫛坂 46 夏季巡迴演出時，她初聽到的想法是什麼？換句話說，這也意謂著此次巡迴若在無人「代役」的前提下都將不會有 Center！當這位逐漸脫群、像隻孤鳥般並和隊友保持一定距離的老么平手友梨奈，她這看似任性的缺席決定，身為隊長的菅井友香也僅能以委婉的方式，試圖掩飾自己的無力感，她說道：「我們到底有沒有價值？我還是希望每位成員都能受到關注，明明大家都很優秀卻無法被關注，這樣的狀況還是會令人難過！」（高橋栄樹，2021）當平手友梨奈拒絕參與第九張單曲的 MV 演出，導致運營被迫取消拍攝，事後甚至告知所有成員將延後發行時，紀錄片導演進一步問她是否覺得平手友梨奈應該再盡力一點？此時，沉默許久的菅井友香像被刺到軟肋般地流下眼淚說：「盡力一點？嗯...果然她是天才，擁有我們意想不到的才能或目標，我們能追趕上其他團體也多虧了她，我想她是否並不想留在這樣平凡的團體呢？但卻又顧及其他成員而無法讓自己的心態平衡，果然，是因為我們沒能成為她理想中的團體吧！」（高橋栄樹，2021）顯然身為隊長的菅井友香也不知如何帶領團體中的超級王牌。

平手友梨奈在櫛坂 46 中的角色是所有單曲的 Center，其對歌曲意涵的詮釋和過人的現場表演力均受到成員們、運營和粉絲大眾的認同，身為團隊中最年幼的她，擁有絕對的象徵資本，出道之際的她信誓旦旦地想幫助團隊成功，和其他姊姊們相處融洽毫無分歧，但隨著平手友梨奈展開個人外在演藝工作且獲致更多好評，積累出更多的形象資本，以及外部性文化和社會資本；再回到內部團隊時，她對所有作品的詮釋和解讀的要求更高，態度成熟與她的年齡形成巨大反差；相對地，因平手友梨奈的過人才華而有成員對其產生依賴，即使自覺像是她的伴舞也沒關係；但亦有成員因平手友梨奈的耀眼光芒而覺得被忽略，認為再怎麼努力似乎都不會被運營重視。隨著時間的消磨與作品的累積，身處於團體場域中逐漸成長的偶像們，在心態上都呈現不同的變化，因此當平手友梨奈決定暫時離開團體並將保持距離的決定告知成員們時，她最後問了大家一句：「大家現在在櫛坂，開心嗎？」（高橋栄樹，2021）

### 三、蠢蠢欲動：規制下的真實自我

偶像的工作開心嗎？以日本養成偶像女團為例，一般的表演曲目幾乎都是 16 人以上的好人數「選拔組」進行演出，至於選拔組的挑選則由運營高層決定，是偶像成員最想爭取卻又摸不著頭緒的灰色地帶，影響著偶像們的喜怒哀樂。事實上，運營在內部揭曉新單曲的「選拔組」成員和萬眾注目的 Center 一角時，皆會拍攝記錄下所有過程並訪問當下成員的心情，從中可明顯看出被選入的成員們大多相互擁抱喜極而泣；但沒入選的更多成員則呈現多種樣貌，失望、傷心、尷尬、沉默、憤怒皆有。

以櫛坂 46 的第九張單曲為例，在前八張單曲都以全員選拔方式進行的櫛坂 46 選拔規制，因二期生已逐漸養成之際，於是運營決定從第九張單曲調整原來的全選拔機制，改由 17 人制的選拔組制度。當運營高層召集所有成員期會一堂並公布選拔組成員後，落選的成員立即被指示離開現場，其中包含 7 位一期生和 2 位二期生，而這支單曲的選拔組成員恰恰好有 7 位新加入的二期生成員，如同被替換的兩批前後輩成員，這樣的結果對落選的一期生而言，心中不滿多於失望；但對入選的二期生來說，內心不安的尷尬則勝過喜悅。

當跟拍鏡頭跟蹤落選者至其他的會議室時，從未失去參與新歌機會的一期生開始放聲哭泣，對此，落選的一期生石森虹花受訪表示，她雖然心裡有準備不會被選上，但這樣的選拔結果還是讓她很不甘心且很憤怒，她說：「過去若沒有〈齋藤冬優花〉，舞蹈不會整齊；當初平手缺席巡迴演出時，若沒有〈小池美波〉代役 Center，那首歌也無法表演下去，她們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員，以整體一決勝負，不就是櫛坂嗎？但當二期生進來後，我也意識到環境開始變化，而我也心理準備，所以還算能夠接受這樣的結果」（高橋栄樹，2021）。

接受運營的挑選結果是成員唯一的選擇，即使落選成員的內心再多不甘心，也只能調整情緒面對現實。能夠調整好的成員，會在對外公告選拔組成員名單時，運用媒體平台或官方的個人自媒體帳號，向粉絲說明自己的心情，此時如何表達自己的想法就會牽動到失望的粉絲心理，在運營不審查的

前提下，若內容寫得正向真誠，反而會激起粉絲的疼惜之心，進而加深彼此之間的羈絆；反之則可能引發自身、粉絲與運營的緊張關係。

以櫻坂 46 第三支單曲為例，成員藤吉夏鈴在經歷了前兩支單曲皆為 C/W 曲<sup>2</sup>Center 之位後，第三支單曲卻掉至 Backs<sup>3</sup>站位，即使依然進入了選拔組，但卻無法參與所有歌曲的錄製，這對視音樂製作為最大樂趣的她而言打擊甚大；相對地，對她的粉絲來說，這是一個不被運營重視的危機訊號。於是當選拔組消息甫一公開，藤吉夏鈴旋即在其官方付費「櫻坂 46 メッセージ」(櫻坂 Message)<sup>4</sup>訂閱平台寫下給粉絲的話語，她說：「我的站位下降，真的很對不起粉絲！我想這必然是因為我沒留下什麼好成績才造成的結果，自己的表演哪裡不夠好，沒能經常表現出自己的感情，在對待各位粉絲的部分有很多不足之處，這些都是原因所在...但我又改變不了自己那奇怪又不會轉彎的性格...為了之後能實現參與所有歌曲的目標，我會再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各位粉絲的應援幫助...為了不讓這份不甘心就這樣結束，我也會尋找一些只有自己才能做到的事，為櫻坂竭盡心力，希望藉此能讓自己變得更強，這是我第一次有了想為自己全力以赴的心情！對於無法參與所有歌曲真的非常抱歉...說了很多，但最重要的還是請大家繼續支持櫻坂！」(夏之風鈴字幕組，2021 年 8 月 9 日)。

直白的心情抒發不僅引發其主推粉絲的憐愛之情，亦召喚出非主推她的粉絲對其的疼惜之心，紛紛給予支援，反應在後續的握手會票數均異於過往地迅速完售；也讓藤吉夏鈴逐步找回信心，更加努力於詮釋歌曲的表演工作，於是從第四張單曲站位漸漸往前推進，第六張單曲更一躍成為 Center 外，其過人的表現力亦吸引了多位廣告製作人與戲劇導演的青睞，成為多元發展的偶像與演員。一則貼文透過自媒體的中介與分享，讓局勢觸底翻轉，隱約轉換出握手會拆帳效益的經濟資本，以及後續形象資本累積出的關係網絡社會資本。

---

<sup>2</sup> Couple With：和主打單曲一起的歌曲，一般皆以副主打歌著稱，亦會拍攝音樂錄影帶。

<sup>3</sup> Backs：指單曲中舞蹈站位的最後一排位置區，以及非選拔組之成員們。

<sup>4</sup> 櫻坂 46 メッセージ (櫻坂 Message)：櫻坂 46 的官方粉絲服務平台應用程式，為指定單一偶像成員按月付費訂閱機制 (成員可複選訂閱)，內含訂閱偶像傳送之文字、照片、視頻、音檔功能，但無訂閱者回覆機制；另設有粉絲寄送信件給訂閱偶像功能，但無偶像回覆機制。

我想大概有人會討厭我…就算討厭我，也請不要討厭 AKB！（高橋榮樹，2013）

這是粉絲投票選為第一名的前田敦子上台演說時的經典話語，這句話道盡了身為 Center 不為人知的恐懼與孤獨。在此之前，前田敦子幾乎一直都被 AKB48 運營選為單曲的 Center 一角，如同櫛坂 46 的平手由友梨奈般的絕對 Center，看似擁有最多聚光燈的光環，卻也是看不到身後舞台成員與前台外暗黑觀眾區的站位，而這看不見的區域其實隱藏著不滿的注視，尤其在選拔組之爭態勢明顯的團體中，日夜辛苦的排練幾乎都是為了有朝一日能進選拔組、能成為 Center 而努力，但 Center 畢竟只有一位。

以「AKB48 第 53 張單曲世界選拔總選舉」的成員競爭狀況來看，唯有進到粉絲票選的前 16 名次才能進入選拔組，故所有參加的候選成員莫不卯足全勁拼命拉票，其中尤以代表名古屋的 SKE48 松井珠里奈與代表福岡的 HKT48 宮脇咲良兩人最被大眾看好爭奪象徵 Center 的第一名之位。然因開票場地選在名古屋舉行，身為在地王牌的松井珠里奈為了不失去面子拚盡全力，在名為『Legend of AKB48 NEW CHAPTER』紀錄片中，她哭紅著眼睛對 SKE48 成員們訓話：「現在的對手已經不是 AKB，而是乃木坂、櫛坂！只有 SKE 能和她們一戰了，要抱著這種程度的覺悟戰鬥，都別把她們（手指向四周的 AKB48 Group 成員們）放在眼裡！」（酒井麻衣，2018）。之後，在彩排場所也對其他來訪的 AKB48 Group 成員們嚴厲說道：「請大家抱著必死的覺悟炒熱名古屋，不用必死的心就無法炒熱，這是 SKE 最了解的事情，所以請跟著 SKE 吧！我們會炒熱名古屋全場氣氛的」（酒井麻衣，2018）。完全無視於總監督橫山由依呼籲成員們不要受傷、盡情享受並快樂地和粉絲一起度過的提醒。

選舉的最後結果，松井珠里奈確實奪得最高票的第一名，但在活動過程中，抱著必死覺悟的她不僅因過呼吸無法正常演出而被抬下場；即使重返舞台演出也以悄悄話方式向宮脇咲良發出嚴厲地認真提醒，造成最強對手宮脇咲良的心理不適，在後續的演出曲目上，凡是有松井珠里奈的演出歌曲，宮脇咲良即不上台表演，突如其來的個人決定，讓其他成員們摸不著頭緒，甚至在活動結束最後的選拔組大合照中缺席，當然也包括了媒體的訪問。這意

外的過程被大眾所察覺，事後的媒體訪問話題幾乎全圍繞著拿下第三名的宮脇咲良缺席之謎，此時松井珠里奈才向大家解釋：「在表演歌曲的瞬間，我對咲良說：妳要更努力好好跳，否則 AKB 就玩完了！說完後，咲良就不出來了，她很傷心，所以我要向她說對不起」（鏡周刊，2018 年 6 月 20 日）。自始至終都以地主強勢高傲的態度向所有成員們發號施令的 Center，終究還是遭到鐵羽而歸的王牌成員無言反抗，有趣的是，似乎眾人都忘了誰是第二名。

這次的選拔總選舉在團體中的兩大王牌成員松井珠里奈和宮脇咲良的競爭吵雜聲中落幕，而壓抑的意志和這意外的插曲也導致松井珠里奈的身心失衡，不僅缺席了新單曲的 MV 拍攝；還請辭運營和韓國媒體合作的選秀節目《Produce 48》演出。相形之下，在選拔總選舉中屈居下位的宮脇咲良，依然按部就班參與 MV 拍攝，甚至還取得《Produce 48》第二名成績，加入了日韓合作的期間限定女團 IZONE，成為 AKB48 Group 的領軍代表、成員們嚮往的標竿。從此，總被視為 AKB48 Group 團體場域中的兩位長期競爭「夥伴」終於分道揚鑣，而松井珠里奈和宮脇咲良的能動行徑也在此最「適合」的媒介場域中被無限擴大，造成各自的形象資本變異與社會關係籌碼變化。

## 伍、結論

透過媒體歌唱綜藝節目、徵選廣告的中介傳播下，形塑了一般大眾對偶像表徵的框架印象。當偶像職業只是一種喜歡對象存在的環境想像，會讓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視為夢想的目標，也許是因為能夠穿著漂亮的衣服、唱跳著好聽的歌曲，又或是舞台上的耀眼笑容可以牽引著觀眾的應援與掌聲，閃閃發光的螢光棒勾勒出一齣齣美好又夢幻的憧憬，令人忘卻這舞台背後的汗水、淚水與艱辛。如上所述的偶像養成的幕後過程中，偶像們從一加入團體開始，即已認同了團體並願意服從運營規制，過著與同齡層迥異的成長經歷，走上未曾見過的人生場域，展開一場隨機應變的關係競爭，如何能突破現狀並走向自我成長，端視個體所累積的資本在團體中的應對進退之道。



偶像並不只是一般大眾所認知的追逐夢想而已，還有著許多原因，除了憧憬外在的漂亮服飾外，欲改變當時的自己、被家人偷偷報名、陪家人徵選順便一起參加...等是常見的動機，如日向坂 46 的《小坂菜緒》為了改變因怕生又不擅長站出來說話的自己而報名、乃木坂 46 的《西野七瀨》是被媽媽偷偷報名而不得不參加徵選，許多的王牌偶像都是在意外的機緣下踏入此一職業場域，並從自我意識的磨合中建立起自我於團體中的人設角色，隨著被賦予的位置資本和角色責任，每位偶像個體性格亦逐漸地被形構。

偶像對我來說是一種憧憬，被選上的時候就想著終於能去認識我所不知道的世界了，懷著滿滿的期望。但是，一旦進入這裡，卻感覺到自己的無力感，能支撐我慢慢前進的是成員們的互相支持！（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Inc, 2018 年 7 月 9 日）

上述為櫻坂 46 第一任隊長菅井友香在經歷了偶像之路後的經驗談，運營所規制場域下的偶像個體需調整自己加入前的慣習以適應團體的日常生活，面對團體中最为傑出的平手友梨奈時，該如何帶領團體與其「配合」並完成每次的排練和表演，是來自富裕家庭的菅井友香，身為隊長所需擔負的責任。當團體因平手友梨奈的特別出色而吸引著大眾眼光之際，菅井友香也逐漸察覺這個王牌成員在拉開與成員的距離，明顯的拒絕參與團體演出讓菅井友香感到無奈，她無法以隊長的權力之姿與更為強大的唯一 Center 對話，已經成長到擁有強烈自我個性的平手友梨奈極少與成員互動，僅和運營工作人員溝通對話，在所有她的想法皆由運營高層向成員們說明的情況下，內部失衡的團體氛圍，櫻坂 46 這個團體開始出現裂痕並走向未知，看不到未來且無法認同此狀況的成員們開始逐漸離開櫻坂 46，而願意繼續堅持下去的同期生，除了不甘心但仍想持續努力的成員之外；其餘皆與菅井友香關係較為密切者居多，面對如此混亂，平手友梨奈也曾表達她對偶像這一職業的感觸。

踏入這個世界所見到的景色，有好事、也有壞事；痛苦的事、快樂的事都有，我們只是拼命努力去完成一部作品，所以才會那麼躁動，也會引起衝突，可能給不了你所謂的”美好的青春”，因為這裡沒有

正確，也沒有錯誤！（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Inc, 2018 年 7 月 9 日）

平手友梨奈對作品的要求標準異於團體成員們，天賦卓越的她拚了命地追求自己設立的高標準，卻無法讓其他成員與她並進或追上她的步伐，整體表現反而造成她對自己的表演極度不滿且失去信心；加上是團體中的最年幼成員，雖然在姊姊般成員們的疼惜照護下成長，但面對想法不同的姊姊們，即使身為 Center，依然無法以下對上地反應，在缺乏溝通且總是坐在角落遠離成員們的她，終究以拒絕出席做為她真實的反應能動，卻也招致成員們的不解和團體極大的危機，如此不穩定的狀況直到她宣布自團體脫退後，搖搖欲墜的櫛坂 46 也正式走向落幕。

媒介中介對偶像而言是關鍵的資本生成所在，相對於隊長在團體獨佔支配權與話語權，Center 的權力源頭雖始於運營的決定，然若善於策略運用 Center 一角在外部媒體網絡中的關注性與能見度，透過媒介前台展演期間所推疊的形象和文化資本，重返團體後的資本力量再製與轉換往往可超越隊長所擁有的權力，甚至有著不可取代性，更遑論其他成員們。經濟資本是所有類型資本的根基，而所有類型的資本也都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從個體利益層面觀之則更顯差異，故即使不能成為 Center，為了能讓自己累積各項資本，進入選拔組是最快速且省力之途。

選拔組的規制，對人數眾多的偶像成員而言是種一拍兩瞪眼的競爭與服從，面對「掉選拔」這件事，是需要極大的理由來被安撫，除了成員們的慰解外，身為公眾人物的偶像，也需調整挫折的情緒以面對支持者的失落和鼓勵。除此之外，失去參與新單曲的機會，等同於失去未來長時間的媒體曝光工作，不僅少了收入，也對自我形象資本的累積產生影響。積極的成員會加強自己專屬官方社群平台的內容更新，運用媒介的中介場域，另創屬於自己的幕前舞台，即使無法唱跳著新歌，但仍可向粉絲展現自己的想法，藉此慢慢累積自我形象。

如同 Couldry（2006）所認為的中介其實彰顯的是媒介的「能動性」（agency），也就是將媒介視為存在於一個複雜的社會實踐空間的「力場」。對於公眾人物而言，自媒體的場域空間就是充滿任何可能性的實踐，偶像成員在自媒體中的內容製造，即是將自身天性與服從團體調適後的慣習展演之

所在，透過自媒體在社會慣習既有的脈絡，流通於大眾眼前，成為不斷被再製的輸出文本，隨著閱覽的數量增加，構成形象資本的另一種變現機會。就如同藤吉夏鈴因站位下降的自媒體抒發文所引發的形象資本再製與轉換經濟資本，以及後續流動的關係網絡社會資本。

相對地，若能依靠大眾媒介既有的強大力場作為自我表現的實踐場域，其所影響的幅員更為廣闊。當 AKB48 Group 中的兩大王牌松井珠里奈與宮脇咲良在選拔總選舉的超級舞台上較勁，其所牽動的範圍已跨越在地空間，透過各式大眾媒介與網路傳輸至各地，讓擁有龐大社會資本主場優勢的松井珠里奈以其在地慣習態度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如願以償地拿下她入團以來的最大目標，也就是拿下總選舉第一名成為 AKB48 Group 的 Center；而屈為客場劣勢的宮脇咲良，雖未能以選票贏得勝利，但卻因深感被欺侮而發生的自我能動反射行為，在象徵性的形象資本層面，竟偶然地翻轉了位居下風的位置，將松井珠里奈過於自大的傲慢行徑充分反映出來，成為其在社會關係場域中「名聲掉價」關鍵。

綜合上述，在偶像的養成過程中，個體成員會將團體規制內化與自我慣習融合調整，並根據所處的團體角色位置，形成初步性的社會資本，並據此建立內部關係；再隨著自我對運營管理控制程度，以及對其他成員的支配權力程度，逐步調整自身的慣習策略和人際關係，以增加自我在團體中的談判籌碼。此外，個體對團體的貢獻度，需透過外部社會關係網絡給予反饋，故在團體場域的角力競爭上，個體則須充分運用媒介的中介化特質，將自我角色設定透過媒介力場與外部建構出形象資本的社會關係，並以此強化自我在團體內部的權力關係和不可替代性象徵資本籌碼，而此偶像發展的實踐也成為偶像個體發掘自我的養成人生。最後，偶像這一職業有著殘酷的喜新厭舊和賞味期限之現實，當收穫滿載、羽翼豐厚時便選擇離巢單飛，畢業離開團體轉戰其他演藝職涯角色；抑或是認清不適任的事實而選擇完成夢想回歸素人生活。

## 參考書目

- 中央通訊社 (2019年1月15日)。〈AKB48及姊妹團成人式 山口真帆驚魂事件受關注〉。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mov/201901150004.aspx>
- 中央社 (2023年9月15日)。〈焦點：傑尼斯面臨嚴厲輿論 廣告主紛紛遠離〉。取自 <https://t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9/956e7912c8b2--.html>
- 李世暉、林芙白、蔡彥亭 (2017)。《AKB48的光與影》。台北：翰蘆圖書。
- 李猛、李康譯 (2016)。《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台北：麥田。(原書 Bourdieu, P., & Wacquant, L.[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U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林富美 (2004)。〈藝人與經紀人派遣勞動關係初探〉，《新聞學研究》，78：143-186
- 吳宇軒 (2011)。《我一直在：歌手情感勞動行為研究》。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 邱天助 (1998)。《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臺北：桂冠。
- 洪瑞璇、潘慧玲 (2021)。〈學校變革生發的場域分析：以學習共同體為焦點〉，《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21(1)：49-90。
- 徐賁 (2002)。〈布迪厄論知識分場域和知識分子〉，《二十一世紀》，70：75-81。
- 唐士哲 (2014)。〈重構媒介？「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新聞學研究》，121：1-39。
- 夏之風鈴字幕組 (2021年8月9日)。〈[Message]藤吉夏鈴 8/9〉，【網路論壇貼文】。微博。  
<https://weibo.com/6874140522/KsFHObZkE?pagetype=profilefeed>
- 陳坤賢 (2006)《蠶食勞動—從契約關係析論流行音樂歌手之勞動條件》。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梅衍農 (2023年9月7日)。〈傑尼斯記者會認了性侵事實！社長下台哽咽認錯〉，《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23693/7423484>
- 黃小芳 (2015)。《從 Goffman 戲劇論印像館裡框架探討校長領導：以一位高中女校長為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育行政碩士學位論文。
- 雍小狼譯 (2014)。《AKB48 告訴我們的事》。臺北：平裝本。(原書 Masaaki Katabami[2012]. *AKB48 の言葉が教えてくれること*. JAPAN: Asa Publishing Co., Ltd.)
- 楊智仁 (2023年5月18日)。〈「我推的孩子」主題曲 YT 破 1 億播放！YOASOBI 僅一個月刷新 J-POP 最速紀錄〉，《ET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game.ettoday.net/article/2501583.htm>

- 蔡孟學 (2022)。〈從 Goffman 戲劇論探析師生 LINE 群組〉，《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1(1)：93-102。
- 簡妙如 (2015)。〈甘願勞動：歌唱選秀節目的遊戲、順從與業餘明星夢〉，《傳播研究與實踐》，5(1)：1-31。
- 鏡周刊 (2018 年 6 月 20 日)。《鏡週刊 PRODUCE 48 系列報導：一姐之爭！松井珠理奈 PK 宮脇咲良 從 AKB 戰到〈PRODUCE 48〉你支持誰？》。【YouTube 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fUowQ5p-E>
- 赤坂明、橫槍萌果 (原作)，平牧大輔 (導演) (2023)。《推しの子》【影片】。日本：赤坂アカ×橫槍メンゴ／集英社・【推しの子】製作委員會。
- 秋元康 (製作人)，高橋栄樹 (導演) (2013)。《DOCUMENTARY of AKB48 No flower without rain 少女たちは涙の後に何を見る?》【影片】。日本：東寶。
- 秋元康 (製作人)，高橋栄樹 (導演) (2021)。《僕たちの嘘と真実》【影片】。日本：ソニー・ミュージックレーベルズ。
- 秋元康 (製作人)，酒井麻衣 (導演) (2018)。《AKB48 単独コンサート～ジャーバージャって何?～》【影片】。日本：AKS。
- Baty, S. P. (1995). *American monroe: The making of a body polit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3).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N. Richard,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 Bourdieu, P. (1989) *La Noblesse d'Eta. Grandes écoles et esprit de corps* (pp. 373-375). Paris : Editions de Minuit.
- Couldry, N. (2006). *Listening beyond echoes: Media, ethics, agency in an uncertain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 Couldry, N. (2008).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10(3), 373-391.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 Magda Szymanska (2022, March 10). The rise and fall of AKB48: Japan's biggest girl group. Is it the end for the group's Cinderella formula? *The Riff*. Retrieved from <https://medium.com/the-riff/the-rise-and-fall-of-akb48-japans-biggest-girl-group-4c4b16f8ae27>

- Marvin, C. (1988).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HK NEWS WEB (2019 年 1 月 9 日)。〈「NGT48」メンバーの自宅に男2人が押しかけトラブル 新潟〉。取自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111021225/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190109/k10011772051000.html>
- Seed & Flower 合同會社 (2022 年 6 月 13 日)。《櫻坂 46 新メンバーオーディション CM 山崎天編》。【YouTube 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tIHcHk-6c>
- Seed & Flower 合同會社 (2022 年 6 月 13 日)。《櫻坂 46 新メンバーオーディション CM 田村保乃編》。【YouTube 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njw4YaSggo>
- Seed & Flower 合同會社 (2022 年 6 月 20 日)。《櫻坂 46 新メンバーオーディション CM 藤吉夏鈴編》。【YouTube 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XBBedj1Vxg>
- Silverstone, R. (2005). Med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C. Calhoun, C. Rojek & B. S. Turner (Eds.), *Handbook of sociology* (pp. 188-207). London, UK: Sage.
- Silverstone, R. (2007). *Media and morality: On the rise of mediapolis*. Cambridge, UK: Polity.
-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Inc. (2018 年 7 月 9 日) 坂道合同新規メンバーオーディション開催！ 取自 <https://www.nogizaka46.com/files/46/audition2018/?ima=1147>
- UtaTen (2023 年 4 月 27 日)・YOASOBI 「アイドル」歌詞の意味を考察！人気アイドルの本当の姿とは？ 取自  
<https://utaten.com/specialArticle/index/8141>
-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Routledge.

##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the Field Struggle in Idol Cultivation: A Case Study of Japanese Girl Groups**

Hsing-Lun Lee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dol pop culture has swept through the glob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While the public often harbors stereotypes of idols as a group of beautiful, handsome, and cute people performing on stage, this ignores the harsh realities behind their development. What do these idols go through off-stage? How do they survive in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within the group under operational regula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employ theories of field, dramaturgy, and media mediation to analyze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Japanese idol girl groups as agents. It seeks to depict the agency breakthroughs in the idol cultivation. Through the social practices of individual members, such as participation in auditions, role positioning, and struggles for selection and central posi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idols have internalized group rules and adjusted their habitus. Depending on their role within the group, they form initial social capital and establish internal relationships. Subsequently, as they gain more control over management operations and power over other members, they readjust their habitu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o increase their bargaining power within the group. Furthermore, in the competitive struggles within the group's field, individuals fully util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 mediation to construct social relations of image capital through the media power field, thus strengthening their relationships of power and irreplaceable symbolic capital within the group. This practical circuit of idol development also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idols' life cultivation as they discover themselves.

**Keywords:** Idol cultivation, Field, Struggle, Japanese Girl Groups

---

\* Hsing-Lun Lee, Ph.D. Student at the Ph.D. Program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rachellee34@gmail.com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九期  
2024 年 6 月



## 從中立到中立台灣的兩岸思考與一個方案\*

傅大為\*\*

### 本文引用格式

傅大為 (2024)。〈從中立到中立台灣的兩岸思考與一個方案〉，《傳播、文化與政治》，19:99-120。

---

投稿日期：2024 年 6 月 20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7 月 8 日。

\*感謝：本文的完成，前後拖延甚久。現在藉此機會特別要感謝下面幾位朋友過去的熱心提供資料、以及對草稿的批評與提出好意見，但本文的錯誤與偏見之處，自然由本人負全責。他們是：蘇哲安、盧倩儀、吳永毅、王志明、馮建三。

\*\* 傅大為為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榮譽教授，e-mail: dwfu@mx.nthu.edu.tw。

## 《摘要》

如何超越傳統的統獨之爭，又如何解決兩岸問題，一向有很多的提議與可能性，但卻常忽略了一個有極大潛力的路子：中立台灣。呂秀蓮曾花大功夫來推動和平中立運動與公投，但走了一半就停止，西方研究中立的學者也曾嘗試以中立視角來思考兩岸與台灣的未來，但問題也很多。本文一方面基於過去中立研究的基礎，另一方面則要擺脫過去親美自由派的中立國觀點，企圖從一個反戰與國際左翼的立場，提出一個左翼的中立台灣觀點。中立研究學者近年來提出一個重要的歷史與國際法的概念區分：有主權的中立 VS. 沒有主權而只有地域的中立 (territorial neutrality)。本文即利用這個區分，並加以改裝來放進一個左翼的兩岸框架中，來思考兩岸及美國可能如何回應兩種中立台灣方案（一個是有主權的中立台灣、一個是只有地域中立的台灣）。在這思考的過程中，本文也廣泛地使用對歐洲中立國從二戰到後冷戰時代的豐富研究，還有對東南亞國家在後冷戰時代如何開拓中立路線之當代研究，以及對美國近年來的國際帝國霸權、以及它如何在東亞圍堵中國的國際左翼研究，並以這三類的研究來支持與認證一個左翼中立台灣的可行性。最後，就對各種立場的區辨而言，本文對台灣的左獨、國民黨的九二共識、還有大中國邦聯制等思想都做出區隔與評論。並建議九二共識、乃至大中國聯邦方案都還需要更往前發展，並與左翼的中立台灣觀點作對話與互相連繫，以便能夠在未來兩岸協商過程中形成一個有力的方案。

**關鍵詞：** 中立國、台灣中立、地域中立、左翼、呂秀蓮、兩岸關係、東方的瑞士

從 2021 蔡英文說的兩國互不隸屬、賴清德今年 520 以來就不斷複述的兩國論，到上述論點的對立面：92 共識、一個中國下的一些兩岸構想，如某種邦聯制、甚至一國兩制，這是我們當前在思考兩岸關係下的一個主流框架。但我一直覺得這個框架太狹窄，遺漏了一些其他很好的可能性。本文就是企圖來討論這個其他可能性，並嘗試修改目前的主流框架。我先從幾個抽象的概念作為引子。在幾個彼此競爭的大國、強國旁邊的小國，政治與外交之道要如何自處？一位政治學者曾說，大致有「扈從」（即不挑戰強鄰、尊重甚至擁護大國的核心利益、並強調與之必要的和睦關係）、「避險」、「抗衡」、乃至「中立」等幾種模式的選擇。今天我們在台灣，常聽到的政治外交政策是扈從美國，抗衡中國（所謂的抗中保台）、或者是避險中國（是扈從與抗衡之間的混合策略），但卻很少聽到中立的模式，好像它與我們台灣統獨或維持現狀的各種爭議，距離很遠。但筆者以為，這正是台灣目前兩岸三邊（包含美國）的國際情勢、乃至問卷調查架構的一個盲點、一個錯誤的認識。

## 壹、前言：呂秀蓮推動中立台灣背景

最近筆者常思考兩岸議題中較少人討論的「台灣中立」之路，比較仔細的看了呂秀蓮在 2018-19 中推動臺灣中立的議題。<sup>1</sup>但被臺灣公投法的修法制止後，後來似乎就沒有再積極推動了。反而我看到從 2021-22 年，呂很積極的在推和平運動、甚至涉及一點反戰、避戰等論點，與我們 2023 推動的「反戰聲明」有點相通的地方。記得後來有左翼團體曾希望邀呂去演講，但她當時人在韓國，有點可惜。呂都已經年近 80 左右了，還能到處走動，推動中立、和平，也企圖競選總統等，也實在令人驚嘆。可惜她認真的論述很少，

---

<sup>1</sup> 其實搜尋網路，呂秀蓮從 2014 二戰終戰紀念日前後就開始推動了，一直到 2022 俄烏戰爭開始後仍然有對此發言，她前後的觀點也多少有變動，但本文主要立論並非在討論呂的觀點，而是以呂其實有問題的努力作為引子。所以不擬詳細討論她的論點與前後改變。

只是到處演講與受訪。而綜觀呂的和平與中立論述，實屬淺綠的自由派立場，她並認為她的中立台灣說法，是超越統獨的第三條路，但她對中共對台政策的批評，相當強硬，其實接近深綠的論點，也難怪有中共學界人士曾認為呂的中立說也算台獨。

因為本文的主題是中立台灣，而呂在 2018 前後的台灣中立言論，其實有更深的一面，值得看看。過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張文生教授曾批評呂的活動，正是來自呂在 2018 主辦的第一屆東亞和平論壇（由南韓、台灣、瑞士共同主辦，會中包括武裝中立國議題的專題，除了國際友人外，還有施正峰、彭百顯、翁明賢、張旭成、以及國民黨的梁礪、林建昌等國內知名人士出面參與）、<sup>2</sup>還有呂 2019 在華盛頓（與蔡明憲）討論台灣海峽和平中立的言論。呂、蔡二人在華盛頓與美國作中立國研究的學者有互動，呂和蔡的言論，後來收進 Herbert Reginbogin 與 Pascal Lottaz 所編（後簡稱 R&L）的 *Permanent Neutrality 2020* 一書中。那個時段，可說是呂最熱心又用心於永久中立國的時節。<sup>3</sup>呂的和平公投的主文為：「你是否同意台灣應向國際宣布和平中立」。雖然呂在接受美國之音訪談時，曾提到該主文並沒有提到「國家」本身，但公投的理由書裡，卻以「中立國」來立論，的確涉及了國家主權的問題。呂除了複述中立國的一般立場外，再引用聯合國最新關於中立的說法來支持這個公投的正當性與當代性：2017 年聯合國的國際中立日（International Day of Neutrality），並舉了土庫曼在 1995 年脫離蘇聯而成為中立國，<sup>4</sup>以及蒙古共和國在 2015 年也成為中立國等。

---

<sup>2</sup> 彭百顯、呂秀蓮從 2015-2018 就在台灣成立「台灣和平中立大聯盟」及舉辦各種活動，後來再聯合企圖競選總統。

<sup>3</sup> 呂秀蓮對中立台灣比較清楚的言論，除了見 *Permanent Neutrality* 一書的第十章“Cas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Neutrality Advocacy”外，可見 Newtalk 新聞〈呂秀蓮推和平公投 消除台灣與他國合作抗中的憂慮〉（林朝億，2019 年 3 月 4 日），包括台灣和平中立公投的主文與理由書。還有 2019 年 3 月 27 日，美國之音中文網訪問呂秀蓮與蔡明憲【呂秀蓮：和平中立的臺灣與中國是遠親近鄰，新時代用新視野開創新未來】，參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rVFZf99VE>

<sup>4</sup> 關於土庫曼還有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企圖走中立國的當代史與比較，可以參考 R&L eds., *Notions of Neutralities* 2019, D.Noack 所著 “Politics of Neutrality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A Comparison of Concepts, Practices, and Outcomes of Neutrality in Moldova, Turkmenistan, and Ukraine 1990–2015” 一文。另外還有參考孫國祥〈析論

在此和平中立運動的組織與社會宣傳上，2018 東亞和平論壇上，呂還拉了瑞士一起來主辦，並邀請東亞南韓及菲律賓的國會議員來參與，而在 2019 和平中立公投的跨黨派記者會上，呂更邀了國民黨方面的梁礪、林建昌來共同舉辦。除了邀國內媒體廣泛報導外，也透過美國之音中文網的訪談，企圖向對岸發聲。在那幾年，呂的中立和平團隊的親善努力，可謂煞費苦心。<sup>5</sup>包括她在 2015、2019 兩次訪美，在洛杉磯、華盛頓等地演講，宣揚和平中立。接受一些美國在地電視台的訪問，拜訪人權組織、記者團體、自由派智庫等，並於美國國會參議院的卡特辦公大樓與美國天主教大學、智庫及中立研究的學者合辦「永久中立」的座談會等。

但是，可惜的是，我們找不到美國官員、或知名的國會議員，包括來自 AIT 的正面回應或評論的資訊。美國當時對呂的中立和平運動，保持正式的沉默，即使 2019 呂已經表明要參與競選總統。同時，在中國方面，我們只看到少數嚴厲的批評。如呂招致了廈大台研院張文生教授「台獨」的批評，說「早在戰後時期，老牌『台獨』分子黃紀男就曾向美國提出『永久中立國』的概念，呂秀蓮不過是拾人牙慧，重提『台獨前輩』早已被世人唾棄的老套概念，行分裂國家之實」。但張教授的批評有點奇怪，<sup>6</sup>說呂的中立說早已過時云云。我想這個批評可能不太明瞭呂那時所說的觀點。從前面提到聯合國「中立日」的新發展，中立哪裡算過時了？何況，前面提到呂與美國中立學

---

士庫曼中立政策成效的探討〉一文，見吳玉山、楊三億編的《中小型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2019）文集。

<sup>5</sup> 但要注意，呂在前面註腳提到的“Case Studies”（2020）一文中，對中共對台的可能干預與滲透之說法，卻是很強硬而充滿陰謀想像，說要注意中共在台的第五縱隊，甚至說台灣一些民選的市長，還有總統候選人，都是中共挑選的，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云云(p.202)。呂文還回溯二戰後盟軍沒有幫助台灣舉行公投來決定未來命運，導致地位未定論，後來又在 1971 聯合國會議中因為不合理的 2758 號決議讓台灣繼續處在不明的地位。隱約中，呂在文中似乎暗示他們的和平中立公投，是補償台灣二戰後一連串該做卻未做的地位與未來之路的工作。

<sup>6</sup> <https://news.ifeng.com/c/7IKAE7KE1un?OmPvwD>,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reakingnews/2741024>，黃紀男的相關資料，可參考：

<https://www.facebook.com/legacy/notes/617191951682059/>，但看不出與多年後的呂秀蓮有何關係。反而呂的想法與張俊宏散文式的《和平——中立的台灣》（2011）時間距離近得多，特別可參考該書第六章。但呂與張的「中立」觀點差異仍大，看不太出彼此的關連。感謝吳永毅與王智明提供資料。

者 R&L 的交流，其實後者對於中立國之外，還提出了另一種無涉國家主權的「地域中立」思想，呂應該知道，但卻遲疑而沒有正式採用，而形成一種呂與 R&L 若即若離的關係，我們下一節會仔細來討論。

當然，關於前面呂訴諸聯合國的論點，一個反駁可能是：或許土庫曼與蒙古是相對孤立與封閉的國家，<sup>7</sup>在蘇聯解體後，走向中立，所以比較是個特例。而聯合國的中立日，也包括了鼓勵自己的會員國可以在國際衝突上保持中立和平，不一定與中立國有關。另外，認為中立國「不再流行」的一個重要論點說，因為冷戰結束，所以如芬蘭、瑞典、乃至奧地利就不再需要過去的中立國立場了，反而因為全球化、國際化犯罪與恐怖主義盛行，所以更需要國際合作或聯盟（起碼如歐盟一般）。所以這是為什麼芬蘭與瑞典相繼加入歐盟，甚至參與 NATO 的「和平伙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不過，芬蘭與瑞典仍然有中立的傳統與意識，所以它們到 2019 也都未加入 NATO（即使俄國早已佔領了克里米亞，那時兩國仍然不參加北約軍事同盟），而瑞士、奧地利更維持中立到現在。<sup>8</sup> 何況，這個冷戰結束就不再需要中立說法的弱點，就是現在已經廣為討論的「新冷戰」的崛起，俄烏戰爭的開打，包括在東亞的中美對抗，現在逐漸再加上東亞的俄國吧。<sup>9</sup>

## 貳、H.Reginbodin, P.Lottaz 對中立還有中立台灣的看法

---

<sup>7</sup> 相對而言，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也曾嘗試中立國的路子。但後來因為受歐美的影響與滲透，無法維持中立的立場，反而成為親西與親俄兩股勢力的長期爭鬥，到後來 2014 美國與 NATO 的勢力獲勝，導致是俄國佔領克里米亞，見前註 4 中 Noack 的論文（2019）。

<sup>8</sup> 參考李俊傑「重探中立概念的政治性：瑞典與芬蘭之比較」，吳玉山、楊三億主編（2019），ibid. PfP(Partnership for Peace) 並不表示加入 NATO，只是參與一些共同維持和平的行動。當然，後來因為 2022 俄國侵略烏克蘭，導致俄烏戰爭的緣故，到 2024 瑞典與芬蘭都已經正式加入 NATO。另外，本文較少談到歐洲歷史較短的中立國奧地利，它在二戰後才成為中立國，雖然冷戰結束後奧地利的中立國方向確遭到困難，但該國仍然堅持下來，即使在俄烏戰爭後美國的壓力之下，目前仍然保持中立。可參考湯紹成，「奧地利的中立地位及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2010) 頁 89-137。

<sup>9</sup> 例如，參考 G. Achcar's *The New Cold War* (2023). 俄國這一兩年來也積極進入東亞，包括最近普丁的訪問中國、北韓、越南等國。

上節提到的 H. Reginbogin & P. Lottaz (R&L) 兩位歐美／日本學者近年來對中立國的討論、還有對中立台灣的闡述，有些還不錯的成果（如他們編的兩本文集 *Permanent Neutrality 2020, Notions of Neutralities 2019*），可能也間接地刺激了呂秀蓮討論中立台灣的想法，如呂在提倡中立公投時，特別提到他們所提議的公投主文本身，並沒有涉及國家主權。我們知道，在 *Permanent Neutrality* 一書中，除了一般中立國之外，R&L 特別提出了一種特別的中立：只有地域中立（*territorial neutrality*），而沒有主權中立，並強調它在國際法上也有地位。他們舉了 19-20 世紀以來國際上的許多例子，<sup>10</sup> 比較重大的案例則有盧森堡、比利時屬的剛果等，而在亞洲比較明顯的則有二戰時的澳門，還有葡屬東帝汶等。

總之，R&L 所討論的廣義中立，認為不一定需是主權國，也可以是地域中立。但卻都要有國際的承認，特別還要有武裝，否則即使有國際承認的主權中立國也無用，如在越戰時代的柬埔寨、寮國等宣稱中立，雖然得到某種國際承認，但因武力太弱，後來仍然被北越借道、又遭美國轟炸。所以呂、施等人也都特別強調武裝中立（*armed neutrality*）。但 R&L 這個說法，也有些問題。如是否一定要有國際承認？呂所強調的東亞南韓、台灣、菲律賓需要彼此肯定中立的可能，但施正鋒（2015）則存疑，另外還可參考早年海牙會議的 *Rules of War*。甚至，是否一定要武裝的中立，似乎都可以討論。後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二戰時的瑞士，這也是台灣許多嚮往中立的目標，包括呂秀蓮，所謂「東方的瑞士」。但瑞士在二戰時能夠逃過德國的侵略，根據 *Newille Wylie* 較新的研究與出土資料，其實武裝中立瑞士的計畫扮演的角色很小（即所謂的 *Reduit Strategy*），而且問題也很多，真正理由反而更在於瑞士積極與德國的互動與外交、經濟策略所致。一方面是德國當年希望吸引維琪法國（*Régime de Vichy*），故不好對中立國瑞士過於敵意，而後來則是瑞士也作了許多支持德國經濟、還有幫助德國與義大利二軸心國連結經濟動脈的作法。反之，即使如二戰時的丹麥，幾乎沒有武裝，但藉著外交與經濟政

---

<sup>10</sup> 但 R&L 所舉的例子中有不少例子，歷史通常很短、地域其實也都很小、或很快就被侵略等。見 R&L 在文集的第八章以及第九章 “*Taiwanese Neutrality*” 一章，特別是 pp.196-198。

策，在德國與英國等盟國間取得平衡，即使 1940 年四月被德軍佔領，失去國家主權，但德國仍允許丹麥保持中立與民主體制，讓政府照常運作，是所謂的 *neo-neutrality*。雖然後來 1943 年因為丹麥民間反抗，導致德國在丹麥進行戒嚴，但丹麥政府仍然勉強運作到 1945 德國戰敗為止。我們知道，丹麥也是歐洲二戰時期因戰爭致死人數最少的國家。<sup>11</sup>

R&L 進一步把他們的觀點，轉移來談「台灣的中立」(2020, ch.9)，並以台灣內部已經有社會運動(呂秀蓮)在推動為例。台灣雖不是聯合國的成員，但不是成員，中立國也可以扮演很大的國際角色，如 2002 以前的瑞士(之後加入聯合國)。R&L 談台灣的中立，強調台灣該儘量避免與中國爭執無解的主權問題，把主權議題藏起來，而以地域中立的角度來與中國進行協商。但 R&L 是否就認為台灣就乾脆放棄主權(無論是中華民國主權或某種台灣主權)，而宣稱成為一個中立的地域，他們則猶疑不定。<sup>12</sup>然而即使以「地域中立」為主軸，來與中國及美國協商，關鍵在於為何美國、中國會有興趣或同意。

這也是 R&L 一文採用一般歐美自由派政治立場的弱點。他們認為如果台灣中立，中國不會覺得不好，因為台灣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商業投資與連通，何況台灣還可以作為中國聯通歐美文化的窗口，成為一個中國的東方瑞士(p.202)。而美國也不會覺得有何不好，台灣仍然是美國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一員，不會讓中國以台灣作為太平洋的前進基地，也仍然會購買美國防禦性的武器，也不會影響到美日、美菲的關係。但是這樣子說，中國會接受

---

<sup>11</sup> 關於這裡提到二戰時期的瑞士與丹麥的中立，可以參考 *European Neutrals and Non-Belligeren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2) 書中 H.Kirchhoff 討論丹麥、特別是 N.Wylie 討論瑞士(“Switzerland: a neutral of distinction”)的兩篇論文。當然，因為俄烏戰爭開始，瑞士面臨美國方面的壓力，它也開始對俄國在瑞士約十分之一的資產作凍結，反之最近瑞士則有公民運動，企圖修改憲法，讓之更為中立，不可以進行對他國的經濟制裁、瑞士賣給他國的武器也不可轉運到烏克蘭等。參考 Scott Ritter’s “Why Swiss Neutrality is essenti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 *Scott Ritter Extra* (substack) 2023, Sep. 09.

<sup>12</sup> 事實上，R&L 認為，以台灣目前的狀況來說，不是聯合國成員，中國認為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美國則認為他對台灣有單向的、非條約約束的「台灣關係法」，台灣雖擁有武力，但幾乎無法與任何國家簽署軍事同盟，也沒有他國的軍事基地駐台，所以台灣目前這個現狀，幾乎已經是一個 *de-facto neutrality* (2020, p.182)。



嗎？固然台灣在大陸的投資是中國綁著台灣的一條線，但是讓台灣繼續維持美國圍堵中國的第一島鏈之一，這在東亞的地緣政治下，是有點太天真了。更何況為何中國就輕易地放棄把台灣作為進入太平洋的前進基地，如東台灣的花蓮港？以及還有這些年來為何中美一直糾纏爭吵美國賣武器給台灣的問題，中國一直認為美國違反了中美三公報等等。或許，這是為什麼受 R&L 影響的呂秀蓮，她的台灣中立國想法，雖然號稱說超越統獨，但卻仍然與過去的美政經利益關係如此接近的原因吧。

其實，R&L 似乎也沒有認真考慮到最近這幾年來，甚至更早，中國在北美以外的世界影響力已經大為增強，包括大量外銷電動車、太陽能電池、鋰電池等，所謂的「新三樣」。美金金融體系也越來越對中國不那麼重要。俄烏戰爭以來，中國俄國巴西印度南非等國所建構的金磚國家聯盟 BRICS，逐漸企圖建立起不同的世界金融體系，在南方國家中特別顯得重要，而其中人民幣將扮演重要角色。還有中國這幾年來在中東（如調和伊朗和沙特）、在俄烏戰爭與非洲、甚至在全球一帶一路上所發展的和平與建設角色等等。所以，R&L 所說的一個開放的中立台灣對中國的所謂好處，已經逐漸被中國自己做到、甚至超越了。當然這些不少都是 *Permanent Neutrality* 文集（2020）出版時或之後發生的事。更重要的，是 R&L 對東亞的地緣政治看法頗為奇怪。即使今天擁有三艘最新航母的中國海軍已經大肆發展，第一島鏈圍堵的重要性已經降低，但中國當然不會同意一個地域中立的台灣繼續扮演美國圍堵中國的角色，這還尚未談到台灣不斷付鉅款購買美國武器的問題呢。雖然以前鄧小平在談一國兩制時，<sup>13</sup>也曾同意台灣可以擁有一些武器，但是購置或自己研發自衛的武器可以到什麼程度呢？這才是關鍵。中國自然不會同意安插在美國第一島鏈中的台灣，購買美國武器或裝置來圍堵中國（如在建造潛艦方面，台灣近來在南北兩個海峽共規劃六個伏擊區，部署六艘潛艦，再加上訓練與維修兩艘共八艘，來對中國海軍進入太平洋造成阻礙<sup>14</sup>）。

---

<sup>13</sup> 從 1981 年 9 月 30 日的葉劍英〈關於大陸和台灣實行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到 1983 年 6 月 26 日鄧小平的〈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sup>14</sup> 可參考〈台灣為何需要更多海鯤號？柴電與核動力潛艦差在哪？QA 一次看〉（游凱翔，2023 年 11 月 3 日）。不論是否真的可行，從中央社電可以看出民進黨政府

更不用說，所有這些說法，R&L、呂秀蓮等都沒有從美國作為國際首席的好戰霸權帝國角度來看中立台灣的可欲性。<sup>15</sup>萬一台灣不再作美國第一島鏈的一員，美國會樂意台灣走向中立嗎？大肆經濟制裁外，美國這幾年其實繼續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圍堵，透過南韓、日本、台灣、甚至到菲律賓與南海，如美國對南韓軍事演習的推動，挑釁北韓，最終目標也在中國。<sup>16</sup> R&L 還說，如果中國接受一個地域中立的台灣——即使有武力而且與美國關係良好，那麼中國可以節省下許多應付一個不友善的台灣的負擔，財力物力都可以有更好的使用（呂也曾如此說）。問題是，中國為何要相信這個負擔可以解除？何況，大家都知道，小台灣後面還有一隻叫作美國的大禿鷹呢。反之，如果台灣與南韓成為更左傾的兩個中立國或中立領域，如之前在文在寅總統時期極力與北韓修好，且聯合質疑美國在東亞扮演的霸權，那倒是有可能與中國有更好的關係，甚至包括有國際靈活關係的越南與一些東南亞國家（詳後），而一種東亞中立的聯盟也更有可能。這種可能，與當初呂秀蓮、還有 R&L 的國際關係設想相反，走一條另類的歷史之路，但仍然有著在地緣政治上的東亞中立之夢。

最後筆者需要說明一下關於「中立國」思想的歷史傳承問題。固然，歐洲一次大戰前後，傳統帝國崩解後，在德法等強權下各小民族或多民族國家所產生的中立國傳統，有時甚至可作為冷戰時代大國的緩衝區（如奧地利與

---

努力配合、扈從美國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積極規劃。賴清德的 520 演說也傲然提到台灣在第一島鏈中的地位。

<sup>15</sup> 美國從立國以來，先是對國內少數族裔的各種侵略與種族滅絕，到後來成為殖民帝國後，從巴拿馬、菲律賓到二戰後對許多中小國家的侵略與征服，罄竹難書。例如參考人類學家 David Vine 的研究 *The US of War: a Global History of American's Endless Conflicts* (2020)。特別在蘇聯垮台後，美國對世界不少地方的各種好戰與侵略，更是變本加厲，加上多年來不斷大力軍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種族屠殺。台灣反戰運動的朋友、到國際左翼已經多所紀錄與批評，可謂汗牛充棟。可參考筆者〈國際左翼與反戰〉一文（2024）。

<sup>16</sup> 即使過去北韓金日成希望與南韓統一並成為中立國，還透過戈巴契夫的支持，於 1987 向美國提出，但美國自然完全理會。R&L 的 2020 文集第八章 “The Nomos of Neutrality in East Asia” 倒有提到北韓曾有的中立國之夢（p.179）。另外關於美國推動南韓的擴軍、對北韓施壓，以美國的核武來挑釁北韓等近年的紀錄，可參考 Simone Chun 在 *Truthout* 這一兩年的幾篇論文。根據 Simone Chun’s “Unprecedented US War Drills and Naval Deployments Raise Fear of War in Korea”, *Truthout* 2024, April 7 中的重要資料，近年來南韓的軍費是北韓的 30 倍之多！

瑞士)，與東亞在二戰之後乃至冷戰時代所形成的某種反殖民的不結盟或中立立場的國家，強調主權獨立，二者的歷史傳統頗有所不同，若皆以「中立」的概念來討論歐洲與東亞各國的中立乃至不結盟傳統，不無疑問。<sup>17</sup>但是，我們知道，R&L 等西方中立國研究學者、包括台灣的吳玉山政治學團隊，並不把這兩種歷史起源的中立國分開來討論，反而積極比較兩種歷史裡中立國家的各種情境，還包括後來冷戰結束時蘇聯解體後的中亞許多民族國家，以及東南亞寮國與柬埔寨的短期中立、北韓金日成的中立理想等。不同的歷史傳統並不妨礙彼此作有意義的比較，何況，即使在歐洲，一次大戰所造成的中立情況，也只是中立國的一部份，它不能涵蓋北歐與瑞士等更悠久的中立傳統。回顧本文所經營的方向裡，中立與不結盟倒常成為姊妹般的相關概念。固然包含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東亞中立（往往混合了不結盟理想），往往以獨立主權為重點，但卻常會遺忘他們殖民時代中一些無主權的地域中立，如前面提過二戰時期的澳門與葡屬東帝汶等。所以從國際法到廣義歐亞的歷史來說，無主權的中立模型仍然是中立論述裡的一個選項。而臺灣當代的特殊地緣政治與歷史環境，雖然已非殖民地，而且還宣稱有中華民國主權，可能倒還頗適合這種考慮的，這也是 R&L（2020）所探索的大方向。甚至，還有其他東亞的地域也有類似的可能，例如沖繩的主權爭議與二戰後美日殖民的後續。另外也可以考慮幾年前香港反送中爭議時，抗爭派與其驟然提出親美自由派的民主與獨立，若能思考出更平衡中美兩大國的無主權中立區構想，這與原本的一國兩制不盡相同，或許後來情況會相當不一樣。

### 參、一個左翼「中立台灣」的兩種可能與討論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看到，雖然 R&L 還有呂秀蓮的中立台灣說都頗有問題，但並不表示中立這個基本進路就無法再前進。事實上，有著更好、更重要的中立台灣的方向。我們先談一下這方向的大背景。

---

<sup>17</sup> 筆者感謝王智明對本文所提出的這個重要的提問。

首先，就台灣今天的大環境而言，一個模糊而中立的大方向仍然有其可信度，這也是我們 2023 台灣反戰聲明<sup>18</sup>第三條論點（「台灣要自主並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的後續發揮。再者，2024 總統與國會大選，民進黨已經失去了其台灣人民的多數支持。台灣現在可以有更多的準備，進行在「一個中國」或「一個中華」的模糊框架下與中國（或說大陸）來討論與協商兩岸的未來走向，當然也包括與美國相關人士來討論。但是如果討論的範圍馬上朝向統一、或者甚至「一國兩制」，在台灣目前的民意下並不有利，接受度不會很高。反而一個「中立台灣」的大方向比較不會遭受強烈質疑。<sup>19</sup>台灣海峽兩岸的未來走向究竟如何，雖然我們同情來自「中華民族」（如最近馬習二會中習近平所說的）的召喚與歷史情感，但是台灣的一般民意仍然很重要，大陸方面不宜以強制性的批評甚至各種壓力來強求乃至刺激台灣人民的感情。若是如此不斷的強制壓力，即使有一天大陸真的強力統一台灣，可能的漫天戰火與破壞暫且不提，台灣也將是一個很難統治、無法長治久安、處處容易有隱形抗爭或不合作的地方，如此，台灣作為一個統一選項，恐怕對大陸的吸引力也將大減。所以，即使萬一台灣未來終究會以某種方式與大陸統一，一個某種形式的「中立台灣」也會是統一之前最好的準備與過渡。中共對香港過去的「50 年不變」承諾固然也是一種過渡，但目前因為修例／反送中的動亂事件已經導致台灣民眾對之失去信心，固然這可以再討論，但 50 年不變畢竟也是個消極的過渡，缺乏積極的意義，不如「中立台灣」可以提供的積極性可能。

再者，一個中立台灣，無論是中立國或中立的區域，在當今國際乃至國際法中完全沒有過時，如前面 R&L 之所強調。同時，因為新冷戰在近年來的崛起，在東亞，無論是共產的北韓（如金日成在 1987 年向南韓與美國提

---

<sup>18</sup> 請參考我們 2023 反戰工作小組（傅大為、盧倩儀、馮建三、郭力昕）的粉絲頁中的反戰聲明、前後共幾波的連署人（約八九十人）、與後續言論，見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90324198215>

<sup>19</sup> 反之，如果我們比較「保持現狀」形式的 *de-facto neutrality*（見註 12）與傾向獨立主權的兩個選項，並以 2018 台灣奧運正名公投（以過去的中華台北 VS. 改為台灣之名來參加）為例，結果是 55% 比 45%，奧運正名公投未過，人民反而比較接受「保持現狀的實際中立」，見 R&L (2020, p.196)。

出中立)、乃至自由派的台灣政治人士,過去都有某種「中立」的呼聲。台灣近年來,在中美兩大國博奕之間,在究竟是親美還是和中的選擇與意識形態的鬥爭上,其所經歷的國際與島內情況,與過去冷戰時期的中小國的情形其實很像。若我們把視野更擴大到東南亞乃至於其國協組織 ASEAN,這個情況更明顯,從中國的崛起到中美的大國博奕,東南亞許多國家也更傾向某種形式的中立,至少是等距外交。他們大多已經厭倦於美國「民主對抗極權」這種從越戰以來的老套與虛偽,紛紛企圖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單極霸權結束後的一個多極的世界中,積極建構多重多方的國際政經關係,故不同於過去不結盟國家比較靜態與被動的情況。何況國協成員在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也讓他們更有國際信心,在 1990 年,東南亞國協成員在世界 40 大經濟體中僅佔兩位,2020 年則有 6 位。<sup>20</sup> 而中小型國家面對大國的政策模型,若根據政治學者吳玉山的說法,<sup>21</sup>過去有「扈從」(bandwagoning)、「避險」、「抗衡」、乃至「中立」等幾種,吳認為馬英九時代的八年是「對美扈從、對中避險」,到蔡英文時代是「對美扈從、對中抗衡」。雖然在政黨輪替時有對中國/大陸政策上的擺盪,但兩大黨對美國則都是採取扈從的作法,也都是純粹自由派現實主義的計算,而沒有對美國的國際帝國行徑作理想主義式的批評,也完全沒有考慮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立場同步。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也深受美國霸權「抗中、圍堵」意識形態的影響,所以都沒有認真考慮某種「中立」的第三條路線。

這裡筆者也需要同時說明,本文這裡說的左翼「中立台灣」觀點,不是某種左獨、或左翼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我們強調國際正義、批判歐美歷史

---

<sup>20</sup> 即使是美國著名的保守外交期刊 *Foreign Affairs* 在 2023, May/June (102.3) 中也有關於國際中立的專輯,包括了澳洲學者 Le Thu's "How to Survive a Great-Power Competition", 巴西學者 Matias Spektor's "In Defense of the Fence Sitters" 等論文。但也有如 Richard Fontaine's "The Myth of Neutrality" (July/12), 後者一文相當偏頗,只提到美國不斷對中立搖擺國作各種施壓,讓一些國家紛紛低頭。這是美國所希望看到的中立神話破滅。

<sup>21</sup> 本文一開頭就略加解釋過這幾樣選項。見吳玉山〈兩強間中小國的抉擇：一個理論的視角〉收於吳玉山、楊三億(2019)所編的文集, *ibid.* 在該文集中,李俊毅、孫國祥都已經開始認真討論歐洲的中立國經驗,本文前面也都有引。在文集的十個個案研究中,中立國的研究佔了兩個。另外也可參考馬英九口述、蕭旭岑的《八年執政回憶錄》(2018),特別是第四章。

以來的帝國主義、強調台灣乃至大陸人民的福祉、和平與未來幸福，但也認識到海峽兩岸的歷史與國際權力的現實，而不能只從傳統的台灣民族情感或民族主義的路子來思考問題。說到情感，我們這一兩代的台灣公民與知識分子，哪一位沒有受到近代台灣文化洗禮的深刻情感？但同時，我們也傳承了延續不斷的中國歷史與兩岸人民的情感，所以筆者不願意在這兩種其實很相關的情感中作選擇，也不會把它們作為兩岸政治外交思考的唯一基礎。所以，更基於歷史、現實、與國際正義，筆者傾向在大方向上，同意「一個中國」甚至某種九二共識的基本架構。<sup>22</sup>但同時，一個左翼的「中立台灣」，又與台灣一些知識分子所說兩岸的「大屋頂」、或說「大中國邦聯」（confederation）的關係為何？本文最後會再回到這個比較的問題來。

現在我們從一個左翼立場下來考慮兩種中立台灣的情形，第一種是有主權的中立台灣，第二種是沒有主權的。當然，本文這裡說的「考慮」，不是閉門造車，而自然是一種提議與倡議，希望在未來可能的兩岸（包括美國）協商乃至台灣公投中，能夠與立場接近的其他意見聯合，形成一種具競爭性的觀點與意見。

（一）首先是有主權的中立台灣。這種中立的形式，在台灣內部會引起的反對大概較小，但是仍然要取得東亞相關的國際承認，包括日韓菲越以及中美兩大國。一個左翼的中立台灣，當然就要拋棄作為美國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一個鏈節，不再服從美國命令圍堵中國，或作為美國棋子來挑釁中國、來抗中，更不參加軍事聯盟，但同時台灣也不提供外國任何海空軍基地。美國當然就會不高興，但如果這個立場是由台灣與中國和平協商討論出來的，那麼根據美國的台灣關係法，讓兩岸和平協商未來，美國在表面上似乎就沒有太多反對的理由。<sup>23</sup>同時，如果台灣仍然與美保持貿易友好關係（包括需要與中美三方協商的台灣晶片國際供應鏈等），甚至仍向美購買有限度的自

---

<sup>22</sup> 從 2023 發起反戰以來，筆者對當代中國的一些思考，可參考筆者〈國際左翼與反戰〉（2024）一文。

<sup>23</sup> 當然，仍然可以預期，美國在台灣的各种利益者、在台的一些美國右派基金會的代理人、還有許多右派在地協力者的強力反制與抹紅。另外，美國之前的不高興，也反映在前面提到美國官方對幾年前呂秀蓮訪美的冷淡與沉默——即使是個如此親美且疑中的呂秀蓮。

衛武器（台灣同時當然也可以向中國購買自衛武器），<sup>24</sup>並保持台灣海峽的貿易暢通，讓日本也沒有太多的反對理由。同時這樣一個中立的台灣，可能也會對朝鮮半島造成改變的刺激也說不定。

其次，這個選項的主要問題，自然是中國。中國為什麼要答應？如此是否就否定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且承認中華民國有主權？——即使這樣台灣對中國有下列的好處：這是個親善中國、懷疑美國霸權的左翼中立台灣，它不再當作美國挑釁中國的棋子、不會充當美國的戰爭代理人，且同時是個與中國有大量的貿易、民間與政府多方交流的中立台灣。<sup>25</sup>而台灣的內部當然仍然保持更理想的、排除充斥美國惡性影響的民主與資本主義制度，<sup>26</sup>且媒體自然不再如過去一味地親美或舔美，抹黑與唱衰中國，而需要有更真正中立的媒體環境，能夠逐漸認識、瞭解、乃至同情中國。甚至，中立台灣可以積極地在中美雙方，甚至中日、中菲、乃至兩韓之間促成緊張情勢的降溫與國際和平的倡議。近年來東南亞國協特別有中立色彩的印尼、越南、新加坡等，積極扮演東亞和平乃至在國際大國間的等距平衡角色，有相當的發展，如 2022 印尼主持的 G-20 會議、新加坡每年舉辦的香格里拉防長會議等，都是一個中立台灣可以發展的方向。<sup>27</sup>所以，參考 ASEAN 近年來的作為，這是

---

<sup>24</sup> 中立國所謂的「武裝中立」，並不是個很強的論點，可見前面第二節討論瑞士武裝中立、丹麥無武裝中立等案例。與呂秀蓮所強調的「武裝中立」不同，更早張俊宏在《和平：中立的台灣》（2011）一書中，乾脆斧底抽薪，宣稱「和平民主，固然可稱為小國的重要國防，而主動解除軍備宣布永久中立，更屬貫徹和平民主，進一步的國防」（頁 265）

<sup>25</sup> 2023 年 10 月，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的有趣觀點，也可參考：「在這個中美大國競爭的年代，台灣應該試圖讓自己對中國來說具有價值。不論中國的未來變成什麼樣，台灣一定都會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就像是花園中一株美麗的植物，造訪這座花園的訪客都是為了這株植物，沒有了它，花園就不完整。」（辜樹仁，2023 年 10 月 26 日）。

<sup>26</sup> 在中立台灣的視野下，什麼是「民主」，當然需要再深入的思考，而非當今以美國霸權為首的所謂「民主」——它其實是個對外充滿暴力，對內充滿壓迫、歧視、選舉根本被大財團與媒體操縱的惡質資本主義制度，更需要徹底檢討美國所謂的民主國家 VS 獨裁國家的虛偽意識形態。這一切，從越戰以來，如杭士基（Noam Chomsky）等人所開闢的國際左翼路子，已經多所論述。這一切，也常為強調中立的南方國家知識分子所熟悉，參考前註 20 所提到的 Matias Spektor's "In Defense of the Fence Sitters", *Foreign Affairs* (2023, 102.3).

<sup>27</sup> 可參考前註 20 所引的 Le Thu's "How to Survive a Great-Power Competition"。

中立台灣完全沒有過時的好例證。但是如果，如上述說的好處，中國仍然不答應，那麼至少還有一個折衷的作法，就是一個有主權的中立中華民國，成為一個大中國邦聯系統中的一員，並增加一些對一般主權國的限制。<sup>28</sup>當然，所有這些，都需要台灣與大陸透過多方面的協商與討論來進行與具體化，並且同時也需要得到美國的瞭解。

(二) 如果上述的「有主權的中立台灣」選項，即使在台灣的阻力較小，但卻與中國、美國的協商不成，第二個可能，就是順著前面 R&L 所提的一個具有歷史與國際法意義的「沒有主權的地域中立」之作法，來考慮一個沒有主權的中立台灣區域，而主權理論上在中國本身。<sup>29</sup>這第二個選項，如何在台灣能夠取得多數的贊同，自然比第一個選項困難的多。與其放棄中華民國的主權，很多人大概寧願接受所謂的「保持現狀」。而如果中華民國放棄主權，台灣人民如何能夠信任中共，不會併吞台灣——即使吞下來的台灣會是個很難治理、充滿不合作的島嶼？這點前面已提過。這自然會是個很大的協商問題。在這裡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或許可以發揮點作用？同時，這裡也非常需要中國大陸如何能夠努力做到贏回台灣人民的信心。<sup>30</sup>但反之，美國可能很不樂見到一個放棄主權的中立台灣區域，因違反了美國的東亞利益——如圍堵的軍火貿易、棋子、代理人等，所以這時也可能不願再負起任何《台灣關係法》的義務。除非，當中美關係緊張到極高點時，或許台灣的走向與選擇會起一些作用，改變中美利益關係的傳統計算，例如，一個中立的台灣區域，並不等於就是統一台灣。台灣固然不再是美國太平洋的第一島鏈

---

<sup>28</sup> 前一節所談 H&L 的 Pascal Lottaz，在他所主持的 Neutrality Studies 網站，2023 年九月曾對中立台灣以及中華民國參與大中國邦聯的議題訪問了 David Pyne：  
Taiwan Will Be The Next Ukraine. A Compromise Is Needed To Stop Neocon Escalation.

<sup>29</sup> 前面提過，R&L 提到地域中立的台灣，要隱藏起主權的難解問題，所以 R&L 對地域中立的台灣是否就放棄主權，或起碼逐步放棄，猶疑不定。目前我們為了論述清晰，就暫時以「理論上放棄主權」來討論。

<sup>30</sup> 其實，從鄧小平時代的「一國兩制」構想開始，我們可以一條一條的搜尋文字，累積起來以顯示中共過去對台灣所有的善意、耐心、甚至大國的讓步，中共都需要認真對待過去的這些善意，重新思考贏回台灣信心的策略，並克服大陸一些強調中國民族主義的年輕人對台灣的缺乏善意——如在《中國可以說不》(1996) 等暢銷書中所顯示的，而非只是文攻武嚇的傳統父權國家的作法。筆者過去分別在兩次演講中討論過這個議題。



之一，但同時也不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不沉航空母艦。更何況，美國仍然有一些知識分子與國際左翼，反對中美博奕、真正尊重台灣未來自己的走向的。

當然一個中立的台灣區域，其實有點類似過去鄧小平以來倡議的一國兩制，只是其中的一制為一個在政治上中立的台灣區域。這個中立區，或說中立的特別行政區，一方面仍然要有起碼的自衛武力（前面註腳 13 在一國兩制提法中 1981 年葉劍英九點提議中也曾提過），但不參加中國未來可能進行的國際衝突，還有基本的法律自主權。也因為中立，所以台灣區的外交方向也該有相當的自主性（但應該不能與中國外交方向衝突），並積極來促進東亞的和平與中立，另一方面中國仍然不應在台灣設立海空軍基地，或未經許可進入台灣的領海領空。但不論如何，目前第二個選項應該就解決了一個中國的國家主權問題。

而在其他方面，似乎前面說的「有主權的中立台灣」的各種運作細節，如對內的民主選舉與生活方式（包括媒體與言論自由）、對外的生產貿易，仍然都可以維持。特別是一個在中國裡的中立區，台灣可以扮演促進東亞和平的角色，如與台灣有相當歷史關係的日本與美國，甚至也可以當作中國對歐美的一個文化上的窗口，台灣有其相當的文化傳統。而在一些關鍵生產上的國際供應鏈，<sup>31</sup>自然需要更多的協商，而且不再依照美國的利益來行事。這當然不是個簡單的問題，也需要靠中國科技的再突破，才可以讓台灣例如在晶片供應鏈上不被美國拉著走。當然在這個選項上，大陸與台灣的各種媒體與訊息、文化教育、政治意識形態，都會有更多的交流與互通，讓台灣人對大陸有更多的理解與同情，破除過去的偏見與扭曲的美日資訊影響。同時，仍然一定要在台灣中立區內，保持一個非主權形式的文化與社會的自主性。在這裡，台灣一些進步的公民社會與民間團體，就該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近年來香港的動亂經驗，就需要台灣與大陸共同來學習與檢討，而要避免過去的錯誤與資訊扭曲。到了最後，是否這個非主權的中立台灣區會一直繼續下去，則要看未來大陸與台灣本身的發展而定，如果中立台灣區能夠順利發展，最後台灣與中國的統一，倒是有可能的。

---

<sup>31</sup> 如最近荷蘭 ASML 公司宣稱他們在台灣台積電的光刻機可以遙控停機的狠話，來警告所謂中國的野心。

## 肆、其他可能的比較與結語

上一節提到筆者接受某種 92 共識的基本架構，但這並非表示這個架構本身沒有不少的缺點。「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或「兩岸不承認對方主權、但承認彼此治權」等，固然是個基本的架構，但就如兩岸多年來「保持現狀」是個壞的選項，<sup>32</sup> 92 共識也不該保持現狀，而該更積極地提出一些兩岸協商或繼續往前與大陸同行的路子，而非只是與大陸協商如何再進口台灣的農產品或鼓吹陸客來台旅遊等邊際事項。過去馬英九八年執政時處理大陸及美國的關係，固然是近年來台灣在外交政策上比較穩定和平的一段時間，但從我們談反戰、追求左翼台灣中立的立場而言，如前面提到的小國政治模型，馬政府基本上走的仍然是個對美扈從、對中則是扈從與抗衡的混合策略（即避險）的路子，仍然是個接受歐美自由派（或新自由主義）全球政治基本架構的視野，沒有真正看到美國霸權與其在全球的帝國行徑，或即使意識到也不予理會。<sup>33</sup>

因為有「和中」基本政策的平衡，所以馬政府過去面對美國時，要比蔡英文政府的一面倒多了些尊嚴與思考，但是國民黨從過去到今天一味的「親美」，仍然很可能在未來中美大國博弈中被犧牲掉，如過去美國在聯合國放棄台灣、後來又片面與中華民國斷交，甚至到今天台灣常成為美國博弈的棋子、被迫放在東亞的烏克蘭的位子，平日只能在拜登多次發言中尋章摘句找「會以武力支持台灣」的有利片段、計算他一共說了幾次等。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也只能趕去美國參加「口試」，但卻不敢同時與大陸認真溝通。所以，筆者覺得，中華民國一定得從 92 共識的架構往前推動，特別是更徹底而深

---

<sup>32</sup> 參考前面提到的新加坡楊榮文 2023 九月〈「時間不在台灣這一邊」 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兩岸談判寧早勿晚〉（崔慈悌，2023 年 9 月 14 日）的看法。另外，馮建三最近的大書《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2024，頁 376-382），特別批評了台灣在討論兩岸問題時，常把統獨、還有保持現狀三者當作一個基本架構，問卷調查時也是如此架構，卻完全沒有把「兩岸協商」當作第四種選項。然後馮建三仔細分析了四點「何以我國不主動並積極提出對自己有利、同時也有利北京的兩岸政治關係模式？」的原因。十分精彩。

<sup>33</sup> 承前提到的馬英九口述、蕭旭岑的《八年執政回憶錄》（2018）。

入地來重整我們與大陸、美國的關係，思考台灣在 21 世紀東亞乃至世界的位子，走出一條突破保持現狀的路，而非只是去促成台灣在許多小地方「被世界看到」。

再說一下從 92 共識往前推動的另一條常被提起的路子，即與大陸形成一個邦聯制的關係，既是同屬一個大中國，也是一個有主權的中華民國。從過去到現在，有不少知識分子為文談到這個好作法。<sup>34</sup>但是，也許這中國邦聯，對美國比較容易接受一點，而為什麼中國要接受呢？除非這個邦聯制對當代中國乃至中共有明白且可保證的利益，不然一個除了善意、但沒有太多內容的邦聯制，有時聽起來倒有點像一個「保持現狀」的象徵替代品。畢竟，一般邦聯制的說法裡，並沒有對美國做為一個世界與東亞的霸權，有什麼實質的看法與批評，而對東亞的地緣政治，也不清楚有何具體的分析與作法，如對西太平洋美國關鍵的第一島鏈議題。當然另外還有邦聯制裡的軍火、經濟、外交與法律等問題，其實都需要有個大略的想法，而統合這些國政想法的基本原則為何？在這裡，我們不能只停留在一個有決心、有耐心、有信心來和中國好好協商的這個態度或意志的層次，而需要有更具體的想法與原則。上一節筆者提到，在一個大中國的邦聯框架裡，一個左翼而中立的中華民國，或許比較能夠讓中共或中國大陸接受？如前所述。但若是如此，即使在邦聯制的架構裡，我們仍然需要回到一個中立台灣的基本議題來。<sup>35</sup>

末了一點結語。本文這個從中立到中立台灣的兩岸三邊的方案（第三邊指美國）：從過去台灣呂秀蓮推動中立台灣的背景開始，到討論與批評 **Reginbogin & Lottaz** 對中立還有中立台灣的看法，然後開始提出一個左翼中立台灣的兩種可能，最後再進行一點與其他可能立場或方案的比較。雖然在許多地方這個討論仍然十分簡略粗糙，但筆者希望一個中立方案的基本方向

---

<sup>34</sup> 最近一個深入的思考，可參考馮建三的《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ibid.)，特別是其第六章的後半部，展示了豐富的資料與照顧全局的懇談，頗值得參考。另外最近一個從很不同的角度來思考的短文，可參考徐錚(如果中國提出奧林匹克模式)(2024年5月)，並建議「一個台灣」，各自表述。

<sup>35</sup> 可參考筆者一個稍早提及中立台灣與邦聯制的一個訪談(2023, July)，由美國左翼和平運動的 **VFP (Veterans for Peace)** 訪談筆者談台灣近來的兩岸三地(含美國)的關係。參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kdaeMUiC2Y&t=47s>。

是清晰的。當然，這篇文字的立論，主要是從政治社會與歷史的角度來討論，但卻無法涵蓋當今世界的經濟與金融問題。一個左翼的中立台灣方案，也需要包括從更基進的國際主義視野來討論當今世界新帝國主義、全球化的金融資本主義（Financialized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並從此來檢討為何過去冷戰時代不結盟國家政策挫敗的原因，並尋求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Yanis Varoufakis 關於一個新的不結盟運動的論點，<sup>36</sup>或許是個不錯的出發點，而在此，一個左翼的中立台灣觀點，如何能夠與之對話或互相交流？

台灣過去不少人對北歐的社會福利政策感到嚮往、希望學習，但是我們需要瞭解，北歐諸國之所以在過去能夠在歐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強國相鄰，卻能夠堅持某種社會福利制度，正是與北歐諸國有長遠的中立思想與政策傳統有密切的關係。再者，過去台灣也不少人嚮往台灣成為一個東方中立的瑞士，但中立瑞士是在什麼歷史與社會條件下才成為可能？也正是我們需要多瞭解的。

## 參考書目

- 2023 台灣反戰工作小組(2023 年 3 月 21 日)。「台灣反戰聲明」。**【動態更新】**。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90324198215
- 吳玉山、楊三億編(2019)。《中小型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奇果創新國際。
- 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1996)。《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 林朝億(2019 年 3 月 4 日)。「呂秀蓮推和平公投 消除台灣與他國合作抗中的憂慮」，《Newtalk 新聞》。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3-04/214756
- 施正鋒(2015)。「中立國的概念，理論，以及實務」。《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1(3): 1-22。
- 徐錚(2024 年 5 月 30 日)。「如果中國提出奧林匹克模式」，《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02672

---

<sup>36</sup> DiEM25 Communications. (2023, January 27). Yanis Varoufakis' speech in Cuba on a new non-aligned movement: Because we must!  
https://diem25.org/yanis-varoufakis-speech-cuba-new-non-aligned-movement-because-must/

- 張俊宏 (2011)。《和平：中立的台灣》。台灣書局。
- 崔慈悌 (2023 年 9 月 14 日)。〈「時間不在台灣這一邊」 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兩岸談判寧早勿晚〉，《CTWANT》。<https://www.ctwant.com/article/283616>
- 傅大為 (2024)。〈國際左翼與反戰〉，《思想》，49: 229-242。
- 游凱翔 (2023 年 11 月 3 日)。〈台灣為何需要更多海鯤號？柴電與核動力潛艦差在哪？QA 一次看〉，《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311030060.aspx>
- 湯紹成 (2010)。〈奧地利的中立地位及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28(1): 89-137。
- 馮建三 (2024)。《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聯經。
- 鄧小平 (199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 辜樹仁 (2023 年 10 月 26 日)。〈專訪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搞好兩岸關係 東協就是台灣的天下〉，《聯合新聞網／天下雜誌》。  
<https://udn.com/news/story/6841/7528369>
- 蕭旭岑 (2018)。《八年執政回憶錄 (馬英九口述)》。天下。
- Chun, S. (2024, April 7). Unprecedented US war drills and naval deployments raise fear of war in Korea. *Truthout*.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unprecedented-us-war-drills-and-naval-deployments-raise-fear-of-war-in-korea/>
- DiEM25 Communications. (2023, January 27). Yonis Varoufakis' speech in Cuba on a new non-aligned movement: Because we must!  
<https://diem25.org/yonis-varoufakis-speech-cuba-new-non-aligned-movement-because-must/>
- Fontaine, R. (2023, July 12). The myth of neutrality.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myth-of-neutrality-choose-between-america-china>
- Huong, L. T. (2023). How to survive a great-power competition: Southeast Asia's precarious balancing act. *Foreign Affairs*, 1(2), 30-35.
- Reginbogin, H., & Lottaz, P. (Eds.). (2019). *Notions of neutralities*. Lexington Books.
- Reginbogin, H., & Lottaz, P. (Eds.). (2020). *Permanent neutrality: A model for peace, security, and justice*. Lexington Books.
- Ritter, S. (2023, September 9). Why Swiss neutrality is essenti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Scott Ritter Extra (Substack)*.  
<https://scottritter.substack.com/p/why-swiss-neutrality-is-essential>
- Spektor, M. (2023, April 18). In defense of the fence sitters. *Foreign Affairs*, 102, 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global-south-defense-fence-sitters>
- Vine, D. (2021). *The United States of war: a global history of America's endless conflicts, from Columbus to the Islamic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ylie, N. (Ed.). (2002). *European neutrals and non-belligeren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om Neutrality to Neutrality Taiwan: A Left-wing Proposal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Daiwie Fu

###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proposals concerning how to go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debates of unification vs. independence in Taiwan, but one potentially very important alternative was often ignored. Former Vice-President Lu Hsiu-lien had organized a movement of neutral Taiwan but stopped half-way, western neutrality scholars had analyzed neutrality historically and applied it to Taiwan, but left many problems unsolved. Based on three kinds of neutrality studies in the pas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construct a perspective of left-wing Taiwan neutrality: former neutrality studies on European neutral states after WWII,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neutral and non-aligned developments in South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eft-wing studies on the imperial hegemony of America and its containment strategy against China in Pacific's first islands chains. This article frames an argument of Taiwan's left-wing neutralit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a distinction between neutrality with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neutrality without sovereignty. Thus it consider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se two kinds of neutrality for Taiwan. By virtue of this distinction plus a left-w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claims that it has solved problems left by neutrality scholars and also provides a balanced platform to evaluate how PRC and US, the two great powers of Taiwan's cross-strait, would respond to and negotiate a proposal of left-wing Neutrality Taiwan. This article concludes by separating this neutrality position from other positions concerning cross-strait problems: left-wing independence of Taiwan, One-China policy as conceived by Taiwan's KMT, and the confederation proposal (of one big China) containing China, Taiwan, and may be more. The left-wing neutrality position of this article especially urges the confederation proposal going forward to dialogue and to connect with neutrality Taiwan in order to forge a unified position in the future negoti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Key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Lu Hsiu-lien, neutral country, left-wing, Switzerland of the East, Taiwan neutrality, territorial neutrality

---

\* Daiwie Fu, National Yang-Ming Chao-Tong University, Emeritus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Email: dwfu@mx.nthu.edu.tw

## 不只是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 一個實踐典範

羅世宏\*

書 名：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  
作 者：馮建三  
出版日期：2024 年  
出 版 社：聯經

### 本文引用格式

羅世宏（2024）。〈不只是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一個實踐典範〉。《傳播、文化與政治》，19:121-127。

---

投稿日期：2024 年 6 月 10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6 月 30 日。

\* 作者羅世宏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教授，e-mail: shihung.lo@gmail.com。

馮建三教授的新著——《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他鎔鑄在這本書裡的思想與行動典範，讓人不禁聯想到著名社會學家 C. Wright Mills 和語言學家 Noam Chomsky，因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不僅展現卓越的學術稟賦，更重要的是，他們都秉持著深刻與真誠的批判精神，勇敢地對社會不公、集體緘默或共謀，以及權力濫用發出異議。

Mills 在其名著《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中揭示了美國社會中少數權力集團如何掌控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的真相，並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要揭露和挑戰這種不平等結構。馮建三與 Mills 在知識關懷與社會行動上相近之處很多，例如他們同樣對古巴有同情的理解，對美國帝國主義直言批判，對中國與世界有所關懷，篤信和平反戰與兼愛共好的價值。

Chomsky 在多部著作中批判美國政府和媒體的合作關係，揭露許多被刻意隱瞞的事實和真相。他們的著作深刻地啟發著後起的學術人和社運者，也激勵著無數人對既有權力結構提出質疑。同樣地，馮建三教授在《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中也展現同樣的批判精神和公共知識分子使命。他不僅透過學術研究揭示了台灣、兩岸和美國之間複雜的媒體關係，更勇敢地對權力和資本對媒體的控制提出批判。這一觀點與 Chomsky 對美國媒體的批判不謀而合。

馮建三教授、C. Wright Mills 和 Noam Chomsky 的共鳴不僅在於他們的學術成就，更在於他們對社會責任的堅持和對真相的追求。他們不僅是學術領域的佼佼者，更是具有深刻社會責任感的公共知識分子。這種批判精神和公共關懷，使得他們的著作不僅僅是學術作品，更是激勵人們反思和行動的思想火炬。馮教授的這部著作，無疑是對這一傳統的延續和發展，為當前複雜多變的傳媒環境提供了重要的洞見和啟示。希望更多的學者和知識分子能夠從中獲得啟發，繼續致力於揭露真相和推動社會進步。

作為一位在台灣傳播學界與媒體改革運動的先驅學者，馮教授在本書中運用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和實證材料，深入探討公共服務媒介、兩岸新聞傳播及中美關係裡的傳媒作用。這部著作不僅拓展了讀者對這些議題的認識，更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對相關領域的研究和實踐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本書共七章，涵蓋新聞傳播的基本理論、公共媒體的發展、假新聞的挑戰、台灣報業的兩岸新聞分析、市場社會主義與傳媒經濟、不同歷史時期的殖民與冷戰影響，以及作者的學術研究歷程等多方面內容。馮教授以豐富的學術背景和扎實的實證研究，為讀者提供全面且深刻的視角，有助於理解中國大陸、台灣與美國之間錯綜複雜的傳媒地景、權力關係，以及各自與共同面臨的挑戰。

首先，本書在探討公共服務媒介（**public service media, PSM**）方面展現了作者的理論功底和國際視野。透過對歐美和中國等多國公共服務媒介體制的比較分析，馮教授指出，**PSM**的發展模式雖然各有不同，但其核心理念是服務公共利益、維持新聞的獨立性和多樣性。在台灣，公共媒體面臨資金和政治壓力等多重挑戰，但馮教授強調，只有壯大公共服務媒介，才能有效應對假新聞和不實資訊的衝擊，維護媒體的公信力和社會的民主品質。

書中指出，「**PSM**的模式也有許多種，各自烙印其歷史條件的胎記，面對當代資本壓力，各國**PSM**的奮進成果，亦見差別」（頁24）。此一觀點強調**PSM**在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多樣性和適應性，並且認為台灣在借鑒他國經驗的同時，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本土化的改革和創新。

馮教授在書中對中國傳媒改革亦著墨不少。他詳述中國傳媒在市場化進程中的種種變革，並探討這些變革對傳媒生態和新聞自由的深遠影響。例如，他提到：「中國各層級的廣播與電視機構，與世界各國的**PSM**，至少有兩個共同點」（頁24）。這兩點包括產權都不是私人所有，以及傳統公共服務廣電（**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SB**）已與時俱進蛻變成公共服務媒體（**PSM**）。

書中的第二部分專注於兩岸新聞傳播的研究，尤其是對《聯合報》在兩岸新聞報導中的角色和影響的分析。馮教授以詳實的歷史資料和數據，展示《聯合報》在不同時期的立場變化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他提出，台灣媒體在兩岸議題上的報導，往往受到政經利益驅動，需要更多獨立和多元的聲音來平衡這種偏頗。此一觀點對當前兩岸新聞報導現狀是重要的提醒，點出台灣媒體應該肩負的公共服務責任。

對於美國媒體和中美關係的探討，馮教授同樣給予了高度關注。他指出，美國媒體在報導中國和台灣問題時，往往存在刻板印象和偏見，這不僅影響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認識，也對中美關係產生負面影響。馮教授呼籲媒體應秉持更為不偏不倚、實事求是的態度，促進兩國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合作。本書第三章對「假新聞」問題有所探討，指出其對新聞自由和公共信任的侵蝕作用巨大。有效藥方的求索，他指出，「已有國際組織，認定 PSM 是矯正『假新聞、不實資訊』的一帖良方；PSM 愈是壯大，也就愈是能夠舒緩不實資訊對人心與民主的騷擾。」（頁 13）。此一觀點指出了 PSM 在防制「假新聞」方面的「預防」作用，應優於「事後補救」的事實查核。

本書在公共服務媒體與中國傳媒改革方面的論述，反映著作者的真誠期許，但也如作者坦言的，可能招來「緣木求魚」之譏。的確，本書相關論證具有很高的價值，但在一些細節上也存在可以商榷之處。例如，作者在探討中國傳媒改革時，雖然強調了市場化的暗面，以及「市場化不足」不應成為中國傳媒改革的論述框架，但對於中國政府在傳媒控制方面的具體措施和效果，論述稍顯簡略。再者，中國各層級的廣播與電視機構雖然與世界各國公共媒體有相通之處，但同樣有很多大不相同之處。比方說，中國的公共傳媒與台灣或英國的公共傳媒顯然有別，蓋因此公共非彼公共也：強調與政府和市場保持一臂之遙、具有來自公眾和反對黨制度性監督的英國 BBC 和台灣公共電視，與聲稱屬於「全民所有制」，但制度上不具任何獨立性與公共問責性，甚至經常淪為共黨喉舌的中國廣電機構，豈可混為一談、等量齊觀？

其次，作者若能夠進一步深入剖析中國傳媒政策的內在邏輯和實際操作，將更有助於讀者全面理解中國傳媒的複雜現狀。比方說，作者在書中簡略提及（頁 273）：「無論是社會主義，或是冠上市場而成為市場社會主義，若是沒有合理的政治及表意自由，就不宜稱之為社會主義。」惟「合理的政治及表意自由」在中國脈絡下如何可能實現？或者，在「合理的政治及表意自由」成為現實之前，中國式的「市場社會主義」或朝向「公共服務媒體」的中國傳媒轉型改革，如何可能？

雖然書中對中國媒體的經濟變革和市場運作有詳細的分析，但對中國共黨政權與其傳媒體制本身的批判相對薄弱或含蓄。中國的媒體體制具有高度

的政治控制和審查制度，這對新聞自由和媒體公信力構成重大威脅。然而，馮教授在書中對這一點著墨不多，未能充分揭示中國媒體體制對兩岸新聞傳播的影響和挑戰。

書中多次提到中國傳媒改革的可能性，並寄望中國能借鑒歐美國家的公共服務媒介模式。然而，這種期望雖說是與人為善，但或許也同時過於理想化，未能充分考慮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下媒體改革的幾無寸進與實際困難：中國的媒體體制深受政治控制，改革的空間與可能性相當有限。

此外，書中對美國媒體報導中國的偏見進行批判，但對於美國媒體自身面臨的商業壓力和政治干預，著墨較少。與此同時，雖非完美，甚至有諸多可批判之處，然美國及西方媒體在歷史與現狀上確實有更多樣化的新聞與言論表現，與中國、北韓、俄羅斯或古巴嚴重受限的「新聞自由」還是大不相同。

馮教授在書中對俄烏戰爭的分析，主要強調美國和北約扮演推動衝突升級的角色，並指出美國在這場衝突中的「代理人戰爭」策略。然而，這種觀點可能過於偏頗，未能充分考慮到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和烏克蘭的主權需求。書中對俄羅斯在衝突中的角色和責任著墨不多，或許可能造成錯誤印象，認為俄羅斯的侵略行為是逼上梁山的合理反應。此外，書中對烏克蘭民眾的抗爭和對國際社會支持的期望，未能充分展現，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對整體局勢的全面理解。

整體而言，個人閱讀本書的最直接體驗是不斷獲得啟發的過程，因為本書是一部內容豐富、視野開闊與直面重大問題的學術著作。馮教授的這部著作不僅是他多年學術研究的結晶，也是對當前傳媒問題的深刻反思。在當前全球政治經濟形勢複雜多變的背景下，這部著作對於理解和應對傳媒領域、兩岸關係與台灣未來的各種挑戰，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我個人認為本書處處可見馮教授自成一家之言的獨到見解，特別是第四章和第六章。

## 台灣主要報紙的兩岸新聞與言論分析

在第四章，作者深入分析了《聯合報》在 1951 至 2019 年間的兩岸新聞與言論。這一章節提供了一個詳盡的歷史回顧，展示了《聯合報》如何反映並影響台灣社會對兩岸關係的理解和態度。

馮建三教授指出，《聯合報》並非僅在統獨問題上有所報導，而是提出第三種觀點，強調兩岸關係中的「情理法勢」，這讓《聯合報》的報導更加多元化，也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討論空間。

馮建三教授在本章結尾強調，對於《聯合報》的研究，不僅是對於一份報紙歷史的回顧，更是對於台灣社會與兩岸關係的一種反思，不僅具有歷史價值，也對於理解當前的兩岸關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 分析不同殖民與墾殖、關注新冷戰及前瞻兩岸關係

在第六章，作者的論證特別無畏。作者自承本章：「甘冒外行妄議之譏」，但係出於疑慮，故而不得不獨排眾議地指出：「『懷疑』…美國帶頭反中並不完全合理，『憂慮』我國朝野未能提出兩岸未來的政治統合方向，卻似乎以不同程度，配合或不批評美國對中之政策。我國尾隨美國行事，維持現狀之外，別無良策應對北京的『一國兩制』，是鴛鴦作為。作者以為，這個未能肩負責任的認知與行為，固然對台灣不利，同樣有害於中國大陸與世界。」（頁 297）

馮建三教授第六章探討了台灣歷史上的不同殖民與墾殖經歷，並延伸至當前新冷戰的出現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透過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分析，本章揭示了台灣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及其面臨的挑戰。

馮教授比較荷蘭殖民、鄭成功政權、清朝及日本統治時期的不同特點。他指出，荷蘭殖民與鄭成功政權對平埔族群進行了屠殺和經濟剝削，而清朝時期則發生了多次流血衝突及鎮壓，日本統治時期實施了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

在分析完歷史背景後，馮教授將視角轉向當前的國際政治局勢，特別是新冷戰的出現。他強調，美國在二戰後的國際政治角色，特別是在俄烏戰爭

爆發後的影響力。馮教授進一步指出，台灣應該理解美國的「善意」，並在兩岸關係中尋求共好之道：基於經濟共好，進而拓展至文化與政治等領域。在對歷史與現實的分析基礎上，馮教授對兩岸關係的未來提出前瞻的想像與期許。他指出，兩岸應該避免重蹈俄烏戰爭的覆轍，強調兩岸之間沒有兵戎相見的道理，也反映了他對兩岸和平發展的期待及對戰爭風險的深切憂慮。

馮建三教授在本章結尾強調，對於台灣的歷史與現實的深入理解，是構建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馮建三教授的分析不僅具有深厚的歷史背景，還具備對當前國際政治局勢的深刻洞察。這樣的分析不僅有助於理解台灣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也為未來的兩岸關係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最後，如果有機會，我會建議展讀本書的讀者可以多讀幾遍，特別是第四章和第六章，因為這兩章也最可能引起爭論，或是引起跨領域的不同見解，但也可以從中讀到作者敢於提出一家之言的細緻思考，以及更多是他的「操心也危，慮患也深」，並且親炙（或私淑地）體會到一位具有世界格局、公共知識份子的思想、行動與實踐典範，不只是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

## 訂 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